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78 期 2022 年第 1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洪 达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 P4



从福州路出发

# P28



宋元时期的东方明珠

# P49

魁龙坊名人逸事



## 世味流年

4 万小英 从福州路出发

## 闽都世家

11 方 城 话说宫巷方家老宅  
17 文 净 张秋舫，引领福州商界一代风骚  
22 江 雁 罗氏风云

## 聚焦世遗

28 邱俊霖 宋元时期的东方明珠

## 船政之光

34 胡映泉 在政治夹缝之中  
39 李玉林 船政勤工学校三迁记

## 八闽文脉

45 柏 荣 刘刚中的学问之道

## 坊巷春秋

49 吴安钦 魁龙坊名人逸事  
54 仲 佳 华林坊状元第  
57 葛 椿 水玉巷乡愁

Contents

# P57



水玉巷乡愁

# P70



汇丰福州银行如烟往事

# P75

福州与福山



## 闽都记忆

- 60 冯 涛 叫醒宋代福州的那滴水
- 65 江梦笔 从一段游记皱褶中展开的街巷
- 70 林正德 汇丰福州银行如烟往事

## 福地山水

- 75 林国清 福州与福山
- 79 孟丰敏 乌山面面观

## 左海风流

- 85 邹自振 林纾与近现代之交的闽都戏剧
- 91 潘 群 曹学佺为家乡禅寺作诗

## 在线读城

- 94 管柏华 有爱，就有一切

- 封面 洪 达 三通桥（摄影）
- 封二 徐启源 画 春枝映霞
- 邱永渠 诗
- 封三 陈泽山 右录谢泌福州即景（书法）
- 封底 寿山石舞俑

# 从福州路出发

万小英

我与福州的渊源，要从福州路说起。20多年前，我还在南昌，家就位于福州路一带。

那是一条幽静之路，两旁粗大的香樟树浓荫覆盖，几乎将整条道路隐于其中，夏天走在这里不用张伞，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着樟香味。福州路并不长，尽头与八一大道相连。八一大道的地位与格局类似福州的五一路，在市中心，正如五一路有五一广场，八一大道有八一广场烘托。

大学毕业找工作，福州向我招手。我对这座异地之城一无所知，但或许因为与福州路如此贴近，我有什么理由不让“福州”从路牌上走下来，真正走进我的人生呢？所以，我来到了福州。

算起来，迄今为止，我在这两座城市的时间大致各半了，分别都是20多年，它们在我心里都已是沉甸甸的。

## 滕王阁与镇海楼、道山亭

说起南昌，最为人知的就是滕王阁。

滕王阁位于赣江边上，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其始建于唐永徽四年（653），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任江南洪州都督时所修，现存建筑为1985年重建景观。主体建筑高57.5米，内部共有7层，分为3个明层、3个暗层及阁楼。

唐上元二年（675），洪州都督阎伯舆重修滕王阁，王勃写成《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滕王阁序》。这篇全文773个字，包含40个成语的不朽之名篇，令诗人王勃与这座赣江岸边的楼阁，名扬天下。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16岁就被授予朝散郎官职。在担任沛王府修撰期间，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写《檄英王鸡文》。唐高宗对此不满，王勃被逐出长安。21岁时，王勃再次来到长安，朋友凌季友为他在虢州谋得参军之职。没有想到，王勃牵涉一起官奴被害案，被判死罪。幸遇大赦，改三年

有期徒刑。他的父亲受牵连，被贬边远蛮荒的交趾（今越南）做小官。

25岁的王勃出狱后要去看望父亲时路过南昌，正赶上都督阎伯舆新修滕王阁成，重阳节时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在滕王阁文惊四座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流传千年，大家耳熟能详，就不赘述了。“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句每字都是那么文采斐然。《唐才子传》记道：“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滕王阁传说目前被列为南昌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此文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高耸的楼阁就是超越凡俗的另一个世界了。王勃在滕王阁上大放异彩，似乎将之前的所有郁闷都冲洗得一干二净了，重新意气风发。但他终究要从楼中

下来，回到人间。

他要继续赶路，去看因他而遭贬远方的父亲。唐高宗上元三年（676），26岁的王勃探父回程上了一叶扁舟，准备渡过南中国海，没想到船翻海浪，天才瞬间被吞噬了。据说唐高宗后来读到《滕王阁序》而拍案喝彩，唤来太监：“朕当年因斗鸡文逐斥了王勃，现在他在何处？朕要召他入朝！”太监吞吞吐吐答道：“王勃已落水而亡。”唐高宗失望得一屁股坐回龙椅，叹道：“可惜了！”

福州市区也有座楼。虽然不如滕王阁历史悠久、名气大，但在福州地位崇高，那就是镇海楼。

镇海楼位于屏山之巅，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初为福州各城门楼的样楼，后定名为镇海楼，是福州古城的最高楼，是俯瞰福州城的重要制高点和登高眺望点；原建筑俱已损毁，现为2006年11月重建景观。楼高21米，楼前右侧



福州镇海楼

有七星罡按北斗七星方位排列，以佑平安。

福建的民间有一种传说，台风再大，也越不过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湄洲岛的妈祖雕像、漳州的定风珠和福州的镇海楼。曾有福州人相信“镇海楼可以镇住台风”。镇海楼重修完成十几年时间，台风很少正面登陆福州，让人们相信这座楼的“神力”。

《山海经》说：“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古代，海离福州更近，很多“屿”的地名就是佐证。城中有山，镇海楼山上起楼，位置至高，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闽江口众多航船进出的标志性建筑，只要找到镇海楼的位置，也就找准了进港的方向。有镇海楼，闽在海中又如何？

《山海经》又说：“南方有赣巨人。”这里的巨人，大概是一种高大的野人，但是我宁愿理解为伟大的人。滕王阁迎来了“人”，成就了“人”，它因人而成为巨楼。

将南昌的滕王阁和福州的镇海楼放在一起，似乎并不算匹配。一座是在文学史上，有着1300多年资历的名楼；一座是600多年的地方样楼，在很多地方也都有镇海楼。但是我相信因某种机缘可以放在一块，这是一种心愿。王勃死于海中的风浪，镇海楼传说可以镇住台风海浪。好希望王勃的人生里，有滕王阁，也有镇海楼，既耀眼，也镇得住风浪。

从文学层面着眼，福州的道山亭离滕王阁更近，而且它与江西尤其是南昌有联系。

道山亭位于乌山。北宋郡守程师孟登山览胜，认为乌山可与道家蓬莱、方丈、瀛洲相比，改其名为道山，并建道山亭。亭子建在十多块奇岩怪石组合的高埠上。现有道山亭为重修。木构八角形，青石浮雕石础，双檐翘角，井顶如覆碗，中悬一朵玫瑰花。登临道山亭，可鸟瞰福州，令人心旷神怡。

道山亭闻名于世，与曾巩的《道山亭记》分不开。

曾巩，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58岁的曾巩在福州任太守（行政兼军事长官）。需要说的是，在任福州知州前，曾巩曾经调任洪州（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

在福州一年多后，曾巩就调任明州（今宁波）知州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明州的曾巩收到程师孟题写道山亭的“约稿”。

这真是令人惊讶的邀请。距离道山亭的建成（1068）已经过去十年，程师孟1070年也离开福州，此时担任越州知府。对道山亭来说，这两位太守都已离去，它是一座远方的亭子。

程师孟，字公辟，号正议，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在福州任职虽仅有一年九个月，但百姓感念他的治绩和官德，为他建生祠于乌石山千福寺，并在祠旁立有诗碑，镌刻他的诗作。《宋史》对于他治理福州的政绩有“筑子城，建学校，治行最东南”11字的评价。



道山亭



曾巩《道山亭记》石刻

曾巩在福州任职也仅有一年多，但也是政绩卓著，使福州呈现出“山海清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羨”的繁荣景象。

或许两人有相同的经历与抱负，而能相知相惜，这里包含着程师孟在偏远的地方抹不去的怀旧心态，还有曾巩早在福州期间多次登临道山亭未来得及述说的情愫，这番邀约勾起了他的太多回忆与感怀，曾巩一挥而就，写下了《道山亭记》。

这篇文章以壮阔浩瀚的思潮，雄伟奇崛的文笔，描写了乌山风景和福州面貌、风土民俗：“沟通朝夕，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佛老之宫以数十百”“三山鼎趾立”“屋室钜丽相矜”“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

《道山亭记》一出，传诵甚广，“道山”还成为福州城的代名词，历宋、元、明、清都如此，可见曾巩与此文的影响力。

一个文人与一座楼亭的故事，相隔 400 年的王勃与曾巩，可以拊掌相视一笑。

### 八大山人与郑思肖

人杰地灵，这是王勃对南昌的赞美。南昌的人杰，在我心目中，首推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约 1705）是明末清初的杰出画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江西南昌人。姓朱名耆，僧名个山、传启，别号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抱着对清王朝不屈的态度出家为僧。后还俗，自筑陋室“寤歌草堂”于南昌城郊，孤寂贫寒地度过了晚年。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建树，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花鸟画。其古怪的格调充满了神秘性，向来为人所费解；但有些又很直白，情

感露骨。300多年来他饮誉画坛，“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我感受着八大山人画作的勾魂摄魄之力。《鱼鸭图》中的那些鸭子，睁着大大的白眼；《荷花翠鸟图》中的鸟低着头，闭着眼，立在孤立的芦苇秆上，怡然自得，旁若无人……我站在他的画前，魂灵仿佛被神秘地吸进了宣纸里，被画中的孤寂、高傲、悲哀、淡然左右，在失神中全身发热，浮出一层细汗。

“哭之、笑之”，人们这样解读“八大山人”在画中的落款，这大概是朱耷的心声。从明王爷成为一介遗民，朱耷承受国亡家破之痛，他出家过，也发过疯，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才恢复。艺术是他的生命，他沉浸于绘画中，不再说话，大书一个“哑”字贴在门上。

在福州，也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与八

大山人一样，处于朝代变更之际，用自己的画笔与行事作风表达着内心的不屈。

郑思肖（1241-1318），宋末元初著名诗人、画家，连江人。擅长作墨兰，以画“露根兰”著名。据《遗民录》载，他“精墨兰，自更祚后，为画不画土，根无所凭借。或问其故，则云‘地为人夺去，汝有不知耶’”。“更祚”即指改朝易代、由宋入元。他画的兰花，都没有土所凭依，别人问原因。他说：“土地被人夺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郑思肖的故土之情浓烈。他原名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因“肖”字是宋朝国姓“赵”字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流露出对故土深切的爱。

梅、兰、竹、菊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兰花是代表文人气节的花卉。郑思肖画兰，也肖兰。《南村辍耕录》载，郑思肖“工画墨兰，不妄



郑思肖《墨兰图》



与人。邑宰求之不得，闻先生有田三十亩，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斫，兰不可画’”。面对强权势力，他的姿态是头可断，画兰不行，因为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高雅之兰呢？

郑思肖笔下的兰花，如同画家本人一样，不畏风霜、孤傲自馨。他的《墨兰图》笔力刚劲，卓然不群；画右自题诗一首：“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所南翁。”钤“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印一方。其中态度，可谓“人画合一”。兰花体态较小，单独作为画幅主体在绘画史上出现较晚，郑思肖的《墨兰图》卷据说是画兰史上影响最大、最早的作品，也是他留下的唯一传世作品。

郑思肖与八大山人，相隔400年，但是文人气节、艺术情怀、做人品格，冥冥之中似乎相通。若二人有缘相聚，或许会引为知己的。

## 恰饭与食钵

到一个地方，第一个学会的词语大概就是“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吃饭”的南昌话是“恰饭”，福州话是“食钵”。这两种方言及其用餐，值得一说。

到福州这么多年，我还不会说福州话，也听不懂，这固然是日常所接触并运用的都是普通话，但也不全然是这个原因，主要还是福州话很难学，这是被公认的。福州话与南昌话，有两点

类似。一是在听觉上都不属于悦耳类，语调比较生硬，缺乏柔软性，外地人听南昌人说话，常常误为在吵架；二是两者都比较古老，保留了很多古代语言元素。

福州方言保留了很多古语，比如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福州早餐有鼎边糊，怕外地人不懂，会写成锅边糊；问“食糜未”，意思是喝过粥没有。吃饭是食钵，钵乃碗的古语。听福州人说话，会不会感觉进了时间隧道，回到了古代？福州方言是福州非遗项目，传播不限于本地，海外影响力很大。

福州孩子学古汉语有一定优势，南昌孩子学古汉语，也有一个便宜之处。我在读书的时候，遇到诗词格律，平仄押韵，老师会让我们用南昌话念一念，根据方言来判断平仄韵脚大致不会错。

南昌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颜色会“发出”声音。不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语言现象。比如，红色是喧红，黄色是森黄，紫色是啣紫，白色是喳白，绿色是啣绿，黑色是咩乌，透明是叮清，黄色是呐黄，蓝色是哇蓝，青色是啣青，等等。

颜色前面的修饰字，更像是一种拟声，并没有实际的对应汉字。说的时候会刻意拖音或重读，以此表达感受。小时候，每当要说颜色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故意说得很慢，那真的是有“声”有“色”。后来我看到一句诗，

是元代吴莱《严陵应仲章自杭寄书至赋此答之》中的：“色采黄朱黻，音声徵角韶。”色彩与声音是可以打通的，正所谓“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

恰饭与食钵，南昌“恰”什么，福州的钵里有什么，两座城市差异很大。南昌菜咸鲜、呛辣，口味重；福州菜相对口味清淡，讲究新鲜。

在南昌的时候，我喜欢吃炒米粉、藜蒿炒腊肉、辣椒炒油渣、虎皮辣椒等，一到饭点，空气里飘的都是辣味，在这样的时候，痛快地打几个喷嚏，可以吃得更多。印象深刻的是城郊谢家村的炒米粉，上大学的时候吃过一次。米粉里，肉、菜等料加得特别充分，每一根米粉都是色香味俱全。

印象深的还有晚上的路边摊，南昌的夏天是火炉，只有晚上人们才纷纷出动，所以特别热闹。那时候盛行吃啤酒螺蛳，冰啤酒就着辣螺蛳，一大爽事。我那时比较内向文静，在别人眼里还是淑女，但在路边摊，也是十指油腻，将螺蛳吸得嗦嗦山响。

南昌菜的味重也是没有办法的，可以下饭。父亲在饭桌上常说一个笑话，说是有个吝啬之人，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在桌前挂一条咸鱼，让家人看一眼就吃一口饭，有个孩子告状说姐姐多看了两眼，此人斥责这个姐姐说，你也不怕咸死吗？

到福州，当然很难吃到真正的南昌菜，自己做得也不地道，但渐渐地也接受了，口味淡些有

利于健康。前几年回南昌参加活动，三餐都在饭馆吃，竟然有些不习惯了，暗叹怎么这么辣这么咸，原先怎么没有感觉。

福州菜当然也不全然是清淡的，随着外来人增多，各地口味都有。人们更青睐福州的传统食品，如肉松、肉燕、鼎边糊、线面、芋泥、清明粿等。特点之一就是很多是“精细”“软烂”的。可以看出，福州这座城市对老人是非常友好的，食物很适合老人。比如拗九粥，以荸荠、花生、红枣、桂圆、莲子、白果等，与白米掺糯米加红糖同煮至熟烂成粥，营养丰富，又不费牙口。由这碗粥还衍化成一个孝敬父母的节日——拗九节。这天，福州的子女要为父母奉上拗九粥。佛跳墙也有类似的特点，将各种名贵食材一起炖，其汤营养丰富，这大概可供富贵人家孝老之用。

在福州，我喜欢走在浓密的榕树下，在坊巷中，不经意间就会“遇到”林则徐、沈葆楨、林觉民、林徽因……群星灿烂。在南昌，我喜欢走在浓密的香樟树下，在渊明路（陶渊明）、孺子路（徐稚字）、永叔路（欧阳修字）、子固路（曾巩字）、象山路（陆九渊别称）、叠山路（谢枋得号）、阳明路（王守仁）、船山路（王夫之）、榕门路（陈宏谋号）、安石路（王安石）、长庚路（宋应星）……也感到群星灿烂。

但我此刻在福州，更愿意想象着走在南昌的福州路上……

# 话说宫巷方家老宅

方 城

## 一、父母亲的睡屋

福州三坊七巷中，坊巷风貌保全得最好的当属宫巷。宫巷是标准的弧形巷，站在巷头看不到巷尾，站在巷尾也看不到巷头，好似一条玉带环腰，方家老宅正好嵌在玉带中间。其东邻是刘冠雄的故居，刘冠雄是福州人，曾在袁世凯北洋政府任海军司令兼代署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对面是清朝二品大员山东巡抚杨庆琛的故居，1949年初，革命烈士、原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中将曾居于一进花厅。杨府东邻是林则徐的大女婿刘齐街宅第，刘齐街官至浙江按察使和河南布政使。杨宅西侧是林则徐次子林聪彝的四进大院，林聪彝曾任左宗棠副手，浙江按察使领三品衔。林府规模恢宏，占地近4000平方米，毗连着清船政大臣、林则徐二女婿沈葆楨的府邸。林则徐的三女婿郑葆中也居住在宫巷。著名文化名人

郁达夫曾感叹“走过官巷，毗连的大宅，均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之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走进宫巷方家老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朱红色的二门，插立在高高的门槛上，完全阻断了外界视线。大门和二门之间的所在叫“门头”，早年间用以停放暖轿。后来城里有了大小马路，这肩扛的轿子也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1949年以后，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幼小，母亲决然把二门撤了，旋即把门槛也锯了，大门进来穿过门头就到了回廊。回廊下两个石阶是宽大的天井，上一个石阶一拐弯就上了厅堂。回廊宽敞、洁净，木梁上悬挂着一个精致的苏州鸟笼，一人多高，棕色竹编，配件锃光闪亮。笼中的画眉鸟会叫早还能迎宾，很是讨喜。

门头的右侧是方家老宅最大的房间——我们父亲母亲的睡屋。睡屋与厅堂相对，古建筑名称叫“倒朝”。睡屋的南面墙朝向天井，因采光需要，母亲叫工人把墙扒了，全部改成玻璃门。屋

内深黑厚重的红木家具是母亲的陪嫁品。地面铺陈着六角形彩色瓷砖，暗红浓绿，颇有些基督教堂玻璃的斑斓色调。天花板开着巨大的天窗。天窗设计者的聪慧不仅体现在可以人工自然操作，更因为天窗位置的选择，每天上午八九点总有阳光倾泻，在地砖上洒下一片细碎的光芒。太阳在天上走，光亮在屋里行，傍晚四五点，太阳挥挥手带走了湿气，留下一片盎然暖意。睡屋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宽大且稳重的黑檀写字台。台面为整片面材，靠人这面特地凹入，中间大抽屉和踏脚处也都制作成凹状，可使写字者腹部和腿部活动自如。写字台靠墙那一面是半圆形的德国砖镜，镜框是花梨木雕刻的百合，次第叠合极为雍容。写字台上左右各有两根缠枝高腿托起小几，几面下一个精美小抽屉，父母亲的印章都放在右手的小屉里。台面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和三两样清玩，那一方墨绿厚重的端砚是父亲的珍爱之一。

写字台前的配椅是一把可自由旋转的半圈椅，左边斜摆着母亲的梳妆台。梳妆台台面大得很，除了安放盥洗器具和化妆品，还稳稳当地摆着一架老式留声机。父母亲听的多为闽剧，比如《反皇城》《红裙记》《闹菊园》《丹凤朝阳》等。但母亲经常为我们播放歌曲《苏武牧羊》。母亲是刻意的，寓教于歌是父母的一种教育理念。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听的第一首歌或是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武牧羊》。“转而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这样的旋律与

词情，丝丝缕缕地镌刻在我们的心上。记得有次某中学智力竞赛，主考人出的谜面是苏武牧羊，要求猜一位中国剧作家。须臾间，我们方家一位兄弟就高声喊答：关汉卿。全场皆惊。梳妆台旁边靠墙立着高矮橱。高橱的德国进口穿衣镜镜象清晰、纤毫毕现，100年了仍完好无损，没有半点霉斑。矮橱上摆放着古瓶、瓷器和一台德国造的镏金座钟。靠墙的鸡翅木三人椅可坐可卧，白墙上悬挂着著名画家潘懋勋先生送给母亲的四帧花鸟条幅，墙边稳稳地立着一个高大的衣架。接着就是一张方方正正宽大舒坦的睡床，床边是多层箱架，整齐地放置着母亲陪嫁过来的福州杨桥路老字号店“万福来”制作的真皮皮箱。玻璃门下间或有序地排列着一溜镂空精美的圈椅和高脚茶几，玻璃门外石板走廊上也有一溜紫砂花盆，栽种着母亲培植的兰花和山茶。

岁月不居，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父亲母亲和老宅，经受了数十场战争和政治风雨的冲击洗刷，艰难而又丝毫无损地跨进了21世纪。时光荏苒，父母亲纵然内心还有眷恋，但还是分别于耄耋和朝杖之年安详地从自己的睡屋中登上了仙路，前后相差11年。

## 二、一进前天井

三坊七巷的人家，无论规模大小，每一进必有前后两个天井。方家老宅一进的前天井面积很大很深，由厚厚的花岗岩石板严丝合缝地铺就。



由于排水通畅，天井常年呈干燥态，灰青色的石板从不长苔。西北角静静地立着一个水缸。水缸有五六尺高，腰身华贵柔美，披着花纹典雅的彩裳。方家老宅有几百年了，不知它已默默站立了几多岁月。

1953年初秋，父母选定了合宜的日子改造睡房，商定在天井西头砌个花坛叠个假山。那个年代，三坊七巷还行走着一种特殊的职业，俗称“神行”，现代叫掇客。这些人肩上搭个白色的亚麻布褙子走门串户。他们面容恭谨，轻声细语，态度极为和善。他们从不落座，耐心地了解东家

的需求。他们办事特别高效，没多久各种假山、盆景和花卉已堆积在天井的西头。母亲极喜爱其中一对白瓷花盆，那质地八九分近似和田玉。母亲精心挑选了品种优良的万年青，小心翼翼地栽种在这一对花盆里，并郑重地摆放在厅堂下天井的第一级石阶两旁。令人惊诧的是，六七十年过去了，这两盆万年青依然葱郁茂盛，在原地静静地守候着。

当时有个现象引起了母亲的警觉。这些掇东西来的神行，放下物品后总是怔怔地看着水缸。有一次两个神行送盆景来，假装在水缸边洗手，逗留了许久。一个年长、留着白胡须的神行还细心地摩挲着水缸表面的花纹，那端详的眼神宛转痴迷。那天水缸只有半缸水，他用手指骨轻轻地叩着水缸表面，水缸发出了悠长久远的回音。那神行把头伸进缸内水面上侧耳倾听，余音袅袅。待那人直起身来，眼神中迸出一丝异样的光。虽是一闪即逝，但还是被站在厅堂石廊上的母亲逮个正着。第二天，那神行真的来了，没有褙子，一身汉装，面孔和衣着干干净净。几句寒暄，那人直奔主题，提出要收购这只水缸，让母亲开个价。母亲呵呵道：这水缸呀，是我家的冰缸哩！我们家喜庆大事全靠它和冰块一起贮存食材的（那时市场上未有冰箱）。那人哑然而退。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记住这老水缸是古宅的一个谜，也是方家的一块宝。

在砌建花坛的时候，住在水部老宅的祖父正好抽了时间回到官巷看看。祖父问及，母亲俏皮

地说，为了给家里添一撮绿。祖父临走时对母亲说，撬起一块石板种下一棵树，那就不是一撮绿了。智慧通达的母亲诚服地接受了祖父的建议，不久就种下福州城闻名遐迩的罗宾医生特地送来的一株荷莲树苗。后因在别处看到荷莲树根系凸出地面的强力状态，遂改种一棵长相很好的杧果树。不多日子，假山开始披绿，杧果树蓬勃生长。杧果树长得很快，不久就开始俯视脚下的假山花草，并与水缸牵手，从此成就了天井西头出色的风景。

整洁宁静的天井东头亲切地看着西头的变迁。没想到东头的热闹也开始了。1954年春节过后，福州工商联大会宣布，政府要推行公私合营。从这天开始，父亲的三位业界朋友约好晚饭后同时到宫巷和父亲话聊。从此天天傍晚，母亲很早就在天井东头安放了一张实木圆桌和四只圆凳，还备了明前绿茶和花生糕点。三位来宾都比父亲年长，说话大大咧咧，一坐下就嚷着喝酒喝酒。母亲赶紧叫我们兄弟到织缎巷口的“汇春号”酒家沽酒并买了许多下酒的卤杂。四个人话语不多，他们聊着公私合营，时而喝着闷酒，时而又出其不意地放怀大笑。他们乘酒兴也说几道戏文，评论着伍子胥、武则天、永乐帝，偶尔也吟诗唱和，天井东头弥漫着江湖文化和酒气茶香。四人会一直延续了10个多月，后来，年龄最大的阿贤伯去世，夜话也随之结束。

天井西头的西头是一间披榭。披榭靠巷墙的前半段是一间由青石板铺就的隐秘砖厕。这是

宫巷几百年中唯一的私厕。厕所较高，粪池且深。由于淘粪的需要，老宅另开专用小门。在宫巷，方家古宅有着独有的一大一小两个门。披榭依墙建有牢固的楼梯，上去二层是晾衣台，三层是凉台。凉台高出屋面很多，可以一览那一大片高耸的马鞍墙和黑黝黝的屋顶，对面就是刘冠雄的海军楼。平整的天井、敞亮的回廊、凉快的披榭和恢宏的厅堂连成一片，不停地流动着人气，洋溢着方家古宅的旺盛生命力。这方天井从明朝走来，几百年的岁月蹉跎和时代变迁赋予了它沧桑，也给了它情感。

也只有方家的天井深谙什么是水的濡沫什么是火的烧烤。早些时候，祖父在南门古宅前购置了一口池塘，委托给一个名叫伙信的人打理。1953年冬，祖父捎话，今年的活鱼直接往宫巷送，时间是中午前后。腊月廿二午前，伙信和另一名伙计挑了四箩筐的活鱼咿呀咿呀进了门。他俩担心自己脚脏，站在回廊口就把鱼筐往天井倾倒。全部是鲢鱼。白鲢红鲢个头极大，一看就知道是精心挑选的。鱼儿活蹦乱跳，一会儿便给天井铺上艳丽的鱼地毯。母亲端坐在厅堂外沿石板上的一把藤椅里，手里抓着一大束红头绳。二叔、三婶和姑姑及左邻右舍站在回廊边，望着满天井的鲜鱼等着母亲发话。母亲给女佣两根红绳，说拣最大的两只红鲢两头白鲢，是祖父祖母的。大家明白这是上限。于是二叔、三婶和小姑各挑了一只走了。母亲拎了两只亲自送到沈府给我们兄弟姐妹授课的国学老师沈颢寿。接着又送

两只给妇幼保健院夏美琴院长，送两只给老中医李楚銮医师。在场的故旧老友或一只或两只的拎着鱼散去。天井里的鱼还不少，母亲又叫女佣挑一只红鲢给宫巷幼儿园园长林太太，又留一只给段警。那时我11岁，站在水缸前看着母亲分鱼，觉得母亲真像个班主任。女佣把剩下的鱼拎去后厅，回头把天井冲洗干净，天井很滋润。我想最早过年的原来是天井。

没想到“文革”初期，天井挨受了巨大的烧烤。那个年月，三坊七巷烟火连连。试想哪一户人家会没有旧家什？更不用说曾经的宦商贾之家。一天，一群人进门，最先烧的是堆在天井中央家里剩余的电线，接着是一眼就能看到的挂在墙壁上的书画和线装的书籍；太师椅和官帽椅也难躲厄运，椅背扶手全卸下来烧，这些硬木很是耐烧。后来被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皮草裘衣也烧，烟味熏天。坦露的天井整整烧烤了七天七夜。事后，母亲和方家妹妹们像对待婴孩一样极其细致地清洗着天井。母亲痛心地对弟妹说，烧毁皮袍裘袄和绫罗绸缎并不可惜，可惜的是书籍笔记。几个月下来，母亲以自己宽博的爱和宏大的孝精心料理着这位几百岁老人严重灼伤的肌肤，天井终于康复了！

### 三、文化的厅堂

宫巷方家老宅坐南朝北，双坡顶穿斗式木构架。前坡顶下面是一进大厅，东西前后四个厢

房两个阁楼。大厅后面是后厅。后厅很大，可以摆放三个大圆桌。西面后厢房的后面是厨房，一直保留着一口大柴灶和铁锅，专为母亲炊斋和蒸年糕所用。后天井不大，有一口水井，井水特别冷冽，母亲经常把猪肝、猪肚和鲜鱼吊挂在井内水面上保鲜。厨房隔着后天井的对面是一间披榭。穿过披榭南墙的拱门就进入二进。二进与一进格局相似，只是规模小些。二进极其洁净，蚊蝇全无，天井靠墙处种着一排修竹，齐齐的两米高，青翠欲滴。一进的厅堂相当宽阔，有三四个天井那么大。厅堂和后厅接合部是典型的明代木建筑，诸多斗拱莲花托次第叠合，高高地顶着横梁，中间有红匾“合兴堂”。下面一幅红缎绸布蒙着门板，中央一金色“福”字。两边木柱紧贴着一副半圆柱体对联，属福建漆器大件，上联“行仁义事”，下联“存忠孝心”。挂钩闪光发亮，对联黑底金字，极为夺目。厅堂上方东西厢房墙上横嵌着前后两根木梁，油漆得色彩斑斓。木梁下方有几个银色钩头，用以吊挂寓意吉祥富贵的锡盘。前头木梁下方东西两头悬挂着一对五尺高的鸟笼，为光禄坊花仓前著名老艺人郭则勤师傅精工细作。鸟笼上了好几层黄灿灿的桐油，两只小鸟跳跃鸣啾。

厅堂前沿两根方柱上也有一副对联，边框是景泰蓝材质，中间以大漆为字底，其上撒着宝蓝色的小结晶，熠熠生辉。上联“海阔天高气象”，下联“风光月霁襟怀”。大厅的四面白墙是沈艮寿先生四幅如椽书法，大气地盖着墙并特地露出

细长白边衬着绢褶。“东谷黄梁夜春”“南园露葵朝折”“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这四幅字字体苍劲饱满，意境高远，我们长大了才知道其中还嵌着父亲的大名。

厅堂前半段铺着宽大的石板，后半段原为木地板，后改成红色斗底砖以便于冲洗。厅堂当中金字下面是雕刻精美的黑色横头桌，案面是整块楠木，中央竖着的大理石立屏遮着后头两个菩萨神龛，两旁是一对大枝黄铜烛斗，中间是圆形铜香炉。案桌一端是立架支着的大果盘，画着寿星童子和仙桃树；另一端是棕黑色高身瓷瓶，插着万年青。横头桌下插着一方沉重的八仙桌，每年只有腊月廿七这一天才让它穿上艳丽的桌裙，四个人抬着放到厅堂的最前沿，摆上食品果蔬祭拜天地。八仙桌右边是一张黑酸枝躺椅，镶嵌着大理石，也叫朝天椅。朝天椅后头是一面又高又大的穿衣镜，穿衣镜后面是母亲的佛堂。母亲中年皈依佛门。每当佛日，母亲起早诵《金刚经》或《地藏经》。母亲的法器一敲，气场顿起，全家肃穆。和母亲佛堂相对称的空间就是厅堂拐入后厅的通道。通道上靠墙摆放一张红酸枝二人椅，由两个神行从远处抬来，说是这样安放可以给朝天椅匹配对称。后来，父亲又到南后街定做了两张藤制躺椅放置在厅堂前廊的方柱下，这样厅堂上的座位就不少了。通常午饭后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坐在厅堂等一个卖水果的依姆，母亲叫她皱头姐。她差不多每天都很准时挑来时鲜水果，其水蜜桃特别好。有时皱头姐迟到了，母亲

说开始背书啦。母亲起头定个语速：“臣亮言。”大家跟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母亲忽然改口：“初郑武公。”大家一怔，赶紧跟上：“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琅琅书声中，皱头姐的水果担就进门了。她笑着说，听不懂，但很好听啊！书声立刻变成了欢笑声。

三坊七巷改造时，省市相关部门的文物专家一批批进入老宅。他们以专业的眼光审视着，一致认为方家厅堂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三点：1. 别人家厅堂的立柱是圆的，而方家的立柱是方的，方柱所花材积更大；2. 别处的柱础是扁圆的，俗称柱珠，而方家的柱础是方的，很高，还带有精美石刻；3. 前厢房的门一般是两开，而方家是四开，并且上下两段，上半段以细藤皮条编织成花卉，利于通风，下半段是精雕木门，东西两面合起来称八仙门，八扇门上清晰地雕刻着八仙各自的法器。还有专家提出我们方家厢房的窗棂也极为考究，每个窗棂由几十根三四寸长的木条相互支撑而成形，不用胶水不用铁钉，如此平衡，可见其匠心匠技。

专家最后一次认定后，真诚地对我们说，现在我们观看明清建筑，不只是看构建，看规模，重要的是看现存的面貌情调和历史文化底蕴。我们来时，扑面能感受到一种震撼，我们去时，能留下念想。你们方家老宅算是三坊七巷中保全得很好很独特的单门独院了！



# 张秋舫，引领福州商界一代风骚

文 净

追溯福州乃至福建的商贸历史脉络，上下杭无疑是重要的一站。位于上杭路100号的魁星楼，至今还保持着昔日的格局。那是当年的福州商会会址，是上下杭商贸沧桑起伏的历史见证。

成立于1905年的福州商会，是一个提供商业资讯、仲裁商贸纠纷、协调商帮内部争议与矛盾的民间自治机构。在商帮会馆林立、巨商富贾云集的上下杭，商会会长无疑是一个众所瞩目的岗位。被公推为第一任会长的，便是当时福州的第一富商张秋舫。

## 卓越的经商才略

张秋舫出生于亦儒亦商的商业世家。此前的几代人虽以经商谋生，但生意并无多大扩展。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张秋舫，未及弱冠就接手祖业。那时，开埠之后的上海已成为日益繁荣的著名商业都市，年轻的张秋舫从中发现巨大

的商机，决定通过开拓榕沪之间的贸易，跳出既有的经营格局，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张秋舫最初从事的是京果生意。他采办福建土特产水运到上海，再运回京果在福州出售。京果原指当时北平、天津、山东等地出产的货物，20世纪初起，京果的货源地已超过北平及周边省份，延至江苏、浙江、四川等地。经营京果除了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还要获悉各种商品的供销信息，协调从采购、运输到出售的一系列环节，可谓费神费力。以经营京果起步，体现了张秋舫远大的商业抱负。

当时的福州，“旧历正月人家需用京果之货尤多。正月故俗拜年，则瓜子一物家家必备；而糖料及嫩饼点心，亦人人必买”，故“每逢旧历年节期至，京果店置货尤忙”。“其余大吉日、婚嫁办喜事送礼，则京果居一大部分。礼饼一物本为吾闽特式，大如小盆、每重斤零，此种多由京果接受制造。人家以分亲友，或以现饼或以饼

票”。由于当时福州及周边地区对京果的需求旺盛，张秋舫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10年起，张秋舫一边购置货运船，扩大水上货运业务，一边在福州开办迈罗罐头厂，把福建的荔枝、龙眼、冬笋等土特产加工成罐头，运往上海销售。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张秋舫的商业触角不断向新的领域扩展，先后开设了厚坤、厚余两家钱庄。他在厚坤钱庄发行“台伏票”，“台”指的是台江，“伏”是“佛”的福州话同音，指当时流通的有佛头图饰的外国银圆。作为一种以票换票、不能兑现的票币，台伏票以携带方便、利于流通的特点，一度在缓解市场银圆短缺、繁荣市场经济方面发挥明显作用。随后，张秋舫家族涉足当铺、布行、绸缎店、百货行、照相馆等行业，各种商行达20多家，成为福州商人之首富。

### 福州商会的启航者

张秋舫祖籍四川绵竹，系南宋高宗朝丞相张浚的后裔。迁居福州的这一脉张氏后人，虽然多以经商为生，但在那个官本位的年代，为了在商业上获得较多的话语权，他们对官场的动向也不可能不在意。张秋舫生意发达之后，曾通过捐官的途径，先后被朝廷封为荣禄大夫，诰授资政大夫、赏戴花翎，户部郎中加五级，特请二品封典、荣封三代。亦官亦商的身份，为他的人生赢得了更多的周旋空间。

张秋舫与榕籍京官陈璧交谊甚深。出生于闽侯南通的陈璧，官至尚书兼参预政务大臣，在财经、邮传、铁路、铸币等领域多有建树，且以反对守旧、力主革新著称。这位朝廷高官不仅给张秋舫的商贸业务提供帮助，还以他的丰富学识启悟了张秋舫的经营思路。后来，张秋舫的长子娶陈璧之女为妻，两家结为姻亲。

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重视并促进商业发展。为维护营商环境，“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鼓励各地设立商会。当时常驻在上海的张秋舫便与旅沪商人罗金城、李郁斋等人商议，并返榕联合福州商帮人士，于1905年成立“福州商务总会”。张秋舫以其无可争议的条件，成为福州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后改称会长）。1911年，张秋舫代表商务总会以白银11350两购买房屋，把原设在下杭的会址迁至上杭街。依彩气山而建的新会址，是以魁星楼（八角亭）为核心的园林建筑群。100多年前的上下杭虽然店铺毗连，但没有遮眼的高楼，从魁星楼上纵目远望，可见闽江翠带环腰，更远处，高盖山、五虎山前后相叠，翠色如屏。商会选此风光殊胜之地为办公地点，可谓慧眼独具。

当时，福州全市的商店有15000多家。商务总会的45名会员，是来自福州、兴化、福宁、延平、建宁、邵武、汀州等地的商户代表。作为福州的首届商会，又是在全国较早成立的地方商会，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商会既要开展相关的调查摸底，制定诸多行规与制度，探索可行



魁星楼

的管理模式，又要凝聚各商帮力量，维护商界共同利益，交流分享信息，协调各种矛盾，事务相当繁杂。张秋舫以过人的精力与协调能力处理各项事务，使新成立的商会发挥突出的作用，也为商会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维护商会日常运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一些重要活动，为维护民族权益、保护商人利益勇担道义。

福州商务总会成立不久，就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制定福州商界抵制美货的八条公约，组织商人抵制美货，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

1906年，林则徐的嫡曾孙林炳章返乡开展禁烟去毒活动，丁忧在家的清代名臣陈宝琛也加入禁烟行列。福州商会积极响应，张秋舫、罗勉

侯、李郁斋参与陈宝琛、林炳章发起成立的“福建去毒社”，发动商家为禁毒活动募集经费，勒令土膏行、烟馆改业，打击售毒的洋商、奸商。不到一年，福州的吸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民众敲锣打鼓，抬着缉获的烟土、烟具列队游行，并在仓前山海关埕销毁鸦片，现场人山人海，在场观众深受教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1907年，法商魏池拐骗闽工1825人，拟送往巴拿马运河做苦工。福州的工人、店员及爱国士绅、官员于2月23日召开“同胞救援会”，制定救援措施。福州商务总会致电厦门商会，联络厦门工人、店员和商界共同救援，截获了企图从厦门出港的船只，解救了被拐骗的闽工。

张秋舫在商务总会会长的岗位上连任两届。以他为领军人物的福州商务总会，为福州商贸领域的联合自治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上下杭能成为福州的商业中心与闽商的发祥地，张秋舫功不可没。

## 热心教育文化事业

魁星是中国古代星宿名称，传说主宰文运。福州商会的所在地，供奉的竟是一尊魁星踢斗神像。魁星楼楼底有个边门，墙上嵌着一副对联：“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联句出自杜甫的《曲江对雨》，其间所洋溢的风雅与灵动，显然与“在商言商”的氛围不符。

其实，魁星楼的二层便是商圈学子读书地

方。张秋舫幼年在自家私塾攻读诗书经文，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格外重视。他家的第四进花亭就设有私塾，聘请教师为子孙教习汉文、英文和算学，亲友子弟若有意来此就学，一律给予免费。民国初年，张秋舫任福州慈善社社长，更加致力于社会公益，尤为重视教育。在近代教育事业逐渐兴起的新形势下，张秋舫敏锐地意识到新式学堂对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与罗金城等人出巨资在大庙山创办商立两等小学堂，聘请学界知名人士汪涵川为首任校长。这座学校后来又增办中学，校名亦几经更改，至1950年获准增办高中，命名为“私立福商中学”，发展成完全中学。1952年私立福商中学收归公办，改名为福州市第四中学，目前是福建省重点中学，亦是台江区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中学。

福州万寿桥北岸，至今还屹立着一座民国气息浓厚的红砖大楼。那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黄乃裳捐款购置地皮，张秋舫、罗筱坡等富商捐款建设的福州青年会。青年会大楼分为前楼与后楼。前楼3层，右边二至三层为青年会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一层为西餐厅、学生会部、理发厅和淋浴室；左边一层为总干事办公室、女青年会部、会议室、电影院；后楼4层，地下室为游泳池，中间是大舞厅，楼上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乒乓球室、室内灯光篮排球两用场、台球厅。虽然大门口的青石碑刻的是“基督教青年会”，但社会各界青年均可入内参加活动。在当时的福州，这座集教学、阅览、研讨、交谊、锻炼、娱乐于一体的



落成时的青年会大楼

大楼，建筑考究，设施先进，可谓得风气之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访问福州期间，在青年会讲演6次。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在青年会寓居半年之久，此后又在青年会发表《中国新文学展望》公开讲演。女作家庐隐是这家会所的常客，她的散文还提到在青年会看无声电影的往事。作为传播先进科学知识与文明生活理念的平台，青年会对新一代福州人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5年，享年75岁的张秋舫辞世，那时张氏家族的商业生意已呈颓势，但本省的知名人士、社会团体及诸多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人流三日不绝。出葬那天，送殡人数达3000多人。能获得这样的哀荣，与他在社会公益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是分不开的。

### 商业家族曲终人散

张秋舫经商致富之后，与弟弟张幼亭默契配合，共同经营庞大的家族生意。两兄弟始终没有分家，关系相当融洽，两兄弟的子孙成年后多

在家族的各家商号从事经营管理。晚年的张秋舫回老宅养老，把所有经营活动交由他们的后代管理。十几年后，张氏家族的生意出现颓势，渐渐淡出上层商业圈。20多家企业到后来所剩无几，勉力维持的迈罗罐头厂、西来家具厂、宜华照相馆后来由张秋舫长子张星甫接手经营，生意亦日益惨淡。张幼亭之子张叔恭在上杭街开设了一家茶行，生意亦不甚红火。

盛极一时的家族生意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家族后代人心不齐、经营谋略失当有关。张秋舫兄弟两人没有分家，两家拧在一起合力经营，固然有凝聚力量、取长补短的作用，但随着子孙的增多，吃大锅饭的现象难免导致有人不思进取，贪恋安逸，挥霍奢侈。张氏的大多数企业都聘请掌盘，这种类似今天职业经理的角色，本来有利于谋划与经营，但由于张氏子孙对他们过于依赖，导致自我商业历练不够，决策能力偏弱，加上所聘的个别掌盘心术不正，借机从中营私，加剧了企业的衰落。当然，这只是导致衰落的内因。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衰成败，说到底摆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江口被封锁，由福州通往上海、天津等地的水路交通中断，商品流通受阻，金融业务几近崩溃，本就经营不顺的张氏家族更是雪上加霜。

风光一时的商业家族雄风不再，但也不是从此毫无声息。20世纪30年代，张秋舫的侄孙、厦门大华轮船公司经理张顺凡捕捉到中国运输事业面临的商机，回到福州出任福州和记洋行副经

理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福建经理处经理，不久又自己创办了福达汽车公司，经营与航空业务相关联的业务。张顺凡开辟了自上海经温州、福州、厦门、汕头至广州的水上航空运输航线，在航路沿线没有对应陆地机场的情况下，他只能利用海面或内河设置飞机停泊点，这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水上飞机、专用汽车与接送船只，建造水面浮站，落实因特殊情况需要安排乘客住宿的旅店，事务千头万绪，非能力过人者难以胜任。在80多年前的福州，张顺凡的胆识与勇气令人赞叹，他也因此被誉为“福州航空运输第一人”。同时，张顺凡与当地商界及相关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福州扶轮社。扶轮社是当时流行于国际商业社会的交流组织，福州扶轮社作为国际扶轮社的成员，经常开展相关的商业交流与专家演讲活动，还发动社友捐款支助公益事业，如捐助麻风院和孤儿院，协助为医院筹集基金供一些人免费治病，为协和大学贫寒学子设立奖学金，协助为福州青年会筹集经费。这些扶危济困的义举颇得人心，为福州商界赢得良好声誉。

张顺凡是继张秋舫之后张氏家族最有商业经营能力的人才，谁知时势变幻，经营数年的航空运输线因战事而停航，福州扶轮社后来亦自行解散，他所创办的福达汽车公司于1956年并入福州市汽车修造厂。由张秋舫开启的张氏商业家族从此曲终人散，他的后人在福州从商者不多，移居各地的子孙中，有多人在工业技术、教育等其他领域表现出色。

# 罗氏风云

江 雁

几十年前，福州仓山陶园路（今立新路）上有一座 2500 平方米的三层洋房，富丽堂皇又不失高雅别致。初夏盛日，玉兰花、三角梅围绕主宅层层盛开，草坪、竹林和池塘亦是郁郁葱葱。这座豪宅便是富极一时的金融大亨罗勉侯的住所。

罗氏家族曾拥有这般规模上下的房产、厂房近百所，并聘请专业管家管理。光阴荏苒，如今这些宅院已渐渐凋零、消散，但曾经的觥筹交错、歌舞升平依然充溢着动荡、纷呈的风云故事。

说起罗家的发家史，还要从 200 个铜钱开始。

原籍河南的罗家入闽后，起先定居于连城县。清乾隆年间，家族里一位名为罗希魏的年轻人，不甘困于穷乡僻壤，怀揣一把旧伞和 200 个铜钱，翻山越岭到福州谋生。勤恳务实的他，从最苦最底层的学徒做起，习得一手销熔银锭的好手艺。经过几年的打拼和节衣缩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开设了一家铸熔银锭的小店。店铺简陋、狭小，可谁曾想到，这竟成为之后庞大罗氏

家业最初的根基。

罗希魏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安安稳稳地传承到第四代罗佳森。罗佳森却没有祖父辈那般幸运，当时正值西方列强侵扰中国，洋货充斥市场，本地商品滞销，流通白银量骤减，熔银生意愈发惨淡。罗佳森卖掉家宅，艰辛维持，也只能勉强糊口。

罗佳森育有四子，长子罗端波颇有先祖罗希魏的气魄，立志要重振家业。罗端波不仅有胆有识，还有异常敏锐的商业嗅觉。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其木材集散地、茶港地位逐渐形成，商贸迎来繁荣期。罗端波不顾家人的劝阻，放弃家族熔银生意，到处筹借资金转行经营存贷款业务。正当农工商发展急需大量资金周转当口，罗端波紧抓商机，赚得盆满钵满。随后趁热打铁，创立晋和钱庄，并开始涉猎木材、茶叶、土特产等经营，罗氏商业帝国终于拉开了帷幕。



罗氏恒和钱庄旧址



台伏票

罗端波点燃的财富之火传承至三个儿子之时，已趋燎原之势。家大业大，三子分区而立，相辅互助，又彼此独立。长子罗筱坡住在下杭路，被称为下杭路罗家；次子罗莱吟住在南禅寺亭前街，被称为南禅寺罗家；三子罗蕴庄，住在海防前（如今的延平路），被称为海防前罗家。罗氏一分为三，均有建树，而长子罗筱坡一脉更是开创了难以企及的业峻鸿绩。

1843年出生的罗筱坡，自幼便跟随父亲在商海沉浮，筹谋果决、精明睿智外，又磊然有君子之态，成为罗家第六代中的核心人物。其掌管家业后，继续夯实、拓展钱庄基业，在上藤路设立昇和钱庄，几乎独揽仓山区的工商业贷款；在下杭路开设恒和钱庄，除办理该区商贩贷款外，还统揽上海至福州的汇兑业务。此外，他还跟弟弟罗蕴庄合作，在延平路创立均和钱庄，以运营义洲一带的木材行业贷款。

市场银圆短缺年景，政府开始流通“台伏

票”。“台伏票”是纸币的一种，虚银本位，没有实币，仅是一种以票换票的票币。罗筱坡一向谨严稳重，从不做冒进之事。“台伏票”盛行期间，罗家几家钱庄仅昇和钱庄一家发行“台伏票”，既便于管理，又可进可退。

1929年，福建财政厅厅长何公敢限令全市停止发行“台伏票”，昇和钱庄才改发行“大洋票”。1935年，昇和钱庄因贷款透支和王梅惠兄弟所开的同行不幸倒盘，引发群众错觉而发生过一次“大洋票”挤兑风波。钱庄外围被焦虑、恐慌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叫嚣着立刻兑现，否则就冲进去砸店。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银行本不营业。罗筱坡及其兄弟饭也顾不得吃，靠着罗家积累的口碑和人脉到处疏通、周旋，才破例让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开仓拨现，短短半天时间，风波即告平息。虚惊一场后，罗氏钱庄在商界的信誉和声望不降反升，亦算因祸得福。

除了钱庄生意外，罗家还涉足进出口、百货业、木材、茶叶、质贷等几大行业。罗家的罗坤记进出口行设于上杭路，主要业务是向浙江、江苏采办纱、布、棉及绍兴酒等和向大连、天津、青岛等地采办豆、油、水产、干货等；福州运往东北的则有各种土纸、竹篾、笋干等。罗坤记的生意“向北不向南”，专注北方特产，并自备大型木帆船“金元和”和“银元和”号，雇佣专业的航海船员进行商品运输。商品品类众多，吃穿用度无一不包，盈利颇丰。

罗家还开设了“允孚”“恒孚”两家当铺。“允孚”设于上藤路，时间较早。“恒孚”原是福州巨商张秋舫所有，后因破产欠下罗家和黄家（黄恒盛布庄）债务，就拿此当铺抵债。罗家拥有 2/3 的股份，黄家拥有 1/3 的股份，罗家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权。

至于木材行业，罗家其实本是外行，对其中经营的门道不算熟悉。为少走弯路，便与木业大

亨郑宝铭合作，合股开设恒记木行。郑宝铭被任为经理，统管各项事务。罗家的均和钱庄主要针对木商放款，并设有很多优惠政策，以此吸引更多木业买卖。均和钱庄和恒记木行强强联手，相辅相成，生意蒸蒸日上，建宁、泰宁等地的大型木材贸易几乎被罗家统揽。

罗家在罗筱坡带领下，在台江、仓山等区还购置了大量房产。房产项目单单登记就需要厚厚几大本记录。罗家善贾多金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为“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鼓励各地成立商会。《福州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福州旅沪富商张秋舫、罗筱坡等人从上海回到福州，联合福州商帮人士，成立福州商务总会。”张秋舫出任第一任会长；罗筱坡担任第三届总理。“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当时人们引用《搜神记》中的这句话形容福州商务总会创始人张、罗两家的商界地位。



福州商务总会旧址



张真君祖殿



当年，张秋舫和罗筱坡为讨个好彩头，特意择址张真君祖殿举办福州商务总会成立仪式。张真君祖殿位于下杭古渡口的“葫芦穴”处。闽江涨潮时，江水从两个水关同时涌进，恰好汇聚于殿前，被认为是“涌出黄金”的风水宝地。当日，烧香礼拜、锣鼓齐鸣，商界、政界翘楚悉数到场，罗筱坡交际于来宾之间，有礼有节、儒雅谦和，仪式进行得顺顺当当，隆重又喜庆。经此宣传造势，福州商务总会名声大噪，已无人不晓。

在张秋舫、罗筱坡率领下，福州商务总会除了“联络同业，开通商智，和协商情，调查商业，提倡改良，兴革利弊”外，还发挥了更为广泛、深远的作用。比如积极响应上海总商会号召，掀起抵制美货浪潮，并制定了抵制美货的八条公约；参与阻止法商魏池拐卖近2000名闽工至巴拿马运河做苦工，坚决捍卫民工权益，抵御不法侵害；在大庙山成立“福建去毒社”总社，城内宫巷设分社，勒令烟馆、土膏行改业，打击售毒的洋商、奸商。缉获的烟土、烟具被一担担抬着，敲锣打鼓游街过市后在海关堆集中销毁，现场万头攒动，群众欢呼声久久未散！

罗筱坡克己奉公之余，谨记“损有余而补不足”“汝辈不得以私废公”“积金不散，仿如收藏废品”家训，亦特别热心社会公益和慈善。清末民初灾难频仍，民不聊生，每逢疫病荒歉必解囊捐助，尽微薄之力。他曾捐赠万元于清政府，获得光禄大夫、三品衔候补道台的封号表彰。多次出资支援同行，让其免受挤兑破产之难。此

外，他还出巨资创建福商小学（即现在的福州四中），捐资5000大洋助建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并投资创办福州电力、电话两公司，捐款救火社，修桥补路，以一族之力，造福一方百姓，垂范子孙。

1915年，72岁的罗筱坡因病逝世，结束了其丰富、厚重又跌宕的一生。他育有8个儿子，其家族产业主要由三子罗毅侯、六子罗梓侯、八子罗勉侯继承。其中，罗勉侯掌管罗家众多公房生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一任当家人。罗勉侯正值中青年，精力旺盛，除了承脉父亲和祖父精明强干的商业风格，还玲珑练达、弘毅宽厚，颇具口碑和声望。兄弟几人公推最年幼的罗勉侯为“领袖”，期望他能带领罗家步入新的辉煌。

罗勉侯显然没让家族失望。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产业提升、改良，任人唯贤，稳定、深拓现有营生外，在茶叶、百货业和锯木业亦多开创新局，并投资了南星澡堂和延福泉汽车公司。罗家的建春茶厂除了福州主店，还在天津、营口、大连各地分设茶庄。其茶叶味正色浓，价平质优，曾被邀去菲律宾参展，广受好评。

云章百货商店是罗勉侯一手创办的。店址在繁华的台江路，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后又不断扩展至瀛洲桥边，主要经营百货、绸布、鞋帽、土特产，品类齐全、服务周到，尤其一些高档名牌，优质精巧、包装考究，备受名流显贵钟爱。

老福州人或许还记得，云章百货大门玻璃上

曾画就一幅闽剧大师郑奕奏扮演“黛玉葬花”的美人图，肩扛锄头，手提花篮，似悲似怨，栩栩如生。当年，郑奕奏拿手剧目《黛玉葬花》场场爆满，国民党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的女儿看罢演出后，竟痴迷地抱病不起，其父特备车设宴邀请郑奕奏上门做客，女儿才病情好转。为表谢意，厅长特地定制一把金锄头赠予郑奕奏，此事传为佳话。罗勉侯以此事为宣传噱头，招揽顾客，收效斐然，其经营手法应时应景，可见一斑。

因云章百货的盛名，其旁侧有一条长80米、宽1.5米的巷子被命名为“云章后”。后因“章”同“昌”音近且寓意更佳，“云章后”便改名为“云昌后”，再后来又改称“云章下巷”。2006年，因拆迁改建，此巷已不复存在。

罗勉侯把家业经营得如火如荼，在亲情面前却又呈现出包容、良善的一面。那时，罗勉侯的妻弟吴权是回春药店的掌权人。可惜此人不谙营治，又耽于游乐，挥金如土，甚至还染上了鸦片。回春药店生意一落千丈，陷入极度困难。罗勉侯恨铁不成钢，亲自登门把吴权教训、臭骂一顿后，不忍吴氏就此没落，还是心软决定进行帮扶和资助。罗氏钱庄贷款十多万元给回春药店，替其购进贵重、稀有药材以撑门面，并专派一位资深账房参与回春药店财务管理，掌控收支。吴权本人用度被严加节制，每日只能支五元零花钱。经过一番整治，回春药店确实有了“回春”迹象。不过，罗勉侯也为此承担了很大风险和压力，巨额贷款亏空甚至让钱庄根基发生动摇，一

些股东对其做法产生异议和指责。罗勉侯只得咬紧牙关，奉茶致歉，耐心地进行多方安抚。

回春药店刚有起色，却时运不济又逢战乱。日本货源如太极参、高丽参等断供或被抵制，仓库遭日机炸毁，成缸成缸的招牌高粱酒毁于熊熊烈火中，几乎断了生计。吴权深受刺激，精神失常，经常出门招来十多辆黄包车，自己坐一辆，其余都跟着他在街上疯跑，惹得行人指指点点。罗勉侯无计可施，从此不再插手回春药店事务。不过，此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每每提起便唉声叹气，深感痛惜和愧疚。

战乱波及的不仅仅是一家回春药店，罗家产业以及整个福州商界都遭受了毁灭性动荡。

罗勉侯分别于1919年和1932年两度任福州商务总会会长，任期长达十多年。1919年，日本侵略行径让全国掀起抗日风潮。罗勉侯率领福州商会积极响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福州商界爱国志士不顾个人损失，销毁手上大量倭货，并合资建“国货碑”，以示警醒。众多福州人弃用时髦的洋花布，改穿粗糙的土纱国布；放弃轻便的火柴，宁用打火石；不用洋油煤灯，改用昏黄的烛灯。

“国货碑”后来移置南门兜大榕树下，“文革”期间下落不明，有幸寻回后被福建博物院收藏。福州台江现今仍有“国货路”，似在记录那段历史。

日方怒于中国抵制日货，便处心积虑制造事端。日本驻闽总领事馆捏造日商货物被截事件，

在台江大桥枪杀中国群众十余人，并继续在台江汛、瀛洲道等地追击殴打学生，动用兵舰驶入闽江口耀武扬威。

日军残虐暴行如火上浇油，再度激燃福州人们强烈的爱国愤慨。福州商务总会积极呼吁商户罢市，本地自发的罢课、集会、示威游行亦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力救福州同胞”“血可流，福州不可丢”等口号响彻全国，震耳欲聋。经过一年时间的讨伐和抗议，终于迫使日方调换领事，公开道歉，并赔偿抚恤金。此次“台江事件”后，福建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持续高涨，甚至有些学生砍断三指、割耳，以血沥书铭志，“提倡国货，誓雪国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已呈白热化。福州商务总会快速行动，于9月28日召集500家商号在抵制日货的宣誓书上签字，双杭地区各钱庄带头停止日元兑换业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福州商务总会号召捐钱捐物，积极支援、慰问抗日军队。民族大义面前，罗勉侯等商会领袖及千千万万的普通商户，慷慨解囊，主动、踊跃地做出了应有的表率 and 贡献。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罗勉侯忧国忧民、知大义，很好地平衡了家与国的情怀。他把更多精力放在抗日救亡上，为军队建设、救济难民、募集捐款等到处奔波。1938年，罗勉侯因身心俱疲、积劳成疾和郁郁寡欢，最终病逝于上海租界里。临终前，仍告诫子孙：“爱家须先爱国，爱国即以爱家。”罗勉侯积极抗日的义举得到福州社会

各界的敬仰。爱国将领萨镇冰为其题写讣告，社会名士陈培锬为其撰写传略，林志纯为其写回忆录，以真挚情感、质朴文字，高度赞扬他的德行和功绩。上海和福州分别为其举行追悼会，陈培锬为其撰写的挽联如下：“小别遂山邱，何论居行关定数；徽诚共霄汉，不因生死异交情。”

在日机的轰炸下，罗氏的众多店面、商船、商线都被摧毁得零落不堪。罗勉侯的次子罗郁坦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家业，但家族人多口杂、各怀心思，早已拧不成一根绳、一条心。性命尚且不能完全保全，金钱又怎能留存得住？

家族衰败、没落，罗家各房因生活所迫，开始变卖房产，最后一道财富防线也终是决堤。公房生意中最后仅剩昇和钱庄，而这唯一的支撑因货币贬值亦在1948年停业。罗家漫长而辉煌的商业版图就此结束。

罗家诸多厂房、旧居，或被拆迁，或变换主人转为他途，成为民居、塑料厂等。仓山区上藤路25号原为罗家标志性产业昇和钱庄旧址，亦消逝于滚滚现代建设洪流中。

罗氏印记随着岁月流转不断淡化、模糊，那些繁盛过后的残壁断垣，仍会在犄角旮旯里冒出几株植物和野花，青绿和净白的细碎，虽然比不得玉兰花和三角梅的典雅、热闹，却也还散发着淡淡和畅花香。淡青天色下，知晓那段风云故事的路人，无意间经过，难免驻足片刻，轻叹唏嘘。百年多几代人拼搏的荣华兴盛，终是物非人亦非，唯有过往回忆还残留着余味……

# 宋元时期的东方明珠

邱俊霖

## “泉州”的“诞生”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三面环山，东面是宽广的海洋，其大陆海岸线蜿蜒曲折，延绵四百余公里。作为河流出海口，泉州港背靠连绵起伏的戴云山脉，港内河水域宽阔便于航船进入停泊避风，是一座天赐的良港。但由于人烟稀少，直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吴国才在今天的南安市丰州镇设立了东安县，这是泉州当地最早的管理机构。西晋年间，东安县改为晋安县，隶属当时的晋安郡。到了南朝梁武帝分割晋安郡设立了梁安郡（今福建南安市东丰州镇）。

北方人口的迁入给当地带来了人口压力。所谓“靠海吃海”，聪明的老百姓开始向大海讨生活。时至南北朝，闽南地区出现了以梁安港为中

心的对外贸易枢纽，许多外国人也慕名前来。

南朝陈天嘉二年（561），史料记载中第一个来到泉州的外国人是天竺高僧拘那罗陀，中文名叫作真谛。他是来梁安港避乱的，并在当地九日山上建寺（即今泉州延福寺），翻译了《金刚经》等佛经。真谛的出现，是泉州港日渐兴起的



泉州延福寺

重要标志之一。

几年之后，梁安郡更名南安郡。隋开皇九年（589），中国又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这一年，隋朝统治者撤销了南安郡，同时设立了泉州，这是“泉州”名称的第一次出现。

但当时的泉州并非现在的泉州，其治所在现在的福州。隋朝大业二年（606），泉州被改为闽州。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才恢复了泉州的称呼。

唐睿宗登基后，将治所位于如今福州的“泉州”更名为闽州，而在如今的泉州设置了“泉州”，这个地名源于当时城北有一座泉山（清源山）。自此，“泉州”本“州”终于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 外商云集的国际范儿

时至唐朝中期，泉州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开元年间（713—741），泉州有一位叫林銮的航海家，其家族世代以航海为业。据说林銮的爷爷开拓了从泉州到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一带的古国）的航线，成功打通了泉州与南洋间的贸易往来。

林銮继承祖业，往来南洋等地贸易。因为做生意利润大，当时的泉州人纷纷效仿。清乾隆年间泉州人蔡永兼编撰的《西山杂志》记载，林銮为了导引外来船只安全入港，还曾主持在沿海建造石塔与渡头，这些基础设施为泉州港成为国际大港打下了良好基础。

泉州港的兴起离不开国际因素。当时，众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东方经商，给泉州的对外贸易注入了许多活水。除了阿拉伯人，印度、埃及、日本等来自不同国度的商人也纷纷来到泉州做生意。

当时的泉州到底有多国际化呢？唐代诗人张循之曾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人薛能也感慨过：“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送福建李大夫》）描绘的都是泉州当时外商云集的盛况。

对应中国的晚唐时期，当时阿拉伯世界也有一位叫作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地理学家，编写过一本叫《道里邦国志》的书，里面描绘了公元9世纪的世界贸易路线图。在这本书中便描述了四个中国港口：鲁金（交州）、汉府（广州）、刚突（江都）以及汉久。

有学者考证，汉久便是泉州。

## 崛起于乱世的“刺桐港”

王审知割据福建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吸纳中原避难人口入闽。但王审知去世后，闽国内乱不断，上演了一出出因争权夺位而导致的流血惨剧。后晋开运二年（945），内乱不断的闽国终于被虎视眈眈的南唐所灭。闽国虽然政局混乱，但泉州却相对安定。王潮到福州担任观察使后，他的弟弟王审邽继任泉州刺史，之后王审邽的儿子王延彬治理泉州近30年。

闽国灭亡后，割据泉州的人是留从效。留从

效少年时当过泉州的衙兵，后因军功升迁为闽国的泉州散员指挥使，并在闽国灭亡时夺取了泉、漳二州的控制权，开启了自己在泉州为期16年的统治。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留从效去世，统军使陈洪进趁机夺取了泉州控制权。陈洪进为求继续割据，每年都向宋朝大量进贡。但随着宋军南下，南汉、南唐等国相继灭亡。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被迫纳土降宋，泉州终于进入了宋朝时代。

虽然历经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也有几次权力更迭，但泉州却维持了相对稳定，并没有造成太大动荡。在这期间统治者也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对外则采取开放政策，并设立了通衢、货栈等机构，从而促进了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留从效割据时期，还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他在唐代所建的泉州城基础上又修建了新城，使得泉州城周长达20多里，高1丈8尺，共设7门。新城建设完成之后，还沿城环植泉州的著名风景树刺桐，火红的刺桐花与宏伟的城墙形成了一道靓丽风景线。而“刺桐港”也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蜚声海外。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泉州逆势而上，完成了从兴起到崛起的蜕变。

### 泉州港的辉煌之路

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这意味着在泉州做生意的商人们不必再绕道广州等地，直接在泉州即可办理出口和回舶许可证。



泉州古城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两宋王朝的交替，更是给泉州港的飞跃带来了巨大机遇。由于南宋仅剩半壁江山，加上长年与北方政权对峙开战，军费开支巨大，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困扰当局的棘手难题。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一个叫蒲罗辛的阿拉伯商人往泉州运了一船香料，泉州市舶司按规定抽税，其税收竟高达30万贯。

当年宋高宗和金国签订的和议上，宋廷每年得向金国缴纳30万贯岁币另加30万匹丝绸，后来通过讨价还价降为20万贯岁币加20万匹丝绸。而泉州市舶司海关收入的冰山一角，就抵得上给金国多年的岁币。

当地官员立即将这个好消息上报上级，最后传到皇帝宋高宗那里。宋高宗大喜之下赏了这个阿拉伯商人一顶乌纱帽，并下旨，鼓励像蒲罗辛这样为大宋国库的充实做出杰出贡献者，并赏乌

纱帽。

绍兴十四年（1144）起，宋廷更批准，每年在遣发外国商船时可以由官方出钱，为各国的商贩摆“市舶宴”，让大家吃好、喝好，感受着来泉州贸易的无上荣光。

到了乾道二年（1166），宋廷索性把不赚钱的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予以撤销，只留泉州和广州两个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泉州市舶司的公务员赵汝适还编了一本《诸蕃志》，记载从泉州出发到海外贸易的多条线路，其最远处甚至到了地中海西岸的木兰皮国（今西班牙南部地区）。有学者统计过，当时海外贸易收益最高峰时竟占南宋国库年度收入的1/20。

此外，宋廷还将大批皇室宗亲迁到了泉州，人数在2000人以上，并专门在泉州设置了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南外宗正司。

据《宋史》记载，淳祐年间（1241-1252），泉州主客户20多万户，人口超百万，俨然成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南宋末年的泉州还形成了“蕃坊”，就是外国商人聚集生活的专门区域。

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宋代的泉州港在沿江、沿海、沿桥地区建设了许多塔，它们兼具为海上船舶导航和祈福的双重功能。宋代泉州还建构了密集的桥梁交通网。例如北宋的洛阳桥横跨于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是中国古代第一座跨海大桥。而连接南安与晋江之间安平桥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石桥……



泉州洛阳桥

## 享誉世界的光明之城

“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到各地销售……”1292年，马可·波罗来到了泉州，这里的繁华令马可·波罗惊叹不已。

其实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前的南宋末年，一位名叫雅各·德安科纳的意大利商人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这位旅行家也编写了一部《光明之城》。

在雅各·德安科纳笔下，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江面上帆影密布，江岸上人流如潮，还有人们能够想象得出的装载1000人以上最大船只。拥有世界级的商品集散地，世界上最多、最繁华的超级市场，在城里能听到100种不同的口音……那个时代的泉州，其国际化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代的国际大都会。

由宋入元，泉州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迎来了巅峰。元代版图辽阔，对外贸易具有先天优势，而泉州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也令统治者难以抗拒。泉州归元后，海洋贸易便得到了大力扶持。

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让泉州著名商人蒲寿庚效仿南宋制度，设置市舶司并制定管理办法。蒲寿庚是阿拉伯人后裔，半官半商，而且降元有功，还被授予了行省中书左丞等官职。泉州也是元朝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

元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又对外宣

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意思就是鼓励自由贸易。到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又改变了对市舶的管理方式，实行“官船、官本、商贩”制度。即朝廷出资出船，老百姓可以直接坐官船出海做生意。朝廷和个人互分赢利，这个政策使很多没钱买船舶的老百姓也能够出海做生意，泉州海外贸易也因此空前发达。

同时，泉州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元朝初年，统治者就在福建设立了行省，并升泉州路为总管府，泉州被抬高为福建行省首府的地位。当时的泉州，不仅是东方世界的贸易中心，也称得上是元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政治中心之一。

据马可·波罗估计，当时泉州港的吞吐量比西方的亚历山大港等港口高百倍以上。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耀眼明珠。

## “东方马可·波罗”从泉州启航

除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家来到泉州，中国也有旅行家走向世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元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还是个20岁的小伙子，便开始了自己的首次远航。他的出发地便是泉州港。汪大渊一行人绕过马六甲海峡，沿着印度半岛向西进入波斯湾。出波斯湾后，又沿阿拉伯半岛经亚丁湾进入红海，抵达了位于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再往后，汪大渊还借道埃



及，沿着地中海抵达非洲西北角的摩洛哥，之后沿道返程，并于元统三年（1335）返回泉州，历时5年。

过了两年，汪大渊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远航，出发地还是泉州港。汪大渊游历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岸等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汪大渊的这两次航行，航程数万里，涉足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后来，汪大渊还编写了一本《岛夷志》。这是他为当时泉州市舶司所在地清源县的县志所著的附录。书中记述了他两度漂洋过海亲身经历的200多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史文献。

那么汪大渊出海的动机是什么呢？或许，怀揣的不仅仅是走遍天下的情怀，有后世学者考证，汪大渊《岛夷志略》里列举了许多各地的土产和贸易货物，由此推测，汪大渊可能也是一名商人。

更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认为汪大渊还是最早到达澳大利亚大陆的航海家之一。《岛夷志略》中有关于“麻那里”的描述，据学者考证，“麻那里”是马来语的音译，指的是现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附近。《岛夷志略》中对该区域风土人情的描述也与澳大利亚北部的原始生态十分相似。

后世将汪大渊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作为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伟大成就给后人带来深远影响。而孕育出这位航海奇人的，正是开放的国际化的泉州港，

## 泉州港的衰弱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泉州也未能独善其身。当时泉州发生了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泉州港迎来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战乱平息后的明朝，与宋元时期鼓励贸易的政策大不相同。其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明朝初年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洪武七年（1374），统治者撤销了泉州市舶司。而且洪武年间，朱元璋还多次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同时，阿拉伯帝国的衰弱也使得泉州传统贸易伙伴流失。

永乐年间，泉州市舶司重新设立，但仅允许通贡琉球，贸易规模和方式受到严格控制。明成化八年（1472），位于泉州市舶司被迁至福州管辖。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标志着泉州作为国际大港的历史一步步走向终结。

此外，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侵掠十分猖獗，这使得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受到了巨大损失。晚明时期虽然一度开放海禁，但限制依然严格，加上当时西方殖民者东侵对海外贸易造成的影响，泉州港已难以恢复宋元时代的辉煌了。

在明清“禁海”“闭关锁国”的大环境下，因海上贸易而兴起的泉州港，其衰落自然无法避免。泉州港，这颗宋元时代的东方明珠也逐渐变得黯淡了。

## 在政治夹缝之中

胡映泉

相对于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陈绍宽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的著名海军将领，杜锡珪显得声名不彰，人们对其甚至觉得有些陌生。然而，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他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在整个北洋时期他曾两度出任海军总长，对于当时海军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两大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能审时度势，适时地转到革命阵营中来，对于历史的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1926年，他曾经短暂地代理国务总理，成立临时内阁，同时摄行大总统职权。虽然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由不同的军阀轮番控制，国务总理和大总统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但他毕竟曾经位居过这样的“高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应该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杜锡珪，字慎丞、慎臣，号石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他出生于福州朱紫坊的一个贫穷家庭，哥哥是晚清海



杜锡珪

军的一位军人，影响着他从军的渴盼。他9岁时开始在一家当铺当学徒，后就学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第三期驾驶班。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被派往英国见习海军，回国后在海军中任职，历任“汉圻”快艇驾驶、三副、二副、大副和枪炮大副，“辰字”鱼雷艇哨官，代理“建安”兵船管带、海军警卫队管带、“江贞”舰舰长等职。

光绪三十年（1904），杜锡珪出任当时中国

最大级别的战舰“海天”号的大副。有一次在驶往江阴的途中，管带刘冠雄不听杜锡珪的劝阻，在暴风雨中继续猛进，结果触礁沉没。刘冠雄因这个重大失误被革去管带的职务，杜锡珪则因为劝阻有功，得以晋升，开始在海军界崭露头角。宣统三年（1911）7月，杜锡珪被任命为战舰“江贞”号管带。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杜锡珪奉袁世凯之命率“江贞”号随同当时的海军提督（相当于后来的海军总长）萨镇冰驶往汉口，与陆军一道镇压起义军。10月28日，海军配合陆军炮轰武昌，使起义军受到重大挫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战斗中，他对起义将士的英勇顽强和前仆后继感到敬佩，也目睹清军的残暴，决定离弃腐朽的清朝政权，投靠到革命阵营中来。

于是，他积极联络“海筹”号舰长黄钟瑛，密谋加入起义军。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别劝说萨镇冰率领海军起义。萨镇冰对清朝政权亦有离心，但又不敢公开宣布率众起义，就以“年老不能担任此非常举动”为由予以拒绝，并下令舰队驶往九江，然后乘坐客轮潜返上海，避开了斗争的漩涡，这实际上给海军起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萨镇冰离开后，众人推举黄钟瑛为临时海军司令官，随即在九江通电宣布起义，组成海陆军联合部队参加援皖、援鄂行动。11月19日，黄钟瑛和杜锡珪率领军舰驶抵武昌下游的青山江面，炮轰二道桥和三道桥，协同起义军进行反攻。清朝军队开始败退，起义军光复了武汉三镇。

民国元年（1912）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



朱紫坊杜锡珪故居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杜锡珪和北京政府合流。同年12月，他升为海军上校，出任闽江要塞司令兼代理福建防军司令。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爆发，他随同海军总长刘冠雄前往镇压革命派。民国三年（1914），他出任“海容”舰舰长。翌年2月，被授予一等轻车都尉。在民国四年（1915）12月发生的护国战争中，他加入护国的阵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翌年，他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参加护国军，为护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杜锡珪复归北京政府。袁世凯之后的北洋集团分裂为不同的军阀派系，各派系以武力为后盾，互相争夺北京的政权。海军也分裂为不同的派系，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实力派军阀，成为他们争夺政权的工具。杜锡珪一直隶属于直系军阀，与隶属于其他军阀的海军派系争斗，特别与隶属于皖系军阀的林建章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

民国六年（1917）7月，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准备率领舰队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同时派遣杜锡珪、林颂庄率“海容”和“海筹”两艘巡洋舰北上，将在北京日本使馆中避难的大总统黎元洪接至上海。程璧光特别拨给他们20万元，作为开拔的费用。不料两人到达北京后，经不住段祺瑞的威逼利诱，留在了他的阵营。杜锡珪的倒戈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舰队代司令，不久后又正式出



杜锡珪“鹤寿”摩崖石刻

任司令。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政府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杜锡珪奉命拿捕长江流域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舰船、商船，立下了“战功”。

民国十一年（1922）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杜锡珪主张参战，实际上支持直系，而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则主张中立，实际上支持奉系。杜锡珪派副官长杨砥中到上海游说林建章属下的“海筹”“海容”“永绩”三舰舰长，均遭到拒绝。他又怂恿刚刚卸任的海军总长萨镇冰出面，才说动了三舰舰长。5月2日，萨镇冰率领“海筹”“海容”“永绩”三舰联同第二舰队的“楚观”“楚有”“楚泰”等舰参加直军作战。军舰开到了秦皇岛，对山海关进行炮轰，切断了奉军的补给线路，结果奉军大败，直军控制了华北，也控制了北京政权。民国十二年（1923年），皖系军阀对直系军阀控制海军不满，就用金钱收买杜锡珪所辖的舰队司令和海军舰长，使之倒戈，反直助皖。

民国十三年（1924）10月，吴佩孚、曹錕控制下的直系政权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垮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率部挺进北京，黄郛取代颜庆组阁，摄行大总统职权，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长。11月24日，在张作霖等人的拥立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又任命林建章为海军总长，杜锡珪仍任海军总司令。民国十四年（1925）2月，段祺瑞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命令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率领8艘军舰到鄂东黄州拘捕他。杜锡珪得悉内情后，发出一封密电报告吴佩孚。吴佩孚得到消息后，在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安排下，紧急移往湖南岳阳，摆脱了险境。8月14日，奉军和直鲁联军攻下南口、居庸关，控制了北京。杜锡珪在奉系的压力下，连续三次提出辞职，最后一次致电吴佩孚等人，要辞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8月18日，吴佩孚回电予以挽留，并致电各方，主张由其正式组阁，要求各方推举内阁成员，但张作霖置之不理。10月12日，吴佩孚以恢复法统为名，就任“14省讨贼军总司令”，宣布讨伐奉系。23日，杜锡珪致电吴佩孚，称已联合各省的督军和省长宣布讨奉，并命令第二舰队随时应战。

民国十四年（1925）12月，直系和奉系联合执政，直系重新上台，杜锡珪东山再起，重新出任海军总长。1926年6月，在奉系的压力下，第三次成立的颜惠庆内阁倒台，杜锡珪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成立临时内阁，同时摄行大总统职权。然而，杜锡珪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派系，

夹在直系和奉系的缝隙当中，处处要受到当时最具实力的奉系的掣肘和刁难。他的墓志铭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时论以为公之志意，稍稍发抒，公方痛时事之日，非忠言之不见察。怅然欲自引退，又不欲。遂奉身忝成一己，知几识微之名，戾于丈夫以身许国者之所为，从极艰难，终冀得一，当以收尺寸之效。”在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派系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甚至为反对而反对，因而政权十分不稳定，内阁像走马灯似的更换，政治始终无法走上正轨。而像杜锡珪这样一个并不具有独立政治派系的政治人物，要在不同政治派系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特别是要施展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抱负，无疑是十分艰难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深深的无奈和失望。

9月18日，国务院正举行会议，讨论中秋节军政费的分配方案。军阀张宗昌指使其亲信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军警数百人包围了国务院，要求开饷80万元。他们紧接着包围了财政总长顾维钧的住宅，纷扰了近两个昼夜，最后由杜锡珪出面，议定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开库兑现，并当场签发支票75万元、国库券25万元，才使事件平息下来。财政部四处奔波筹来的100多万元，就这样被军警强行索去了一大半，同时还要支付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三处协饷若干万元，使得内阁连京官度日的生活费都难以支付了。这次事件使勉强拼凑起来，才支撑三个月的临时内阁难以为继。10月，杜锡珪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

不再代行大总统职权，但仍保留海军总长的职务。

民国十五年（1926）7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北伐，不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杜锡珪感到北洋军阀大势已去，因而积极促成海军方面加入国民革命军，给予第一舰队、第二舰队行动的自由。翌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和上海后，他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秘密商议，正式宣告海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并誓师北伐，从而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溃败。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北京政府将海军部、陆军部合并为军事部，担任海军总长的杜锡珪因此去职，成为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任海军总长。经过在政坛上的多年沉浮，杜锡珪已经对参与政治失去了热情，再加上与冯玉祥的交往又受到了蒋介石的猜疑，从此就基本上淡出了政界。

民国十八年（1929）10月，国民政府特派杜锡珪为考察欧、美、日海军专员，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翌年10月，他结束考察回国，编纂了一部《考察欧美日本海军报告书》，介绍了各国海军教育、组织、装备及军用航空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为海军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国二十年（1931）7月，杜锡珪出任马尾海军学校校长，但并未就职。翌年1月，他被聘为国难会议委员，出席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对制定海军对日作战方针，曾提出建议。民国二十二年（1933）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政府，他拒绝与之



杜锡珪（左三）1930年赴美国考察海军时留影

进行合作，离开福州前往上海暂时躲避。福建事变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一次反对蒋介石的事件，当时杜锡珪就在事变的发生地福州，但他拒绝加入这个阵营，并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同年12月28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60岁，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海军将领，就这样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一直都属于直系军阀的阵营，与吴佩孚始终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吴佩孚当权的时候他跟着飞黄腾达，吴佩孚失意的时候他也没有背叛而去。因此，他逝世后，吴佩孚联络旧友黄郛、潘复、陈光远、曹汝霖、于学忠等，在天津为他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并深情地作一首挽联云：“将军本号楼船，忆当年击楫相从，有杨仆威名，风雨同舟图相济；家学人称武库，自汉水沉碑而后，感征南高义，江山如画游！”

# 船政勤工学校三迁记

李玉林

## 从艺圃到艺校

船政学堂一支为前学堂习造船、后学堂习航海；另一支为绘事院、艺圃，其中，艺圃诞生于1868年8月。前者后改称海军制造学校、海军学校、海军飞潜学校；后者改称海军艺术学校，又

经历了勤工、商船、高航的沿革。

艺圃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学徒日间学习锻工、铸工等部门工艺，夜间学习国文、粗浅法文、图算等，学会看懂图纸，按图配制。成绩优良者则升充领班、匠首。当时曾选出一批成绩最优秀者官费送往法国船厂深造，两年后仍回原厂工作。所招学徒多为工人子弟，初入厂时应自备资



马尾船政旧影

斧，6个月甄别后给予膳费，此后按其成绩递增工资。当时京汉铁路正需技术工人，航行内海轮船也需机舵人员。船政局于满足自有各厂需用之后，均酌情派送员工支援，对铁路和河运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13年10月，艺圃被改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制度，厂课列入课程之中，夜间自修不授课艺，学生继续学习法文及初级工程课程。

1917年，船政局把清代铜圆局旧址修建为海军艺术学校的校舍，招收了相当于高中学历的学生200人，根据程度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班，采用英文课本，着重数理化，规定每周学习厂课两天。

1918年，海军艺术学校新招学生120人，分甲、乙、丙三班，由财政局工务长（总工程师）曾宗瀛任校长，延续艺校旧的章程。

1920年冬，曾宗瀛校长逝世，由工务长马德骥兼任校长。这时候，法文班毕业了，全部被分配到船政局下属各工厂工作，同时新招80位学生，分为两班。

1922年夏，船政局委派陈大咸（一说为陈大盛）为海军艺术学校校长，其后马翊昌、萨本炘相继接任校长。

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及南京无线电训练班等部分学生来源，是由福州海军艺术学校选送优秀的未毕业的学生，事实上，艺术学校的学生成为上述各校的

预备生。自1913年至1934年，艺术学校共招19班，最后一班并入勤工学校。

初期海军艺术学校学生，入学半年后举行甄别，留下者发给书籍、伙食费。后因为经费困难，只发给伙食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船政局经费经常被拖欠，艺校的伙食费也不发了，还向学生收取学费。

1934年，因为军费匮乏，海军变更编制，福建船政局被改名为“马江造船所”，福州海军艺术学校被裁撤。当时艺校内有一班相当普通初中程度的学生，即予毕业；其余三班约120人转入后来成立的马尾中学继续学习。

## 勤工学校诞生

海军艺校被裁撤之时，海军界人士以该校培育海军初级技术人才贡献良多为由，公议移归地方教育系统，改名为马尾中学。

1935年马尾造船所所长韩玉衡建议改制，经海军部同意，将马尾中学改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以马尾要港司令部旧址为校舍，设董事会，名誉董事为萨镇冰，董事长陈绍宽（海军部部长），常务董事长李世甲（海军马尾要港司令），董事有陈季良（海军部次长）、陈兆鏞（原福建船政局局长、轮机中将）、陈训泳（海军训练舰队司令）、林国赓（厦门要港司令）、陈培锷（福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叶龙骧（原海军部军需处处





陈钟新

长)，校长为萨本炘（马尾造船所工务长，即总工程师）。学校虽为私立，实际上仍属于海军系统，校董事会按月补助经费，指导办学。

1936年，萨本炘校长辞职，3月由叶心传代理校长，6月20日，经李世甲令推荐，委派海军学校副教官（副教授）陈钟新为校长。该校设航空机械科、船工图算科、机械科和电机科，学制为三年。此年招收初中毕业生，视其程度分别编入相应班级。1937年4月，学校改称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工业职业学校。

### 三次搬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马尾港有海军要港司令部、海军造船所、海军学校、海军练营、海军陆战队……目标大，防御差，常被日军轰炸。

为学生安全起见，勤校战时搬迁到鼓山麻院。麻院是鼓山涌泉寺粮食供应场所，也是禅寺佃农所居的地方，面积很大，足够使用。经与该

寺协商同意，划出院内走廊、晒谷场、边廊和前殿等处，各以蓬栅相隔，以为教室、办公厅和食堂；学生宿舍则设在麻院对面普贤殿和附近牛山乡大王宫，卧室内配备双层床架和桌椅以便休息与自修。教职员则散居各寮房，或傍牛栅，或临碓房。

1938年5月，厦门沦陷，福建省教育厅命令沿海学校各寻地点，迁移内地。勤校于7月搬迁到尤溪县水南朱子祠，为第二次迁校。

朱子祠的左右有开山、镇山两个书院，以雨盖甬道相通。于是以开山书院前后两庑房为宿舍，各室安排双层床架，配备足够的桌椅；其前后进大厅和镇山书院后进大厅及祠的后殿，用木板隔开，充当教室；镇山书院后进两旁宿舍为理化室；其前进大厅安设机械作为工场；办公室则设在前殿两庑房舍；其大厅宽6丈左右，结构宏伟，定为礼堂。

这次迁校，除了将理化仪器、工场机械和一部分稍轻家具运到新校址外，其他笨重的桌椅、绘图桌、宿舍床架等只好全部留在鼓山麻院。为了重新配制桌椅床架，铺设各处地板和修补各处截堵、添造门窗等，学校动员学生中有木工特长的学生尽力担任，其余则雇佣外工，经过三个星期的修缮筹备，才开始上课。

当学生安下心上课后，陈钟新校长考虑到晚上不自修，必然影响学业进步，于是利用搬来的发电机、电动机等由电机科学生安装、架线，自行发电，被当地群众称为“勤校之光”。

此时日寇压境，抗日救亡是全民的责任，勤校学生每两周在尤溪县城文庙演出一次话剧，并轮流下乡演讲宣传抗日救国。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海军江南造船所人员被疏散回原籍，其中许多海军飞潜学校出身的回闽后被勤校聘为教员，师资力量空前雄厚。

同年冬，马尾要港司令部李世甲派陈齐村率领一批伤兵，退驻尤溪县海军荣誉军人休养所疗养，并随带一批军火，计步枪5000支，子弹60万发，机关枪20挺。疗养所设在尤溪县城关帝庙内，场所狭窄，为便于照料，租赁水南民房贮存枪械，把房屋就势改造，暗设套间，掩以木板，并涂抹两遍草木灰隐藏。

1939年夏，航空机械科、船工图算科、电机科三班全部毕业，船、电两科学生在闽江下游轮船公司实习，航空机械科毕业生经省政府咨送重庆中央航空学校深造。此三班学生毕业后，新招五年制造船科、航空机械科、机械科各一班，三年制机械科一班，包括原有未毕业的学生，全校学生300多人。同时，奉省教育厅命令，把勤校改称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尤溪县为闽北匪首卢兴邦的巢穴。其亲信、前南平县长洪钟元及其前副官陈某分任尤溪县商会会长和航运工会主席，两人狼狈为奸，祸害尤溪人民。

1941年4月，福州沦陷，一伙匪徒深夜结队闯入勤工学校寻觅军火，骚扰多时，直到天亮才

散去。所幸陈钟新校长住在县城，学生军训所用步枪70多支虽是废枪，也经严密贮存，匪徒未能搜获。陈钟新校长到教育厅报告了相关情况，请求第三次迁校，教育厅厅长郑贞文指示可以迁移到富屯溪沿岸一带。将乐县粮食富足，可使众多员工免于缺粮困窘，不妨迁移到将乐县高滩（今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

1941年5月，勤校开始筹备第三次迁校。

陈钟新校长先行赴南平找到海军江防司令李世甲申请转运军火事宜。李世甲派陆战队一营兵力提供协助。

在决定迁校前，学校曾自制许多木箱以备贮存校具，其形状、大小仿照军械箱，箱面上均写有“小心玻璃”“不要倒置”“需防潮湿”和“细心安置”等字样；士兵将所有毕业生行李和各箱物件分装上船。四艘运船均有士兵在船首架轻机枪防护。

高滩是顺昌县洋口镇通往将乐县城的必经之路，也是将乐县的一个大市镇，闲置场所很多，有汀州会馆、江西会馆、大黄家祠、小黄家祠、廖家祠、法国礼拜堂（真神堂）、征兵营部旧址和天后宫等处。只是破烂不堪，大多只剩围墙与屋架，又分散各处不相毗连，只得因地制宜，从权分配。

以汀州会馆为办公厅，以大黄祠前厅为礼堂、其后进和两廊及廖家祠为教室，以法国礼拜堂和小黄祠为宿舍，以征兵营旧址为厨房、餐厅、仪器室、卫生室和庶务室。



福建省立高航学校毕业章

各空旷场所中以天后宫最为残破，只剩神座和戏台两处还有屋架，其余均是杂草丛生的废墟荒地。需购买材料重新修建各工场、绘图室、工场指导员卧室和材料储存室等。其他如门窗隔板、宿舍床架、课桌椅等，也得予以配制。所幸当地木料价格低廉，木工工资也低，经过校方努力，最终筹备完毕。

### 建设新校、新专业

1943年，福建省交通厅委托勤校增办汽车机械科，培养汽车驾驶或修理中级人才，于是招生41名，学制三年。每名学生由交通厅拨给大米，职业科两位教员工资由交通厅承担，国文教员和职员各一位也给予一定的津贴。

同年，勤校奉省政府命令，试制了一架滑翔机，完成后由校方护送至临时省会永安展览，轰

动一时。此外，勤校还设计过浅水轮船。

1944年3月，勤校受福建省教育厅委托，创办“福建省省立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简称商船学校），一套班子、两面牌子办学，设航海、轮机、造船三个专业。

为了节省建筑时间和经费，划出廖氏宗祠等作为商船学校教室，另外租赁附近一座民房作为该校学生宿舍和餐厅，操场、理化室、工场等和勤校合用。

### 迁回马尾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校长和一部分职员先回福州筹备，迁校事项交于事务主任阙鉴坚办理。因为商船学校创办于将乐县高滩，福州并无校址，只得先租赁马江罗星塔水菜行洋楼略加修葺，作为学生宿舍、餐厅，又借用大王宫作为教室，并寻找适合地点建筑校舍。

勤、商两校虽属于两个机构，但负责却是同一人，所以迁运过程不分彼此，均统筹办理。勤校移驻高滩期间，全部以残破房屋逐步修成校舍，四年花费巨大，用了许多木料，而马尾原校舍遭受日寇摧毁，想要修复，需要许多木料，所以经过商议后决定：凡是可拆卸的木料（拆卸后于原建筑物毫无碍者）、宿舍床架、本校特制课桌椅和截堵所用的木板和大小门板，均全部拆卸，钉成木排，上载办公桌和滑翔机，顺流而下，直达马江。并雇船8艘，分别运送教职员眷



福建省立高航学校校址

属和学校档案、图书、理化仪器、工场机械等。

勤校原校舍被日寇改为仓库，损毁不堪，修缮需要一定时间，于是先借用海军部设在马尾的海军大学和海军眷属住宅三座略加修缮，作为教室和宿舍，先行上课。

从开始迁运到修缮竣工，约花了2个月时间，勤、商两校至1945年10月底才一起开课。

商船学校曾择定马江附近的快安乡为新校址，但因为建筑、设备费用昂贵，创办人已调走，继办者筹款艰难，建筑校舍问题遂成悬案。经过商议决定，勤、商两校合并，定名为“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简称“高航学校”。

1946年夏，该校正式成立。专业有：机械科、电机科、航空机械科、造船科、航海科、轮

机科，学制或为三年，或为五年，每一科有50多位学生，全校有300多位学生。

截至1947年7月，勤校共培养中级工业人才28组，其中机械科10组、航空机械科6组、造船科5组、汽车机械科1组、航海科1组、轮机科1组。毕业生散布在省内外工业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10月，福建省文教厅根据全国院校调整方案，决定停办“高航学校”。1952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高航学校”的航海专业并入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大连海事大学前身）；该校的航机、轮机、造船专业并入福建省福州工业学校；1953年，福州工业学校造船专业并入上海船舶工业学校（江苏科技大学前身）。

# 刘刚中的学问之道

柏 荣

1195年秋天的闽北，显得格外肃杀，天上彤云密布，一阵又一阵寒风刮过，树叶纷纷凋零，草木片片枯黄。在凄厉的秋风中，一位束衣负笈的年轻人正在麻阳溪畔疾行。他叫刘刚中，六天前从家乡客坊出发，要赶往建阳考亭。老师朱熹的一封书信，如同一声热切的召唤。他仿佛看见老师正倚门相望，不觉加快了脚步，600里的崎岖山路，已然抛在身后。

客坊乡地处福建西南部，与江西省的广昌县毗邻，是福建和江西往来的主要门户之一。过去，客商多在这里过夜歇息，客栈林立，故名“客坊”。客坊也是建州刘氏的过化之地。这里虽然僻远，却书院俨然，书声琅琅。

刘氏入闽始祖刘翱于唐咸通七年（866）率部驻守建州，后来又参加了平叛黄巢的战斗。刘氏历代人才辈出，而刘子翬、刘子羽、刘勉之等一批儒士更为建州刘氏赢得了在宋朝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他们都是朱熹的老师，

刘勉之还是朱熹的岳父。史称：“熹之得道，自勉之始。”而客坊刘氏正是从建阳迁徙而来。他们秉承建州家风，于是，一脉理学芬芳，飘逸在墨田荷塘。

1170年，刘刚中出生在客坊乡的龙门山下。传说，出生前，他的母亲曾梦见一位峨冠博带的老者将一株灵芝插在荷塘里，灵芝瞬间就开出洁白的莲花。刘刚中一生酷爱白莲。故居墨田荷塘中，建有爱莲亭。从小，他就喜欢对着满池荷叶，大声诵读理学宗师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准则。

还在稚童时期，刘刚中的勤学好问就在乡里出了名。他求知欲旺盛，对事物道理总要弄个明白透彻。及长，刘刚中常去父亲和叔父任教的福州濂江书院，和新认识的师友谈经论道，臧否国



客坊乡龙溪村

策。有时就为了朝廷的和或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在争辩中，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无论是对释家、道家抑或儒家的认识都很肤浅。于是他专程到西山千卷书屋潜心学习佛学和老庄荀杨之学三年。

18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刘刚中怀抱《周易》踏上了外出拜师和游学的道路，他一一造访象山精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心中快意如荡春风。在杭州，经叔父刘克明引导，他如愿以偿，见到心仪已久的硕儒朱熹，随即跟随朱熹踏上了返闽的归程。

在五夫里的紫阳楼，刘刚中怀着忐忑的心情加入朱熹的弟子行列。第一次授课，朱熹不问别的，就问刘刚中平日读的是什么书，治的是什么学问。刘刚中回答说自己接受的是家传儒学，但也对黄帝和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以及神仙学感兴趣，读了老子、庄子、荀子、杨朱等人的典籍，

而近来在学问上遇到许多困惑，往往有所思悟时，就一一记录下来。接着他就递上自己的读书笔记《西汉奇语》，向朱熹汇报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朱熹对他的学习精神十分赞赏。短短的几天接触，朱熹已经从心底喜欢上这位朴实好学而且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正式将他收至门下。

朱熹教导刘刚中先把学习《近思录》作为阶梯，循序渐进，还给他改字为“近仁”，让他随侍左右。那一年端午，朱熹正在卧榻休息，刘刚中立在身旁侍候，看到老师醒来，赶忙提出一个问题：“韩愈曾被人批评为腐儒，程颐也被人怀疑奸猾。这样一些大人物尚且如此，那么，我们普通人又怎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呢？”朱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刘刚中：“你来跟随我学习，是谁叫你来的呢？”刘刚中走到座席前恭敬地跪下，肃然回答道：“是我家曾王父（曾祖父）刘冀吩咐我来的。”朱熹知道刘冀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

曾任开封府尹，受奸臣迫害，归隐建宁客坊。刘刚中告诉朱熹说，曾王父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自从杨时成为“二程”的主要传人，在东南倡导道学以来，道学在闽中得到迅速的发展，而未来有希望超越于群儒之上成为一位集大成者，很可能就是我故交朱松韦斋先生的公子沈郎。将来你们中有志于道学的可以前往向他拜师学习。

接着刘刚中又向朱熹诵读了刘冀《云峰诗抄》中的述怀诗：“抚心有恨辜君国，学道无成愧子孙。”朱熹听后，感慨不已。他对刘刚中说：

“刘府尹就是一代儒士啊！”一句话让刘刚中明白了，在学习的道路上，只要坚持信念，不忘初衷，身体力行，不论大人物、小人物，便都可以是我们效仿的榜样。而刘刚中紫阳楼里的“入门十问”，更被认为是朱子理学思想的经典学案。明末清初理学大家黄宗羲因此将其记载于他编写的《宋元学案》中。

得益于当时的记录，让我们见识了800多年前，朱熹和他弟子们的教学风采。

首先，刘刚中向朱熹问入门之道。刘刚中问，为什么说《大学》一书是初学的入门？朱熹对他说，凡人居处，有门必有路，识得路，方到得门，到得门，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学》的纲领条目就是门。这里是学者的根基。读书要先明白门径，才能升堂入室。接着，刘刚中再问学问之道。他问，人不学不知道。但是，学习知识在读书上体现，明白道理在做事上体现。那么，一定要读书才可以做事吗？朱熹告诉他，当然是这

样的。但不论是读书还是做事，都是为了学习知识、阐明道理，不能将学习书本知识和运用知识来做事截然分开。只会夸夸其谈和只知埋头读书的人，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还有知和行的关系，也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究竟谁在先谁在后，哪个轻哪个重？这是当时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命题。朱熹首先肯定了知在行先，他同时阐述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的知行关系顺序，但又强调了知轻行重但知不轻的辩证思想：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熹更形象地将知和行比喻成人的两只脚，如果一只脚强健但另一只脚无力，也是一步都前进不得。

年轻的刘刚中很快就在众弟子中脱颖而出，与跟随朱熹多年的刘燾、刘砥、刘砺并称“朱门四刘”。

而朱熹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动荡时期。朝廷不断地征召，他也以脚疾不断地上表力辞。年届花甲的朱熹，只想和自己的弟子们在一起切磋学问，而不愿在官场上白白耗费精力。于是朱熹在建阳着手创办自己一生中最后一座书院——考亭书院。但1194年八月五日朱熹又被朝廷征召，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给宁宗皇帝讲解道学的老师。世事难料，担任皇帝老师职务的诏令下发仅仅46天后，他就遭到当朝权臣韩侂胄弹劾，被罢去官职。十一月又重新回到建阳考亭讲学著述，从此真正息影山林。



建阳考亭书院

随着书院生员的日增，1194年末，朱熹在清澈的麻阳溪河中心一个小岛的沙洲上建造起一座授课的学堂，名为沧州精舍，并自号沧州病叟。由于主政的韩侂胄恣意弄权，借皇权势力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尊崇程朱道学的朝廷大员。而后更进一步演变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庆元党祸”，道学被诬指成“伪学”加以禁止，朱熹也被列入59个“伪学党人”的首批名单之中。

在“党禁”风声最为紧张的1195年，朋友们劝朱熹遣散学生，关闭沧州精舍，朱熹一笑置之。他还应门生故旧之邀到连江、古田、泰宁、福州等地讲学。为朱熹人格力量所感召，四方学子不远千里纷纷负笈而来，他们乐于与朱子交游，无怨无悔。

这年刘刚中25岁，就在这个初秋的季节，他刚刚通过秋试并获得次年春试的资格。但因受庆元党禁的影响，被地方官员列为涉嫌“伪学”的人员。他没有为此后悔，改变自己的初衷，毅

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开办的“云际书院”，来到考亭，正式投入朱熹门下，成为“沧州诸儒”之一。

朱熹的女婿黄榦告诉朱熹，刘刚中是主动放弃当年乡荐，丢掉考取进士的机会来考亭求学问道的，运交华盖的朱熹老先生听了更是嗟叹不已。

1200年，朱熹去世后，刘刚中回到故乡密林深菁之中的五龙山和严峰山聚徒讲学。从学者络绎不绝。

嘉定四年（1211），庆元党禁正式解除。41岁的刘刚中得以走出深山，参加京城会试，登进士第，历任汉阳军主簿、兰溪县丞。不过，在刘刚中心中，始终有一道春风、一缕阳光，还有那座屹立在麻阳溪沙洲上的沧州书院。1226年，他辞去鄂州令，回乡一边创办“琴轩书院”，一边专心研究绍兴戊午及庆元文案。他还数度应黄榦之请到福州濂江书院讲学，与黄榦共同创立了“勉斋学派”。



# 魁龙坊名人逸事

吴安钦

连江古城西南街里有一处名曰“魁龙坊”的地方，在它不知沉默了多少个岁月之后，突然有一天热闹起来了。此起彼伏的马头墙，沧桑厚重的旗杆夹，还有灰墙黛瓦、斑驳古柱、雀替纹花、铜器门环，以及可与榕城三坊七巷相媲美的寿山巷、璉巷、安平巷、紫薇巷、后门田巷、祠堂弄、三公巷、同里巷，还有已经形成或将要建成的天王前街、上林街、王步街架构的“三街一坊七巷”历史文化风貌区，引来众多游人的脚步和目光。

原来，这个魁龙坊里的归园、雪里小院、竹筠院、玉壶庐、修齐斋、清德院、游璉故居、倦游庐、杏林院、三复园、三井园、万园公馆、菩提苑、四簪楼等28座古厝，每一处都有它的由来和故事，而且还从一座名叫化龙的小桥上走出了郑鉴、常挺、孙钦、游义生、游璉、吴文华、陈第、董应举、吴鹏南、胡绍峰、陈清桂等一大拨名人。自唐至清，从这里走出的进士多达367人！当然，最热闹的要数明代，出了一位尚书、一位布政司和一名文武兼修的将军，并传扬着他





们许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比如，“一门三举人”“兰台七御史”“薇省传香”“进士吞金”“九进十落”“桥头饯别”等。更引以为傲的是，这些人物中，还有两人与戚继光和俞大猷有着非同一般的交集。

尚书就是吴文华。他是魁龙坊里走出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吴文华自小苦读经典，通晓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研讨兵书韬略，腹罗锦绣，出口成章，有才子之称，素有“济苍生，安社稷，立功扬名”之抱负。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次年初任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不久升迁兵部武库清吏司署郎中。嘉靖四十二年（1563），擢升湖广按察司提学金事，领提学道。此后十年，历任四川右参议、督桂学、参鲁政、擢赣藩，转授河南左布政司。吴文华历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时人赞颂其“骏烈光乎一代，清风冠于八闽”。明万历元年（1573），神宗登基，下诏表彰天下施政成绩超群人物25人，吴文华名列榜

首。当国宰相张居正贺以《复吴小江藩伯首举卓异书》，云：“顷者主上特发渊衷，举行旷典。而公以卓行清望为天下举首，自此海内多良吏矣！幸甚！今赖天地宗社之灵，中外颇称宁谧。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顷蒙天语叮咛，亦以爱养百姓加急。愿公思所以奉宣德意。加惠元元。”其时，吴文华正在河南布政使任上，河南百姓闻讯欣喜讴歌云：“阳春有脚转夷梁，父老欣欣喜若狂。争道今来吴岳牧，曾将膏泽润群芳。”卸任时有“羨金万余，藏吏具籍请纳行李”，吴文华坚决不受，将这笔钱充实府库。士人赋诗称赞：“泽传君子自延陵，派衍如川远愈增。此日承宣征足信，黄河千里颂澄清。”明万历三年（1575），他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是年，他巡抚广西，此时当地旱情严重，而地方官吏照样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瑶民骚乱。吴文华下车伊始，便请赈恤，募垦荒，核田赋，均驿传，然后着手整顿兵戎，加强兵士训练。不到一年，先后平定南乡、陆平、周塘、板寨诸瑶和五指、白冒

诸侗，招抚民众2万余人，建堡21座，垦荒2万多亩，广西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治理。明万历四年（1576），柳州北山叛乱，吴文华采取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战术，趁叛众懈怠之时，连破70多寨，斩首4800人。是役，吴文华所率兵力不足1万，竟能以少胜多，为明朝立下大功。明万历十三年（1585）初，广东发大水没庐舍，吴文华亲率小艇救落水百姓，并开仓发粟，赈济灾民。又上疏朝廷，请求留余金7万多两，以备赈济所需。此后，两广社会日趋稳定，士民安居乐业。明万历十五年（1587），吴文华任南京工部尚书。数月后，改任兵部尚书。至今，连江百姓依然尊称他为“吴尚书”。

从化龙桥走出的第二个大人物是陈第。陈第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旅行家、藏书家和音韵学家。他有南方徐霞客之名。史书上未见其科试中举记录，可见他并非从科举步入仕途之人。但陈第是个藏书大家，藏书量多达1万多卷。除读书之外，他最大的兴趣是旅游。33岁起，陈第开始游览天下，一边旅游一边读书。应该说，陈第是连江县第一位最有成就的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善于读书，且爱读兵书，因此，他成了文韬武略之人。明万历三十年（1602），也就是陈第62岁的这一年，他仍随沈有容赴台剿倭，在深入考察了台湾高山族风土人情后，写下影响深远的《东番记》，这是我国首部研究台湾的珍贵历史文献。他当上军官，纯属偶然。那时，连江县倭患最严重的是罗源湾西岸的马鼻。倭寇数百人集聚

马鼻礁屿上。四周均为烂泥滩涂，船不能通，步不能行，进军受阻。戚继光初来乍到，面对入地则腿脚陷泥的困境，一时无策。这时，陈第献上一计，即大量制作使用渔民讨小海所用的土橇，武装戚军，从而获得全胜。剿灭倭寇400多人，解救被困百姓2000多人。因献策有功，得到戚继光和俞大猷赏识，也正因为此，陈第步入军旅生涯，与戚、俞二人成了莫逆之交。俞大猷赞誉他“子当为名将，非书生也”。此后，俞大猷召陈第到他的幕府，教以兵法及其用兵谋略，使陈第在军事实用技术上大有长进。陈第37岁的这一年，被推荐到华北古北口任潮河川提调。不久，他被擢升为前营游击将军。陈第的精心防守，使北方鞑靼部落不敢轻举妄动，北方边境多年安然无恙。

陈第比吴文华整整年少了20岁，但他们成了忘年之交、君子之交。明万历二年（1574），陈第补授五军四营中军，于八月领京营军3000出蓟防秋。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的吴文华在南宁阅邸报，赋诗寄往蓟门，为陈第壮行，诗云：

急思报主换征袍，神剑双飞意转豪；  
亲鼓貔貅清大漠，兼围鱼鹤净洪涛。  
旌旗影动军声壮，刀戟光横杀气高；  
百尺高楼谁可及，元龙本日共吾曹。

明万历十六年（1588），吴文华不畏廷杖，在南京兵部尚书任上，率九卿毅然弹劾皇帝亲信太监张鲸“怙恶不悛”，疏三上不听，遂“引疾乞

休”。后来，万历帝又屡下诏书，工部尚书三年以待，吴文华力辞不赴。陈第为此赋诗《春日劝驾大司马》赠予：

征书几度下江城，高卧东山出不轻。  
帝为苍生思柱石，诏从青琐动千旌。  
九霄事业三朝重，五岭烽烟一剑清。  
客拟骊歌俱献赋，最宜箫鼓带莺声。

陈第的官场处境与结局和吴文华几乎一样。论官阶、勋爵、权势，陈第无法与吴文华同日而语，他最大的官职“游击将军”是个无品位的官衔。但陈第位卑未敢忘忧国和不畏权势、清正廉洁的品德可与吴文华相媲美。明万历十年（1582），他的顶头上司制府（总督）吴兑的表弟周楷，仗吴兑之势，以书札礼帖托陈第为其配卖青布5000匹于军士，每匹值银一钱，索价二钱。陈第不愿克剥军士之俸以奉权贵，力辞拒之，却遭诬陷，遂愤而辞官回乡，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铮铮铁骨。回乡后，陈第便在魁龙坊西边建起了一处“倦游庐”。从此，他开始了读书著述的日子。他的音韵学专著《屈宋古音考》和《读书拙言》等十多部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陈第霁月光风的胸襟、气度与吴文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时，吴文华赋诗慰藉他的年轻老友：

浮云世事总纷纷，聊向城西作隐君。  
雨足春犁常自理，月窥岸牖每平分。  
投林袖剩三边略，闭户襟披百代文。  
素以颜龄看独健，即求隐卧未堪云。

明万历二十八年（1598），吴文华病逝连江，此时的陈第正在广东旅游，翌年春，他才得知噩耗，含泪赋诗著文，痛悼老友。文曰：

“呜呼，痛哉！老先生学术极其端纯，充养极其完粹，功业极其炳耀，操守极其廉贞欤！夫文章翰墨妙绝当世，史策旂常皆纪之述之，无庸更仆矣。独计归田以来，数年之间，赏花观鱼，吟风啸月，第未尝不从，从未尝不饮，饮未尝不醉，醉未尝不高歌矣。老先生齿长二十年，巍然先辈矣。爵义最尊，足迹半天下，阅人最多。雅不喜饮酒，即燕居无狎容，乃大破调格，嗟嗟此其故，岂能与世俗道哉？”

他们的友谊，青史流芳。

游璉，是从魁龙坊游家厝里走出的又一人物。他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成为明代著名的八闽贤士之一，与连邑的吴文华、王德溢、陈第、陈坦、孙用并称为“六才子”。游璉历官先后为江西新建知县、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山东登州知府、海南兵备副使、江西省布政司参政。他为官清廉，“厘宿比，裕国储，井井有法”。出使登州，“归逃民，赈饥谨，疗疫疾，决疑狱，惩贪酷，兴学宫，育人才，群邑大治”，重修蓬莱阁。当地史家称他可与宋代任登州太守的苏轼相媲美。为政海南时，桃源、华林一带强盗烽起，“璉乃合建昌兵，以计剿之”。在海南兵备副使任上，匪首“聚众剽掠为民患，璉请于督府，提兵直捣其穴，计擒首恶，余党悉平”。当地百姓感念其功，为其建生祠并立“平



黎之碑”一块。

关于游璉，传为奇谈的是，他与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游璉任职登州知府时，一天巡察狱牢，一脚踏进狱门，便传来一囚妇的含冤啼泣之声。一查，原来这竟是有孕之妇。深查其案时，发现案情确实有冤。游璉立即修正其案，为有孕之妇平反昭雪。不久，孕妇生下一男，这男孩正是戚继光。后来，游璉到江西为官，任布政司参政，这职务相当于现今的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想不到的是，戚继光 17 岁的这年随其父从山东迁来江西高安县。是年，戚继光准备以童生（秀才）身份参与乡试。高安童生大哗，惧怕戚继光占据了该省仅有的 50 个名额之一。游璉正主持这一季的秋闱，见景，即上奏朝廷，为戚继光特增一个名额，并亲到高安县当众宣示。更出乎意料的是，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平倭来到连江，使用陈第所献的平倭之策，在马鼻全歼 400 多个倭寇后，记得他母亲的叮嘱，便从

马鼻海边来到魁龙坊拜访游璉，以表感激之情。五月初四，戚继光一身戎装移师连江县城。这一天，万人空巷，连江百姓扶老携幼早早等候在魁龙坊，争相一睹这位威武之将的风姿。这是游府最热闹最荣耀的一天。遗憾的是，游璉已于 1566 年逝世。戚继光在游璉故居拜过其遗像后，来到玉泉山上的游璉墓地拜谒，见其墓地简陋，即出资在墓厅前建起了墓亭，亲自书写“春雨亭”三个大字，寓“春风化雨感载沐恩”之意。

游璉和吴文华、陈第一样，也文武兼备，著述颇多。著名的有《海道经》《蓬莱集》《平黎集》《东行稿》《南行稿》《少石文集》等。

魁龙坊，因为这些星汉一般的历史人物和传奇故事而名声大噪，享誉四方，引得今人慕名而来，惊叹不已。

如今，漫步魁龙坊，走过化龙桥，仿佛穿越了一回宋朝、明代。

## 华林坊状元第

仲 佳

不要小看已经消失的屏山山麓华林坊，这里还出过状元。状元有文状元和武状元之分，但一般文状元更有名望，屏山出过的状元就是文状元。

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福州进士数排在全国前列，一共出过 19 位状元，号称“海滨邹鲁”。但在清代，福建一共只有三名状元，其中福州两个，一位是林鸿年，还有一位是王仁堪。

林鸿年是清道光年间状元，比王仁堪早 40 年。据悉，林鸿年祖籍福清，中状元后，把家安置在华林坊 4 号（华林坊坊头，即现在的三角井

公安厅至邮储银行一带，民国时期柴井医院附近）。林鸿年状元及第，可谓光宗耀祖，为华林坊历史增添了极大光彩。

林鸿年的科举考试，在好多环节还真有点运气。通过乡试中举后，他参加过进京的会试，但没考上。幸运的是，1836 年，光绪皇帝加了个“恩科”，学子们只隔两年就可以参加这一轮竞争，减少了时间成本。林鸿年运气不错，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到殿试这关。

殿试前，主考官们要向皇帝推荐几份优秀



现在的华林路邮储银行一带



林鸿年形象复原塑像

考卷，其中，何绍基和林鸿年的考卷水平甚高，皆在此列。何绍基的卷子书写漂亮，诸多考官都认为本次殿试，状元非官二代何绍基莫属。这里要讲一下本次考试考官的组成，考官中有位廖鸿荃，任尚书，也是福州人，家就在三角井后面现在的西湖宾馆的悦华酒店位置，按照老乡回避制度，他是不能当考官的，但不知什么缘故，本届考官他却当得妥妥的。还有一位考官姓卓，与何绍基同为湖南道县老乡，不知为何也没回避。卓考官在发达之前年轻落魄时，曾经去讨好过何绍基的父亲，想要认认老乡、找找靠山，但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被何绍基父亲当众取笑了一番，卓考官脸红耳赤、落荒而逃，就此对何家耿耿于怀。现在，卓考官大权在握，何绍基想出人头地？没门！卓考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何绍基的考卷上，如果横读，有“大行”两个字并列（古代人书写是竖着写的，实际上，是一列中有个“大”，在另一列中有个“行”）。这个“大行”什么意思呢？在文言中，就是皇帝驾崩的意思。这还了得，诅咒皇帝呀，要让皇帝发现，考官们都得掉脑袋。结果显而易见，为保各自平安，他们迅速将何绍基的考卷抽出来，心照不宣不再提及。就这样，何绍基跟几个“甲”都无缘，更谈不上状元了。评到最后，林鸿年“捞了个状元”。林鸿年状元及第后衣锦还乡，接着看中屏山的地理位置，在华林坊置办了物业，是个四进落的宅院，高阶回廊、古色古香。

他在官场上最有名的是当过琉球国册封使。

琉球国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明清时期，琉球是中国的“藩国”，藩国的老国王一旦去世，子嗣要继任国王，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册封。每次老国王和新国王的交接，中央都要派出册封使去宣布并犒劳新国王，以使新国王名正言顺。要当上册封使，首先讲究人品好，要不然到了藩国，一旦花天酒地，就有损中央王朝形象。林鸿年品行端正，从福州率船浩浩荡荡历经风浪到达琉球，在琉球出色地完成使命，还自掏腰包捐助当地的贫困户，博得琉球百姓的爱戴。更让人交口称赞的是，国王给了他很多赏赐，他皆谢绝，仅收下几个海洋生物标本当小礼品。回国后，皇帝大悦，赞赏有加，其仕途顺畅，一直当到云南巡抚。

从林鸿年谢绝琉球国王赏赐这点可以看出，他“书生气比较浓”，在腐败官场风气中可谓一股清流。云南巡抚任上，碰到太平军起义，被周边省的几个官员抓了小辫子，告到朝廷，官帽没了，被遣回故乡福州。这时，恰逢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正谊书院，正想找个主持人，就请才华出众的林鸿年来当山长。这个书院就是现在福州一中的前身。林鸿年任山长近20年，陈宝琛、林纾、陈衍等都是他的学生。当年的书院地点在三坊七巷，所以，三坊七巷的名人榜，也将林鸿年列入其中。

林鸿年有几个后代非常有名。他有一个孙子叫林文，又叫林时爽，是辛亥革命的英烈。小时候，林文就成长在华林坊状元第内。在华林寺，林文找和尚学习武功技艺，据说练就了一身功

夫。后来，在时代潮流下，国内有许多年轻人到国外留学，林文也到了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反清组织同盟会，是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他为人豪侠、重义气，孙中山称其为“林大将军”。当年，孙中山的同盟会有几个支部，其中的“福建支部”部长就是林文。林文在同盟会的报纸《民报》任经理，其地位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曾经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但皆失败，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11年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黄兴、赵声是具体的策划领导者，许多福州人千里迢迢远赴广州参加这次起义。在这里，福州的“三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林”，即林文、林觉民、林尹民，又称“大林、中林和小林”。“三林”中，林觉民的名气更大，因他在起义前写了一封著名的遗书《与妻书》，但在这个过程中，林文才是具体的领导者和策划者。

这次广州起义中，林文、林尹民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被子弹击中，慷慨就义，林觉民被俘后就义。

这是林鸿年的孙辈。再下一代，林鸿年的一个孙女生下的两个孩子，算是林鸿年的曾孙辈吧，亦非常出色。大的曾孙女叫陈舜瑶，是中共老党员，早年去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过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陈舜瑶的夫君那就更有名了，叫宋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和国家领导人。



后中为宋平，前为陈舜瑶和陈俊武母亲，一直随陈舜瑶生活，帮助料理家事

陈舜瑶的弟弟叫陈俊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陈俊武曾经随母亲在福州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林鸿年的四进状元府已经变成了大杂院，林家后代就住在最后的院落内。陈俊武也在此住过短暂的时间，后来去了东北和河南等地。陈俊武是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的国宝级人物，是我国著名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煤化工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在石化行业，可谓赫赫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林鸿年还有个曾孙女，叫陈舜英，是陈俊武的堂姐，也是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过全国妇女干部学校的校长兼书记，这个学校是现在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

林鸿年状元府，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拆掉，时间不很长，本应留下许多资料，可惜都已散佚。



# 水玉巷乡愁

葛 椿

在乌石山和安泰河之间有一条水玉巷，靠近光禄坊，南北长大约 60 米，东西宽 2.5 米左右。我小时候住在仓角头的葛家宗祠里，当时宗祠的果园门就通往水玉巷。宗祠门前有一株蜡梅树，枝繁叶茂，迎风摇曳，煞是可爱。一到冬天，梅花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我常会摘下几枝，送给亲朋好友，得花、送花者皆大欢喜。

记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安泰河的水还是非常清澈的，到了夏季，孩子们就会下河游泳。而每到周末，家住水玉巷的小朋友还常常相约到河边钓螃蟹。钓螃蟹前，先要动手做一副钓竿，所需材料是一根大约 1 米长的竹竿；之后，到乡下马厩去偷拔雄马尾巴的毛做成活圈，套在竹竿顶端；再备好饵料。一切准备就绪，就出发钓螃蟹。这里面可有学问了：比如一定要等到夏日雷阵雨过后的个把小时，螃蟹就会从河底靠岸的洞穴栖息地爬出来觅食。此刻就是钓螃蟹的大好机

会。孩子们全都屏住呼吸，将手中的钓竿慢慢地向螃蟹靠近，贪吃的螃蟹往往会上钩。小家伙们个个眼明手快，把钓竿往上一提，一只只红毛膏的螃蟹就钓上来了。大家一路沿河行动，个把小时就会钓上一小桶。回来分给左邻右舍做成螃蟹酱或螃蟹酥，作为早餐小菜，好吃极了。

家住水玉巷的主妇们，大凡在早晨九点多，三五成群，右手提着竹篮子，里面放着家人待洗的衣服、被褥和肥皂，左手提着两尺长的杉木棍，来到安泰河沿码头。洗衣妇卷起裤管，下到水里，取出衣物，放在石头上，抹上肥皂，右手举起木棍，一棒一棒地打在衣裤上，霎时，噼里啪啦声响成一片，如同奏响一支美妙的乐曲，和她们每个人嘴里发出的咯咯笑声交织在一起，十分动听。清澈见底的水中，小鱼儿左摇右摆，时而将头伸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嬉戏。活脱脱一幅“榕妇浣衣图”。



安泰河



玉山老佛殿

街头的卖菜大叔打着哈欠，竹椅上的阿姨织着父辈或孙辈的毛衣，水龙头底下依姆洗菜淘米，依伯在路口阅报、话家常，人流里小贩与买主讨价还价……每天的水玉巷，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谁家的女儿出嫁，迎亲队伍排成长阵，欢乐声与鞭炮声响彻云霄。晚上，华灯初上，亲友乡邻相聚吃喜酒，巷子里不时传来“对啊！对”的酒令猜拳，把婚礼推向高潮。

水玉巷北，有一座玉山老佛殿，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1020平方米，坐南朝北，四面是由红色土砖筑成的风火墙，共二进，有三扇对开门。中门门额上镶有竖式青石匾额：西侧拱门门额上有“过去”二字青石匾额；东侧拱门门额上有“未来”二字青石匾额，墙面雄伟壮观。为西禅寺一处下院，在三坊七巷改造中，列入文保单位。在

老佛殿后的高墙上嵌有一块“玉石山古迹”的青石匾，前有古井叫“闽山井”，福州人说的“三山藏”之一的“闽山”就藏在这个井下。

虹桥，横卧在安泰河上，始建于五代，为木板桥，后易为石桥，为单跨式平梁石桥，南北走向，长5.35米，宽3米，桥由4根条石与多块石板纵横衔接，西侧护栏由6根0.8米高的望柱共4块栏板相连而成，东西桥梁之间镌有一行铭文“万历壬寅年（1602）仲春坊仝立”，这是个很有文物价值的桥梁。1992年列为“琼河七桥”之一，是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905年建的观我小学，位于水玉巷西面。当时，观我小学是榕城辛亥革命发源地之一，其前身就是清儒林郎葛蔚庵创办的葛家宗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我小学改为仑角小学。观我小学校长蒋筠系同盟会员，后任福建都督府民政

科长，多次在锦巷七星庙群众大会上登台演说，语气激烈以致得罪福建都督府政务总理彭寿松。1912年4月29日，彭寿松派亲信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玉山涧河墩刺杀蒋筠，引起省城舆论哗然。观我小学五六年级班主任林秀慧就是广州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胞妹。

从水玉巷富月埕1号曾走出一位红色地下工作者王正均。牺牲在台湾的王正均烈士，是吴石烈士的副官。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因被叛徒告密被捕，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英勇就义。而王正均因为吴石递送绝密情报，也于1951年7月被执行枪决。曾任福州二中校长，福州八中原总支书记的王蔼群，是王正均侄子。两岸开放探视后，他曾历尽千辛万苦，专程赴台寻找王正均的遗骨，终于如愿以偿。王正均烈士的忠骨于2011年回到他的故乡福州。

水玉巷1号大院里住过画家唐国光，他一生善于画牛，主要是水牛。提到墨牛，画界早有“北李南唐”之说，“北李”指的是国画大师李可染，“南唐”指的就是福州的唐国光老师。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史馆员，也是我在福州二中初中时的图画老师。那时，我的美术功底较好，特别对写生很感兴趣，他很赏识我。我家住在仓角头葛家宗祠，和他家离得很近，当得知他家老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时，在学院居委会工作的我母亲对我说，我们家中午多煮一人饭菜给国光老母亲，你送过去。唐老师很感动，特地到我家当面说“谢谢”。

国光老师画牛，倾其一生精力，画的水牛栩栩如生。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农村观察牛的生活形态。春天水牛在地里耕田，夏天水牛在塘中乘凉，牧童骑在牛背上的情景，他都入微作画。他生于1913年（农历癸丑年），属牛；他的卒年1997年（农历丁丑年）也还是牛年。他出身贫寒，父亲打铁，母亲卖茶，他从小就替人放牛。他家所住水玉巷，之前也叫水牛巷。从教后，到二中更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一辈子和牛结缘。生前出版有《唐南画册》。

从水玉巷还走出音乐家王圻，他自幼受父兄的影响熏陶，13岁时入“小潮音”飙歌社，拜郑彦先为师，工旦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福州飙歌研究社任首席演奏员，还整理传统曲目、唱腔、曲谱并参加各种文艺演奏活动。他先后改编创作《北云下山》《翠裙腰》等民间曲目，曾于1958年作为福建省音乐代表团赴京参加首次全国音乐周的演出曲目，并由上海唱片社灌制成唱片。他参加制作了民间器乐“十番锣鼓”和民族奏曲《榕城春晓》，已成为榕城的经典民乐。

水玉巷里曾住过三位在福州市颇有名气的医生，其中赵棻是福建省中医院原院长，省人大代表，也是一位德馨技高的老中医，经常为了根治病人的疑难症而废寝忘食，免费为一些生活困难的病人治疗。享年91岁，其医德医风，至今让人缅怀。

在水玉巷漫步，童年的记忆，俯拾皆是，温暖着我的心田，令我徜徉不已。

## 叫醒宋代福州的那滴水

冯 涛

宋熙宁三年（1070）的一个清晨，铜漏指向夜间的最后一个更点（相当于今天的5点），守漏人向外报时，鼓吏敲鼓报更，更夫敲钲报点，鼓声与钲声以福州威武军门谯楼（遗址在今福州鼓楼前公园）为中心向城内传去。寺僧撞钟以之为准，僧人们开始早课，诵经的声音在三山之内升腾。

尽责的官员已出门上班当值，另外一些则还窝在被子里，地方官不同于中央官员需要早朝，颇有“上班自由”的味道。大名鼎鼎的文彦博任职平遥县时称：“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绸被，拿出头来放早衙。”这幅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就是不上班的样子倒很符合今天一些都市人的追求。

宋代实行百刻制，将一天划为百刻，白昼占五十五刻，黑夜占四十五刻（冬至、夏至白昼与黑夜的刻数会发生变化），夜又分为五更，按制城内民众不许随意出行。五更将尽意味着夜的结

束、昼的开始，百姓可以随意地出入，三三两两的行人赶着去城南江边的无诸市做生意，昨夜宿于城外西门驿的官员应声入城，而这时福州长官程师孟已完成升早衙的一系列工作，他登上州府的谯楼写下一首诗：

晓登威武鼓角楼

百尺谯门戍万兵，黄昏初动画龙声。



今日福州鼓楼前公园



晋子城通行画本



今日虎节路

铜钲犹是闽王点，银科才悬汉守更。  
四面僧夸金作界，半年人看玉为城。  
官程稍近千余里，不到侬家向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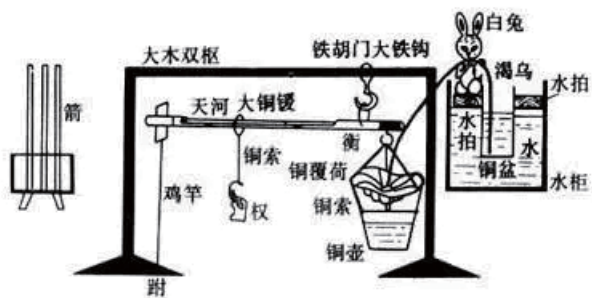
城中百姓以为这只是一次日常的晨鼓，然而主导鼓声敲响的是一套全新的计时系统。

宋熙宁元年（1068），程师孟知福州，他在此上任任职近两年。程师孟是苏州人，在宋景祐元年（1034）到元丰四年（1081）的官员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任职地方官。《宋史》给他的评价是数知大郡，政绩斐然，而他最擅长的是“城市规划”。他在夔州时修常平仓，在洪州时开沟修堤，在广州时筑西城，荒废已久的福州子城以及府学（今文庙）在他的任内得以重获新生。

福州的子城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被毁，故址之上留着残垣断壁，百姓们对此颇为不满。程师孟刚一到任便着手扩建子城，周回 950 丈（周长约 3000 米）的子城用了不到一年便已完工。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子城内配套建筑的问

题。子城始建于晋代，唐末重修，一直都是官廨的主要分布区，至宋仍是如此。节度使和州府等重要公廨都安置在子城之内，一州宣教、风化的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大书法家蔡襄担任福州长官时，曾在子城的东、西总门外立碑告知百姓应“去巫”，而子城的正南门（虎节门）在宋代立有至少 5 块宣政碑。

沿着子城内南北向的“九轨”大路（宽在 20 米以上，是宋代福州最宽的路）向北行至今日鼓楼，又立有一道大门，这道门便不可随意进入了，它是宋代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的大门，前身是唐代的州门，后称威武军门，宋沿用，亦称威武军门。门既是界限又可互通的空间特点象征着公与私的交界，是民众与官府交流的节点，没有比衙门能更好地向大众展示权力与政绩的地方了。宋嘉祐八年（1063），前任长官元绛就已重修威武军门，程师孟是一位善于“规划”的官员，他注意到了重修中的缺陷。



秤漏示意图



宋人杨甲编纂《六经图》里的漏刻

按宋制，各州县都应立有谯楼，负责校准时间，并以鼓声、更夫的形式传递时间信息，而当时的福州城竟还在沿用王审知时期设立的秤漏系统。秤漏是一种流行于唐宋间的计时器。秤漏主体部件有一只供水壶，通过一根虹吸管（即渴乌）将水引入一只受水壶（称为权器）中。权器悬挂在秤杆的一端，秤杆的另一端则挂有平衡锤。当流入权器中的水为一升时，重量为一斤，时间即为一刻，秤杆上的时刻随之发生变化。

在程师孟看来，福州既然已是大宋王土，便当以大宋百刻制为准，谯楼上响起的应当是大宋官方规制的时间，他旋即委托一位姓叶的下属官员制造一种以百刻制为准的计时器——铜壶滴漏。

铜壶滴漏通常设有四个铜壶，成梯阶排列，自上而下为日壶、月壶、星壶和底壶。日壶、月壶、星壶三壶底部均有一个小孔，嵌有铜壶嘴，伸向下一个铜壶口，向下壶滴水。由于水滴下落匀时不差，便可用来计时，宋百刻制即把滴下的

水量均分为 100 个刻度的距离，以水流满一个刻度的时间为一刻。每壶都有盖，减少水分蒸发，盖中有圆孔承接上壶嘴滴漏的每一滴水珠。底壶内设一浮板，浮板中央插有一把标尺，标尺最高处横有一固定指箭，指向底壶外侧一个标有时辰的刻尺；底壶进水后，对浮板产生浮力，随着水面升高，浮板带着标尺及指箭慢慢升高，标尺顶部横向指箭也沿着刻尺的轨迹慢慢上移，而指箭所指刻尺上的时辰刻线，即是当日当时的时刻。

程师孟将铜壶滴漏放置于谯楼上的专室中，设 4 个守漏人，分为两班，负责白天时间的测量，然后把时间传达给户外报时人，每隔一个时辰换一次时辰牌，由鼓角匠轮差，负责报时。夜间有 5 人值漏，由挝鼓人轮差，而所有的报时器每 50 日就要洗涤一次。宋人将夜间分为五更（每更为 1.2 个时辰，约 144 分钟），每一更又分为 5 点（每点约半小时），报时人以鼓报更数，以钲报点数，福州谯楼里用以报时的钲沿用了闽王王

审知所做的，所谓“铜钲犹是闽王点”。

“鼓声壮，角声悲；悲则感慨，壮则激烈”，因此捶鼓报时应先吹号角为引。宋代福州定鼓角之制为：入昏时，8人吹角，各吹3段26声；角声停止后，分3次捶击报时鼓，奏鼓角声的次数因时间不同而有变化。

铜壶滴漏制成，程师孟兴奋地作诗《科漏新成，因成二篇，呈监官叶左院》云：

台门新漏一声闻，从此朝昏百刻分。  
他日郡人思太守，也须谈及叶参军。  
又：  
风雨虽昏漏不移，百年应未失毫厘。  
须知万户千门里，正得人间凶吉时。

曾有人说程师孟能在诗中提到真正的制作人叶参军（即叶左院），足见其不专美、不抢功的道德品质。评价固然不错，但诗的意思分明是“福州人以后都要感谢我，顺便也得提到你”，而且他自为诗做注道：“旧无滴漏，予至始创。”相比于谢意，“自鸣得意”的气息更甚。程师孟一贯如此，在广州任上修好西城后的上表里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功绩，朝中已有争议，不过程师孟的得意也在情理之中。

时间的本质是一种生产秩序，百工按时生产，农民按时耕作，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还意味着社会秩序，白昼安全，但黑暗的夜晚每每隐藏着阴谋和反叛，古代中国的官方希望民众最好能“明而动，晦而休”，故而谯楼在夜间报鼓点就有警醒之意。朝廷制定时令、计

时方法，民众顺应，表达出了“天子治生民”的统治关系。

宋代中央规范时刻，境内各州按制奏鸣谯楼鼓角，民众以此为准开启一日生计，一州之内百姓听到的鼓角声是一样，而各州百姓听到的鼓角声也是一样的，大宋千万民众的生命因谯楼而有了联系（可以类比今日我们共用“北京时间”），大家时间一致才会觉得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此铜壶滴漏不只是一个计时工具，它更是连接“朝廷—州县—百姓”的器物，地方政府借此“肃邦侯之号令，而作三军之忠勇”，宋人周必大概括计时建筑谯楼是“一州之耳目”。

对福州而言，熙宁三年（1070）计时装置铜壶滴漏的安装更意味着宋初以来福州城市轴线百年完备工作的结束。宋代从吴越钱氏手中接管福州，真宗时的福州长官严辟疆翻新子城和夹城南门，仁宗时蔡襄奏修州门（仪门）和外城，后元绛改建威武军门，熙宁时程师孟重筑子城。一条由州衙门起，经威武军门、虎节门、还珠门、利涉门、宁越门而抵合沙门贯穿宋代福州城南北的“九轨”大道已十分完善，而铜壶滴漏是这条轴线上的最后一个部件。

程师孟曾作诗云“七重楼向青霄动”，所谓七楼即是州门、威武军门、虎节门、还珠门、利涉门、宁越门、合沙门，“七楼”上的“戍万兵”都依威武军门的报牌、鼓角声轮班，一举一动皆按“朝昏百刻分”。在宋人眼中由福州军门发出的鼓角报时声似乎也按着这条轴线逐级扩散，重



福州鼓楼前公园的仿宋漏刻



福州三坊七巷里的“光禄吟台”，据称“光禄吟台”四个篆书为程师孟所写

楼与鼓角在视觉和听觉上共同绘制了一幅以“官府（朝廷）”为中心的写意画。

程师孟认为自己的铜壶滴漏可以用上百年，然而仅过了一个甲子，福州城报时系统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候鱼珠落玉盘，乃移秤刻”的秤漏系统，是否铜壶滴漏还在使用已不得而知，程师孟过分的得意却为时人熟知。同时代的司马光就看不上程师孟，“程师孟生求速死”的故事就首见于司马温公的《涑水记闻》。

据记载，程师孟曾经向宰相王安石请求为自己写一篇墓志铭，按理墓志铭一般是人死后由家人请人撰写，所以王安石对这个请求有些哭笑不得，就问程师孟理由，程师孟说：“您的文章流行于天下，我何其有幸能与您共处一个时代，我要能得到您写的墓志，我本人也就能万世不朽。”在

司马温公笔下的这则故事还不至于太离谱，后世在此之上又衍生了其他版本，程师孟也给人留下了溜须拍马的印象。

在程师孟身上我们能隐约感受到那个纠结的大宋熙宁时代，王安石变法启用了一批实干官员，可他们的道德又多有欠缺。程师孟可以是“熙宁之后，士风衰变”的例子，也可以被看作“数知大郡，政绩斐然”的官样，贬其为小人有失公允，说其是君子又确失其当。评价历史人物是传统史学应有的任务，所谓春秋笔法，每务褒贬，但历史又恰好具有复杂性的显著特点，所以评价人物就变得非常困难。我想还是对事不对人吧，程师孟离任之后福州百姓为之立生祠，足见他有功于此，自然当为后来官员楷模，至于“求速死”，应为君子警惕！



# 从一段游记皱褶中展开的街巷

江梦笔

1845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从福州中洲寓所行至鼓楼，这一路的浮世绘影让其目不暇接。他看到了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以及一连串的饭店、酒家、茶馆和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这些全都记录进了他的游记——《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他写道：“我从南门往北走。这里的商店属于上等之流，尤其是那些销售欧洲物品

的。有几家是钟表店，展示着当时外国制造的各种时钟、怀表、手表。在这条街上，以及一条向左折向总督府的主要横街上，有好几家古玩店，里面货物齐备，陈列着古老的铜瓶、画像、玉石装饰和木雕，店主通常索价甚高。有个庞大的公共大楼建在路边，上面还悬挂着一只欧洲大时钟。”



《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施美夫 著

## 一、南街与钟表业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沿着福州城的中轴线，从八一七路经过繁华的南街，继续朝北到达鼓东、鼓西、鼓屏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只欧洲大时钟。此处便是福州“鼓楼”的旧址，明王应山《闽都记》称之为“全闽第一楼”，鼓楼区也因此得名。历史是这样的，唐元和十年（815），一座象征军政权威的“仪门”在此威严地矗立着，唐乾宁三年（896）改名为威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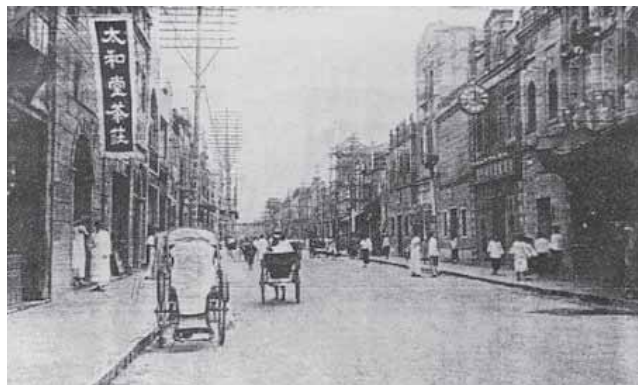
门。五代，闽王王审知在此置“漏水衮具”，鼓楼成为一座报时的谯楼。宋熙宁二年（1069）郡守程师孟在门楼上置滴漏，以鼓报时，以角传更，具备了“鼓楼”的功能。他感觉一个全新的朝代已拉开序幕，这片土地文明的正午也即将到来，于是意味深长地作诗“风雨虽昏漏不移，百年应未失毫厘”。然而在历史记载中，门楼的命运数次在水火之灾中沉浮。清道光甲辰（1844）又一次遭遇大火后，便在鼓楼上设了十二时辰牌，由专人管理。之后，又改用“西洋大自鸣钟一架，高一丈二尺，广六尺许，声闻百步”。这便是传教士所看到的欧洲大时钟。

或许这段历史已成为一粒很有生命力的种子，繁衍开来。在之后的一段岁月中，南街的钟表业一度生根发芽，繁盛不衰，曾集结着亨得利、法宜天、亨达利、光生明、公生明、震旦等8家大钟表店。

其实，17世纪时，钟表已经成为中欧贸易的大宗商品了。据资料记载，在清代，荷兰人以入

贡的名义，多次将钟表从福建的海关带入国内。在《粤海关志》中载有：“康熙六年，荷兰违例，从福建入镜……其贡品……照身镜、自鸣钟，凡十三种，皆无定数。”所以，想象170多年前，欧洲舶来品展示在福州商店中的画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州亨得利，作为钟表业的佼佼者，它早已嵌入老福州人的记忆里。福州亨得利老店始建于1925年，是上海亨得利总店在福州的分店。尤为特色的是，当年亨得利店堂门额上挂着特制的圆形大钟，为来往行人报时，店内也挂满了各式的钟表，每架钟表都栖息着小巧的精灵，有跳动的的心脏，有活泼的脉动，奇巧之器待价而沽。如今，福州作为中国时钟重要发源地之一，已发展成中国乃至全球时钟最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其实，站在历史里的大众，谁也不知那些升腾的鼓钲之声真的就成了之后编织福州钟表业美好蓝景的“草蛇灰线”。



1929年八一七路街景，右边挂圆钟的就是亨得利最早的店



八一七路亨得利老店，现已搬迁

## 二、总督后、官署区与古玩店

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游记里提到的“一条向左折向总督府的主要横街上”指的便是如今的省府路。省府路1号，历来是福州古城衙门青睐之处，据史料记载，在宋时是福州提刑司署址，元代为肃政廉访司衙门，明朝时为提刑按察司公署。清顺治十八年（1661），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变成了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前的这条街又被称为“总督后街”。民国时它是省政府所在地，省府路也因此得名。

垂直于省府路上的一条支路叫肃威路。因巷子旁曾是闽浙总督府的马厩，肃威路又称为“马房巷”，此地常有集市，又有别名叫便民巷。马房巷原本就逼仄，每遇集市更显得空间密集，旁边的省府路1号则有高楼明月相伴，此间有“高下”。于是，1922年，时任福建省长的萨镇冰将马房巷与省府内的西箭道合并，将马房巷拓宽至3米，使其可通行车。人们为了纪念他，用萨镇



省府路1号

冰的“肃威上将军”的头衔来命名这条巷弄，这就有了“肃威路”的路名。

在靠近鼓东与鼓西路的地方，分列于八一七北路两侧的民居之内，也有两条巷与官衙有关。东侧为东牙巷，西侧为西牙巷。“牙者，牙旗也”，为将军之旌，古时大将出镇，例建牙旗，仗节而行，之后从军营之门发展为官署之门“衙门”。《榕城考古略》有注释“旧为闽时官廨所”。与官衙有关的街名还有“宣政街”。它位于八一七北路上，从鼓屏路南端延伸至虎节路口的这段，旧时又称鼓楼前。唐宋时期，这段路在州衙前面，称为衙前街。明代洪武初年（1368-1372）在旧州署内设立宣布政使司衙，这个统管八闽的衙门，凡属政令、文告等向众示知的，都固定贴在署门的墙壁上，即鼓楼墙上。同时，又在街上建立一座宣政坊。从此，街名也随坊名，改称宣政街。辛亥革命后，革除封建帝制，人们用“鼓楼前”取代了“宣政街”的称谓。随着鼓屏路的拓宽，鼓楼前与上南街、下南街、安泰桥街等统称八一七路，“鼓楼前”的路名也就遗留在旧时光里了。



肃威路

这个区域是福州历史上子城的范围，重要公廨安置之处，承担宣教风化的作为，是城市的中枢。民众为城市写意，将此处视为龙头，九仙山、乌石山象征着龙角，双门为龙鼻，东、西河则为龙须。于是有两条象征蕴含特殊寓意的小巷，被称为大龙秋与小龙秋，分列在八一七路的两侧，靠近贤南路与虎节路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内河填筑，路名已不复存在。

回到肃威路与省府路，这里便是施美夫所提到的“有好几家古玩店”的地方。处在官署区，品味也显得非同一般。清末民初开始，那里催生了大量的古玩文物、珍珠玉器、脱胎漆器、皮枕皮货等商品市场。它们像艺术品总动员，集中在此，执“古玩”贸易之牛耳。古玩店里宝贝都蒙上了浮华的滤镜，各种渊源自有，带着同是天涯沦落的古典情怀聚集于此，保持着和“官署区”相匹配的美学精神，展示着风雅的氛围。游离于其中的，也有许多浑水摸鱼的商人，他们从中嗅到了强劲的市场需要，也大浪淘沙留下了一些负有盛名的老字号，如沈绍安脱胎漆器、秀古斋古玩店、青芝田古玩店。据说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百年老店“青芝田”的商铺里，曾买走一块“艾叶绿”的寿山石，为此处添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文滤镜。至于施美夫所说的“店主通常索价甚高”，在信誉卓著的老商号眼里，以买客区分，他们做的是达官显贵、巨贾富豪的生意，手笔豪阔，平民只能为之侧目。同时也因为这里集结了中国艺术珍品，民国十二年（1923），肃威路的

机绣业也相伴发展了起来。如今，省府路与肃威路，这里只是一条普通的街巷，肃威路上依旧有集市，省府路则通向布满美食诱惑的达明路，充满了生活气息。

### 三、繁华的手工业区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如果南街属于商业区的话，那么西面的三坊七巷属于居住区，北面的鼓楼一带属官署区，东面的厂巷、锦巷、织缎巷等，便是手工业区的集中区，再往东的军门前、南营、中军后巷、城守前、大根里等便是兵营区了。而“鼓楼前”的时间之钟是“一州之耳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调度听从时间的号召，支持着各行业天衣无缝地运转。

手工业的成品都在繁茂的南街上展示。香烛业争奇斗艳，名字美妙，红蜡烛、龙凤烛、矮脚烛、白蜡烛，暗暗流转变幻，满足烛台高照的各种想象。绸缎店不甘示弱，各种都要“这般颜色做将来”，店内铺陈上好绸缎，呢羽哗叽。明万历十八年（1590），一位西班牙人在福州游街串巷，难掩赞叹之情，“他们有大量的丝绸，质地极佳，而且十分便宜”，“达官贵人的服装使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哗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这些旧时织造作坊便分布在织缎巷、横锦巷、锦巷里。

织缎巷为南街东侧的第三条小巷，古称嘉



织缎巷

荣坊。宋代，福州纺织业十分发达，绣工穿行其间，日夜劳作，是榕城的纺织中心，因巷内设立绢绣局，故称织缎巷。宋、元、明三朝朝廷都在福州设立文绣局，作为管理丝织业生产外销的专门机构，相距不远的安泰河大概就是商品“传输机”。到南宋时，掌管皇族内务与外贸的中央机关——“西外宗正司”更是直接迁移到了福州。巷内作坊中的女绣工和染漂男杂役颇多，明朝叶向高的《家谱列传》载：有男子参加丝织，人们“皆以机丝致富”。闽海道知事范惇曾作《闽州歌》：“闽州土俗户不分，生子数岁学绣文，围绷坐肆杂男女……去年居作匠五千，今者女工征六军……”至于纺织的技艺，也是臻于化境，如穿隐形之衣，丝滑得毫无负担，连诗人陆游对此也拍案称奇：“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

另外，此处还有制作梳子的手工作坊区和制香业隐藏其中。

厂巷、花巷与石井巷相交处，向北延伸至东街的小巷，又名连桂坊。巷子窄短，70米便走

到底。古称梳行，是制作梳子的手工作坊区。据资料记载，鼓楼前宣政街东侧有古老的篦梳巷，巷内有福州角梳厂的生产车间。如今厂巷不见梳子，那些如梳齿般的作坊在变化与迁移中消失，只留下清冷的“梳背”——厂巷，还有一棵福州仅有的古重阳木。

锦巷，东街口以南南街东侧第二条小巷，因巷里有通贤境里社，旧称“境巷”，民国时此处渐成商市，改名“锦巷”。通贤境里社中的“里社”源于古代礼制，25家共祭一个神，通常“社”中都有本土保境安民的土地神。通贤境里社供奉赵真君，建有“七圣君庙”，至今有900多年的历史。香火旺盛的道观庙宇七圣君庙直接催旺了巷内“庆香林”香店的生意。“庆香林”位于锦巷北侧，是著名的香业制造店，专门制售宗教信仰用的香烛，也是福州“香店拳”的发源地。香料是鼓楼区传统出口商品，曾出口到南洋、日本等地。《鼓楼区志·工业》载：鼓楼区制香业始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区内最著名的香业制售店为“庆香林”。

一路走来，繁华与文明的手工作坊区，构成历史里“人烟绣错，酒市歌楼”的环环相扣。曾经的鼓楼，针随晷刻，时间在阴影里辗转潜度，渐成滴漏之水、沙漏之沙，细水长流。而后再换上了自鸣钟，能取下的只是记忆之钟，那鼓角之声仍在冲击着空间里的壁垒，似有喑哑的铮鸣。那些平常的巷弄在变换的街名中，逐渐显影，显得无比深远。

# 汇丰福州银行如烟往事

林正德

我从仓山区梅坞路 57 号聚龙尚书院入口进去，顺着上坡路走了一二十米，即见修葺一新的汇丰银行大楼巍然矗立。在该建筑物侧面的道旁砌着一堆假山，其中最抢眼的是一块长方形大岩石上嵌刻着“宁静致远”四个红色大字。我沿着右边的道路上行，来到该楼的正面，它是一座三层古罗马柱廊式建筑，四面环廊，地面两层，地下一层。粉刷一新的大楼呈白色，正中拱门石柱上悬挂着“福州市仓山区文化馆”和“福州市仓

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

我拾级而上，从正面外廊行至东面外廊，那里面有 7 道半圆拱券，拱柱下各置一盆大型植物盆栽，地面用暗红色六边形无釉陶瓷砖铺就，左侧玻璃窗门全都紧闭着。我折回，从正面外廊中央的拱形玻璃窗门进入厅堂，迎面所见就是一段高大陡峭的西式木梯，至少有 30 多级，其楼梯及地板均为硬木，质量甚好，已使用 100 多年，依旧结实耐用。我径直登上楼梯，看见右边一房间是



修葺一新的汇丰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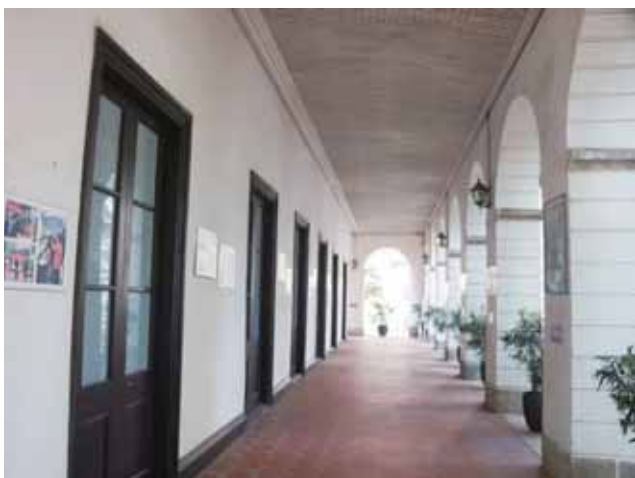
画室，门敞开着，里面无人，而画室东面连着外面走廊。我穿室而过，来到了走廊。那走廊十分宽敞，足有四五米宽，20多米长。

我站在外廊石阶上向周围观望，前面是一个停车场，而这地方最早是汇丰银行的网球场，亦是福州第一个网球场，四周曾经用铁丝网围起来，那一串串硕大的紫藤花穗垂挂在铁丝网上，紫中带蓝，鲜艳夺目，就像是一大片璀璨斑斓的彩霞。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网球场和紫藤花仍还在，后来，网球场改造成篮球场，再后来建成了市二医院托儿所，这都是后话。

实际上，这次修复的只是汇丰银行主楼，而其他附属建筑物均未修复。在主楼的背面原有一整排几十米长的平房，东面是马厩，再下来是搁人力车和轿子的房间，后面是车夫、轿夫及其他杂役的宿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南京

条约》签订，福州被定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到福州，但在设置领事馆过程中受到本地居民的一致反对，无人肯租与房舍，几经周折才在官府的协调之下借住在乌山积翠寺厢房中。直到10年之后，经当时福建巡抚端德批准承租城外的天安山（也就是烟台山）双江台2英亩土地建设领事馆。该馆于清咸丰四年（1854）动工，咸丰九年（1859）完工，耗时5年，建成办公楼一座、乐群楼一座，以及一些住宅等配套建筑。英国领事馆所处的位置是烟台山的中心地带，这一带本是坟场。我在网上搜索到一张老照片，那是烟台山上英国驻福州领事馆、英国领事馆住宅和乐群楼的全远景照片，在建筑物下方的烟台山皆为墓地。最早的烟台山根本就没有路，以前仓山人只能白天出行台江和城里，观音井那里设一道关卡，天一黑关卡门一关闭就走不了，只能绕



一楼东面外廊



一百五六十多年前烟台山全景（山上从左起为英国领事馆附属楼、英国领事馆、乐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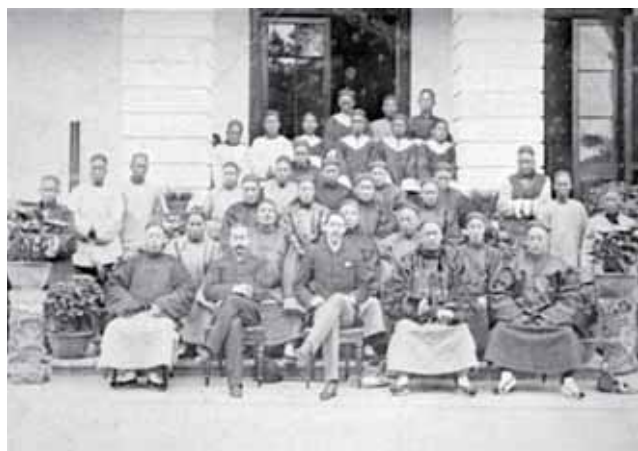
道从龙潭角摆渡过江。在英国率先于烟台山建领事馆之际，仓前山不到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又有美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德国、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比利时、意大利、墨西哥等16国在此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形成了领事馆区，还有33家洋行、8座教堂、3家教会医院、11所教会学校相继开张，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星罗棋布。因此，包括烟台山在内的仓前山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英文缩写HSBC，中文直译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有限公司”，简称汇丰，取“汇款丰裕”之意，创设于清同治三年(1864)，总行设香港，次年3月3日开始营业，是英国设在海外的最大私营银行之一。

清同治五年(1866)汇丰银行在福州设

分理处，行址设于南台汇丰弄1号，同治七年(1868)升格为分行，经理是苏格兰人F·G·沃克，属上海汇丰银行管辖。这是福州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系外汇指定银行，经营业务除侨汇及进出口外汇外，主要办理榕沪、榕津木材、笋干及茶叶等押汇。存款只有义和、天祥两洋行(均为英资洋行)，以及英国圣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及教会所属各学校、医院等机关存款。由于各国领事都在此办理经济业务，一些中国商人也与汇丰银行有银钱往来，因此这一带成了商贾云集、名流进出之处，连银行旁边的巷子都被称为“汇丰弄”。

我对汇丰银行建马厩颇有兴趣，在网上搜索到一张1887年汇丰银行福州分行职员们的合影老照片，感觉坐在前排中间位置一位跷二郎腿、蓄仁丹胡的外国人有点面熟，即把以前网上搜索保留的跑马场老照片做个比照，果然在跑马场老照片中有此人。还有一张跑马场赛马活动合影中，



1887年，汇丰银行福州分行职员们的合影



1893年的一次观看跑马场赛马比赛的观众



此人身处最醒目位置。我在电脑上将这些照片剪辑合并，做更仔细的比对，料想此人应是汇丰银行经理 F·G·沃克，他与当年在福州的英国人都酷爱赛马运动。

汇丰银行一楼是人们往来频繁的厅堂，二楼是银行办公的地方，银行的发票、档案等材料都存放在地下层，那地下层进出口的铁门钢板特地从英国定制，足有十多厘米厚，至今上面仍嵌有英文。抗日战争期间，该行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迁往重庆市，抗战胜利迁回福州后复业。

一位曾在汇丰银行当过工友的陈依姆回忆说：“我就在银行里做工，洗衣、挑担，累得背都压弯了。银行里的那几个外国人我都认识，都是女性，有的还会说福州话呢！1949年后不久，她们才搬走。她们平时倒还客气，但礼数可真多啊！比如我在洗衣服，她们走过来，你要是没站起来敬礼，她们就说你‘没礼数’，这哪有办法？她们时不时走过来，我还要做事哪。”

1944年10月5日，日军第二次入侵福州，汇丰银行成了日军宪兵队的驻地。同年，日军抓了一位抗日游击队员，捆绑在一棵树上毒打，当晚游击队员挣脱绳子，从汇丰银行墙边攀爬到隔壁马房巷里，在居民的帮助下逃脱了。日军恼怒至极，准备对当地施行“三光政策”。马房巷居民求助会日语的陈为信医师，出面与日军宪兵队交涉，终于化解了一场血光之灾。

1945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部队驻扎在福州期间，曾使用汇丰银行建筑的顶层搭

建观察哨，监视闽江上日本船只的活动。当时在SACO服役的埃尔沃斯·史密斯留下了208张福州老照片，并由其子、现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大学教授兰迪·史密斯公布在互联网上，从中可一窥汇丰银行及顶层观察哨旧影。

1947年，汇丰银行转为福州私立塔亭护士学校，银行地址迁往进步路27号。由于该行原归上海行管辖，1949年5月，因同上海失去联系，便直接归属香港总行领导。同年8月，香港总行致函该行要求停止营业。1949年8月17日，解放军进驻福州，9月该行同上海行取得联系，10月20日正式停业。

福州私立塔亭护士学校创办于1921年，由英国圣公会女差会在塔亭医院内建立，医院的医师兼任该校教师。1947年成立福州私立塔亭高级护士学校，汇丰银行旧址作为教学楼，校长是陈兆勤，教导主任是沈慧斌。在福州，新中国的第一批优秀护士，大多出自这所学校。

1952年10月5日，塔亭医院、塔亭高级护士学校由福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办，分别定名为福州市立第二医院（先是改名为工人医院）、福州市第四护士学校。而汇丰银行原址转为市二医院宿舍。先后入住的是该院的几十户家庭。这洋楼房间本就有限，现在硬要塞进几十户人家，只好把环廊隔成一个个单元，连楼梯下也不例外，当时楼里有三座楼梯，还有那一长排平房不是改造成厨房，就是成了宿舍。那厨房也是几家共用，一个橱柜，一家各用一半。随着时间推

移，又在边上的空地盖座小楼，当医院宿舍之用。

那年代社会风气良好，居住在楼里的几十户人家相处和谐。整座楼只有几个水龙头，取水时大家能自觉有序地排队等候。楼前空地上有一张大石板椅，好些人就拎着塑料桶在这里洗涤衣服、被单等，也是按先来后到的顺序。

这汇丰楼里出生的下一代大多是50后、60后，说也奇怪，以女孩居多。白天，大人们都到医院上班，院子里就成了孩子们的极乐世界，特别是在“文革”动乱时期，他们无课可上，整天玩耍在一起，踢毽子、跳橡皮筋、聊天。当时，市场上刚孵出的一只小鸡才卖五分钱，他们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白天，他们把鸡放养到院子空地上，在放出鸡栏之前，要先摸摸母鸡屁股，看看有没有快下蛋的迹象，确信没有才放出窝。那年代没有电视，每当夏夜，那些孩子们就拿把凳子坐在楼前空地上纳凉谈天。那时天很蓝，星星撒豆似的布满夜空。

后来，响应政府号召，老三届生纷纷上山下乡去，新三届生进中学念书。速成毕业，有的上山下乡，有的进工厂当临时工。随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出国去了……总之，他们都告别了青葱的时代，那些在汇丰大院里玩耍的日子就此结束，一去不复返。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许多住户都陆续迁出了汇丰楼。



修复前的汇丰银行大楼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市二医院在现在停车场、最早网球场的地方盖了一座青砖两层楼房，开办了市二医院托儿所，设小班、中班和大班，专收本院职工家属的子女，以解职工后顾之忧。当时市二医院的福利条件比较好，收费比其他托儿所要低得多。

随着时光流逝，汇丰大楼满目疮痍，越来越破烂不堪，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值得庆幸的是，在保护烟台山历史风貌的大背景下，2009年，汇丰银行终于得以重新修复，并被圈入“聚龙尚书院”楼盘，目前已挂牌为仓山区文化馆和仓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3年1月，汇丰银行福州分行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汇丰大楼虽然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但它那罗马式建筑依然别具一格，焕发出浓浓的西洋风情。150年的沧桑巨变，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 福州与福山

林国清

## 福州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福州）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福州因福山而名，这是无可置疑的。其时间大约在唐开元十三年（725）。因为开元十二年（724），还没有“福州”的名称。当时称作“闽州”，其行政机关叫“闽州都督府”。第二年，改闽州为福州。到了唐宪宗时的元和年间（806-820），已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所以《元和郡县志》作如是说应该是不会有错的。但福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近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上解不开的一团谜。

## 今福州找不到福山

时人着意在今福州的西北向，希望能找到福山，但竟一直没有办法寻到比较理想的答案。

一是在西向的闽侯县甘蔗镇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座“福山院”，早废。而且其地未见称“福山”的山。二是在今福州的西门外有一座“保福山”，山下有建于陈天嘉二年（561）的“隆寿保福寺”。笔者曾经特地到了一趟保福山，山不高，不足100米，范围也很小，其规模不可能作为福州的主山。民国初陈衍编撰的《闽侯县志》说：“旧名唐安。明洪武初重建，更今名。”可见那时连建在山下的寺宇“唐安寺”都不以山名见称，何况堂



保福寺山门

堂的一个大都督府呢！直到明初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才把“唐安寺”改为“保福寺”。那是后事而已。“保福山”又多了一个“保”字，无论如何，“保福山”很难自圆其说是“福山”。三是在福州茶亭有“福山境”，但其地却没有山，而且设在福州的南面，同样是“牛头对不着马嘴”。四是福州的北门外有一座“湖顶山”。有一位教授说，“湖”就是“福”的谐音，距福州的水程刚好是“十八里”。为此，笔者特地到现场一探究竟，仍大失所望。湖顶山在现在八一水库的西边，又叫“叶洋山”，山高601米，属晋安区新店镇的红卫村。我们寻访了几位当地村民，没有一个说湖顶山就是“福山”。况且这里属山地，古来皆无“水路”可通，古人也绝不会以水程来计算其远近。五是与湖顶山毗连的“永福山”。

永福山距城20里，原称“莲花山”，山形高峻，上锐下圆，若菡萏然。《榕城考古略》说它是“郡主山也”。但不叫“福山”，同样多了一个“永”字，而且与湖顶山一样，无水路可通。我们想，“福山”对于“福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福山”绝不会多了一个字，或是改了一个字。因此，在当今的福州，就是找不到福山了。

### 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福山在长乐县

关于福山的资料，历史上的各史各志各书少有记载。宋淳熙九年（1182）梁克家编的《三山志》才隐隐约约在“叙州”里的“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下注明：“或曰：以董奉福山名”。直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福州郡守



长乐董奉山

李拔主编的《福州府志》才明确地说：“福山今名董奉山，属长乐县。”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董凤（奉）山在福建长乐县东。产铁。”董奉山在长乐，也是无可置疑的。民国李永选编《长乐六里志》解释说：“唐开元十三年，因州西有福山，即长乐董奉山，改闽州为福州。”并在《卷一》“大事”里道：“唐开元十三年，因州西有福山，即长乐董奉山，改闽州为福州。福州之名，昉此。”

董奉山为长乐第一大山，山高林密，据传古代有野人居之，白眉白发，裸体生食，人少为见，见之即获福，因称“福山”。山下有董墘村。三国时，董墘村董奉上福山隐居修炼，善医术，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经常为人治病。病愈者栽杏五株以报，郁然成林，称“杏林”，为医家之雅称。传说董奉收杏易



董奉像

谷，周济贫困，后在山岩处白日飞升。人们在山上建“太乙宫”纪念他，并改“福山”为“董奉山”。因此《三山志》称其为“董奉福山”。但有人认为，董奉山在长乐，同甘蔗镇一样，与福州城区中心相距太远，而且在福州的东南，证明“彼福山非此福山”也！

### 董奉山下有个“福州地”村

但我们不能怀疑《元和郡县志》白纸黑字的一本非常珍贵的古代文献。还是不妨把视野放大一些，换一个角度到长乐去。有趣的是，就在长乐董奉山的东麓有一个叫“福州地”的自然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今属玉田镇福坊村。为什么叫“福州地”？应该多少与“福州”有些关系。但据调查，村民皆不是“福州人”，他们的祖先也不是从“福州”迁来的。因此此地是否就是唐开元时的“闽州都督府”所在地？而且这个“福州地”的西面正好是旧称为“福山”的董奉山。宋梁克家《三山志》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州治在今福州。六年（623）析置泉州（今福州）。”今人朱维干《福建史稿》说：睿宗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为闽州。但没有说“闽州”的州治在什么地方，给历史留下一段空白，成为今日“福州与福山之谜”。

《元和郡县志》说，唐开元十三年（725），因“州之西北有福山”，故改“闽州”郡为“福州”郡，“闽州都督府”也就改为“福州都督

府”。这一些倒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曾经在几家报刊发表还不是很成熟的观点，引起文史界同人的兴趣。有人提出要在“福州地”村进行考古发掘，必有新的发现。福建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组找到我，详细询问了许多资料，又专程赶到“福州地”去实地采访，所获资料颇丰。原来现在的“福坊村”是由“福州地”和“牌坊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牌坊村”过去有许多的石牌坊，同“福州都督府”都有些关系：“福州地”更是“福州都督府”的所在地。当地村民说，此地原为“闽州都督府”所在地，唐开元十三年（725），因州之西有“福山”，所以改“闽州”为“福州”。自然，原来的“闽州都督府”也改为“福州都督府”。但唐开元十五年（727），“福州都督府”就离开了“福州地”，迁到现在的福州去。这一段历史，在“福州地”村有碑刻可寻。

“福州都督府”迁到现在的福州。之前福州原称“泉州”，于是“泉州”也就顺理成章地称为“福州”了。而长乐董奉山东南麓的“福州都督府”，只剩下一个叫“福州地”的地名。所以今“福州”之所以称“福州”，实际上是从“福州都督府”迁到今福州时起的，而不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的事。唐长兴四年（933），已经迁到今福州的“福州郡”，也曾经改名为“长乐郡”。唐清泰元年（934）又改“长乐郡”为“福州郡”，后晋天福六年（941）再次把“福州郡”改为“长乐郡”，直到宋初干脆称“福州长乐郡”。所以宋初福州

状元许将还署名自己为“长乐许将”呢！宋之后，才固定为“福州郡”。长乐者，福州也；福州者，长乐也。福州与长乐有了这一段的历史，扑朔迷离让后人分不清楚是无可厚非的事。

### 莲花峰是今福州之“福山”

福州都督府由长乐的“福州地”迁到今福州后，总觉得今福州也应该有一座“福山”作为郡城的风水山，于是就找到北门外的莲花山。莲花山也叫“莲花峰”，高934米，仿若一座天设地造的大屏障，既可以挡住凌厉的北风调节气候，又能够温柔保护福州的城池。所以晋代郭璞《迁城记》说：“洪浒南流，瑞龙地应。其主螺女，现对花峰。千载不杀，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这里说的“花峰”，便是莲花峰，山高峻拔，横亘连绵，植被丰富，非常宜居。为了沿袭而又有别于长乐的“福山”，改“莲花峰”为“永福山”，求福州之永福也。所以说莲花峰（即永福山）即是今福州的“福山”。但这“福山”不是《元和郡县志》里所说的“福山”。后闽王王审知即葬在莲花峰下，今称闽王陵。至宋代有朱熹《题莲花峰》诗曰：“群峰相连接，断处秋云起。云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流云绕空山，绝壁上苍翠。应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明傅汝舟有《雪晴登莲花峰》诗：“凌晨发苍莽，日午及清晓。渴饮池内雪，卧听天外谣。举头问云君，虹路何迢迢。他时尚相会，鸾背夹吹箫。”

# 乌山面面观

孟丰敏

自古，中国的名山大川都和宗教密不可分。古人的山川崇拜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巫术，最早的山川祭祀始于传说时代的舜，因为巫术中的山川有通达天地的功能。因此，想了解一座山的历史，必然要从宗教文化入门。乌山和中国所有名山一样，也是一座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山，山上寺庙众多。

## 乌山名称来历

《乌石山志》载：“闽山水之富，甲于东南。

武夷、太姥、石竹、霍童，皆称奇绝，实神仙之洞府而贤流之壑宅也，会城尤山水之汇，周朴诗曰：‘万里重山绕福州。’”

《乌石山志》又载：“会城之地称‘三山’，三山，乌石为最奇，郡中人士与客子有憚其游观之远者，辄寄兴斯区。”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在乌山上建造寺庙，铸黄金造佛像，殿宇辉煌，佛、老子之宫，数以百计。至今，福州文人依然喜欢流连乌山，探寻古迹。

乌山的名称来历，传说是因汉朝九仙射乌而命名。清朝叶敬昌写的《闽山记》记载，乌山又





光禄吟台“闽山”石刻

名“闽山”：“闽会城有三山，谚称‘三山藏，三山现，三山不可见’者，以三山之脉络蜿蜒起伏成为九山也。三山者，乌石山、越王山、九仙山，分而为罗山、冶山、闽山，则其藏者。又分而为灵山、芝山、钟山，则其隐隐不可见者。三山，乌石山为最奇，闽山其支也。唐天宝八载，敕改乌石山为闽山，闽山之名缘此，始有巨篆‘闽山’二字径尺许，不知为谁氏之笔。其地唐时为闽山保福寺，宋初更为法祥院，建隆三年镌观音像，有石刻云‘寺虽新号，山则旧名’。”

那个巨篆的“闽山”如今依旧在光禄吟台处，说明乌山的山脉绵延到光禄吟台，只是后来被僧人夷为平地，盖了寺庙，就是上文中所说的“闽山保福寺，宋初更为法祥院”。

宋熙宁元年（1068）九月，程师孟以光禄卿出任福州太守。那时，乌山的俗名是“闽山”。程师孟为何将“闽山”更名为“道山”呢？

北宋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朝廷实施神道设教，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宋政和四年（1114），福州知州黄裳在于山天宁万寿观刻了一本《万寿道藏》宣传道教。天宁万寿观即今日的九仙观，俗称天君殿。那时于山和乌山之间道观众多，尤其乌山，道教文化氛围浓厚，遗迹众多。

程师孟到任的这年冬天，与福州文人同游闽山（乌山）览胜，认为“闽山”可比道家的蓬莱、方丈、瀛洲。此后，宋朝僧人神解曾记录乌山四十九景，后来省志、府志、《闽都记》、《名胜志》皆言山有三十六奇，从此定为三十六景。

## 道 山 亭

到乌山，必定要看一眼道山亭。这是三十六景中最重要的一景了。道山亭是程师孟所建。那时他经常到法祥院，站在一处山头上吟诗。宋熙宁三年（1070）八月，寺僧在法祥院里建光禄吟台。程师孟亲自篆书“光禄吟台”四个大字。



熙宁十年（1077）八月，大文豪曾巩以度支员外郎、直龙图阁的身份，移知福州，其正式官阶是“福州军州事兼福建路兵马钤辖”。

宋元丰二年（1079），程师孟将“乌山”改名为“道山”，请曾巩作《道山亭记》。郭柏苍经实地摩崖石刻考证，并参考古籍，确认“宿猿洞”“道山亭”“光禄吟台”笔意十字一律，尤其篆书的“道山亭”各径二尺，光禄吟台篆书与此行行款楷书均为程笔无疑。

不论乌山名叫“闽山”还是“道山”，从此，此山以道山亭而知名，道山亭随曾巩大名，流传千古。清朝百姓在山上神光寺后建了一座祠祀三大文人曾巩、曹学佺、徐兴公。

元、明、清时期，贤人逸士占胜结宅，和尚道士创寺建庵，令乌山上热闹非凡，名胜古迹众多。

## 旧 涛 园

经过“旧涛园”，我问孩子，这里过去有一座很大的园林，你信吗？他茫然地摇头。但是顾名思义，这里自然有一座园林。只是这座园林背后藏着福州一个重要的家族——福州第一个状元许将及其家族。

许将中状元时26岁。他是福州第一个状元，也是福州最年轻的状元。许将还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五朝元老。他一生为北宋5个皇帝效力，被宋神宗赞为文武双全。



旧涛园

许将后人即《清史列传》记载的“闽中以诗世其家者，咸曰许氏也”，即许彞、许友家族，科甲蝉联，累世以诗鸣于世。许彞在乌山上建别墅，名“石林”。他的儿子许友也是福州名家，归隐光禄坊后重修石林，更名为“涛园”。

许友儿子许遇又扩建涛园，再次更名为“旧涛园”。许氏居光禄坊老宅200多年，到许王臣时，许氏七世同堂，得御赐“海国醇风”匾额及御制诗一首，成为三坊七巷中最荣耀的家族，在福州世家中也绝无仅有。

## 邻 霄 台

经过旧涛园继续往上走，一直走到了山顶。我是第一次登上乌山的山顶，看到了一座石砌的亭子。当年在此有邻霄台。

邻霄台即山顶一块巨大如台面的邻霄石，环视群峰，岸然耸立。蔡君谟诗：“子夜看先日，阴岩得后春。三山空琐碎，万落自烟尘。”

邻霄台旁曾有邻霄亭（又名清虚亭、不危亭），是乌山的重要名胜、历史遗迹。《乌石山志》记载，清虚亭原名不危亭，是乌山三十六奇之一，位于邻霄台后。据传当初建造的不危亭四面材瓦、白土墙，单薄秀巧挺立一角。工匠告诫说，损，勿修！修，必坏。后人没有领会，一修就倒了。

### 清虚亭的宴饮记

清虚亭即邻霄亭、不危亭。乌山上有一段摩崖石刻曾提及重修清虚亭的事。那是明正德八年（1513）：“正德癸酉夏月吉琼河黄仕明、冯仲良、林叔明、冯宗广、陈允亮、张尚武、赵文范、冯公器偕蒙市舶府公公尚，委督盖造清虚亭、邻霄祠、光远枋等处，至七月既望落成丁山，刻石为记。”

这段文字在《尚公桥记》中也有提及：“矧西园既复时，邀名公登邻霄台宴饮赋诗，镌名峭壁，斯皆人所鲜能。”说明当时的福建市舶府（管理福建市舶司）的太监尚春在明正德八年（1513）修复了西园，又命琼河一带的商铺店家集资在乌山上修建了清虚亭、邻霄祠、光远枋等，所以就邀请当时名公即本地通事黄仕明等人



清虚亭

登邻霄台宴饮、赋诗，且把此事与参加庆典宴会的人名都镌刻在峭壁上，作为纪念。当时撰写《尚公桥记》的吏部尚书林瀚（仓山林浦名人）在文中说这件事别人都做不到。

《乌石山志》记载：“大明万历己亥清和既望，闽三司公宴于乌石山清虚亭，蟾魄当空，万里乙色，渔灯数点，隐约在望，前此胤此，多不得月，则兹宵信胜游也。时在馆滇国朱运昌、宪长诸暨陈信学、大参丰城徐即登、宪副皖城汪道亨、南海金节、武林高从礼、都阉章贡陈大器，而勒石纪岁月者，则学使吴兴沈傲价也。越六月，建南守道四明杨德政、巡道严陵邓美政，入会城再宴于此。楷书，径三寸，镌金刚迹东。”这段文字说明，万历年间福州重要的三司官员在清虚亭宴饮、赏月并赋诗、题刻。

可见，明朝时期，清虚亭是一处适合宴饮的亭台楼阁。

## 诗酒上邻霄

清康熙初年，福州人、山西道监察御史萧震因父亲病故回福州，见乌山古迹荒芜，便个人捐款并募集资金在清虚亭位置重建一座亭，命名为“邻霄亭”，并倡议修复古迹并建仰止亭、观海亭诸胜，还命人在邻霄亭左边石头上刻了这样一段文字：“百字碑，邻霄亭圯垂百年，客夏震合力经营道山废迹，以次修举。维时靖南王殿下督抚。二刘公奉皇帝命，休息吾民，比岁大稔，山海无事。亭成，闽人乐之，爰纪厥事，磨文于岩，颂皇帝德，传之后人，其永无斁。康熙十有一年壬子春，内升前侍御史郡人萧震题。八分书，径九寸，镌石天顶。”

但是，谁能想到，萧震建邻霄台，竟成了自己的祭台？杀害他的是靖南王耿精忠。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深仇大恨呢？

康熙十一年（1672），萧震和靖南王耿精忠之间的关系还和谐，但第二年吴三桂造反，三藩之乱爆发。福建总督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范承谟来到福州任职时，发现耿精忠要叛清，就和萧震商量巡视边海，征调兵马防御耿精忠。可还未等到他们行动，耿精忠就反了。范承谟和萧震拒不依附，耿精忠就先后将他俩杀害。

耿精忠杀害萧震后，霸占了萧震的财产，还把萧震的尸首放在邻霄台示威。邻霄亭有一副萧震题写的楹联：“但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

霄。”

萧震事件发生后，有人把楹联中的“诗酒”改为“尸首”。这一讽刺反而令大家更加敬佩萧震的气节。当时福州名人谢古梅登邻霄台吊萧震赋诗：“荒台草木千年恨，乐土桑麻一梦中”。

清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命福州府为萧震建忠臣庙，谕祭建坊，并重建萧震的邻霄亭，可惜不久倒塌。乾隆六年（1741），布政使乔学尹重建邻霄亭并撰文记述。清中叶，邻霄亭废。

明清时期，达官贵族、文人雅士都跑到乌山峰顶邻霄亭饮酒，这里风景绝佳。“东望海上渔舟，樵木声隐隐。又西下平沙，透岸来遑，应接不暇。”此可谓三山奇观。

正因为邻霄台乃观景之最，因此周围遍布亭台与寺院，有邻霄堂、寒翠亭、太虚亭、太虚庵、万寿庵、妈祖天后宫、刚显庙（祀诗人周朴居士）、宗徐二公祠、三贤祠（周朴、薛逢、灵观）。

这么多寺庙，介绍一下宗徐二公祠。

### 宗徐二公祠

明朝提学副使宗臣，字子相，直隶兴化人，入府志名宦传。明嘉靖间为闽藩参议，以倭变守城有劳，擢提学副使。

明王世贞《宗公祠碑记》记载，嘉靖戊午，倭寇在闽海流窜。大帅十分惊恐。城外的百姓想入城避难，大帅害怕，不肯开城门。宗子相说：

“何苦拒绝百姓入城避难？贼距离这里还很远，贼来了，我有办法对付。”大帅更加恐惧，就想办法为难宗子相，说：“城里没有粮食，只够应付一百天了，难民来了，耗食更多。除非难民随身带粮食的可以入城，否则不行。”宗子相又说：“我也很为难，总不能把这些饥饿的难民送给贼寇杀害吧？这些贼寇在这里肯定也熬不到一百天。”大帅无言以对，宗子相赶紧大开西门，任由难民涌入，没想到一下子涌入一万人。宗子相管理有方，出奇招制贼，贼逃跑了。宗子相因此闻名天下，被提升为省按察副使。但一年后，他就因工作过劳而病逝。福州百姓十分怀念他。

宗子相病逝十六年后，他生前好友、汀州知州徐君晋升到按察使，经常经过宗子相为难民开的西门，想起当年他们二人同游乌山时，宗子相说：“天地之大，而有这座山，这座山亿万年才有我们俩。我不当官，就和脱去鞋子一样，但我舍不得离开这座山，在此常常有一种神游的感觉。”

徐君到城外私访百姓，百姓听说宗子相的名字就泪流满面，感恩宗子相当年开门让他们入城避难，供给饮食，说：“宗使君不幸而夭，我听说明一个人牺牲自己，救活一千人，就可以祭祀封神。宗使君救了数万人，死后却没有任何祭祀。”徐君哭着说，这是因为宗使君没有儿子的缘故。百姓听说后，自愿出地建祠祭祀宗子相。徐君不忍心让百姓出资买地，在乌山上看中一块地建祠，告慰宗子相说：“此故宗君所属神游地也。其

必食矣。”并向上汇报。于是，朝廷出资建了一座祠堂，允许百姓随时来祭拜。旁边的寺庙也出资为祠堂供给日常开销。

## 太 虚 庵

明嘉靖初年，一位著名道士太虚上人自北来，顶着大斗笠跌坐于邻霄台下，偈云：“不澡不垢亦非青，行道圆明见性通。行至水穷山尽处，那时方见本来真。”在此建庵，庵名“太虚庵”。当时福州名人徐燧、陈价夫等经常来拜访太虚上人，直到太虚上人九十岁仙逝。

### 寄太虚上人

太虚石洞居，孤寂少人依。  
远客携琴至，逢师乞食归。  
一莆青草上，四面白云飞。  
终日无言谈，岩花落满衣。

邻霄台左右有许多镌刻，都是明朝太监纪游及陪咏的内容。比如海宁查布政陪太监尚春登乌石山，诗曰：“公暇陟嶙峋，居然小八闽。眼前都是幻，惟有此山真。”

程师孟写的“宿猿洞”就在邻霄台旁，据说洞旁还有一凹鸦浴池。今风景大异，秋游乌山，回望历史，唏嘘感叹。千古文章写一处，不同时期、不同人士、不同处境，发出不同的感慨，然而有一样是相同的，都是借山水寻一处静谧，发忧古感今之思情，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关系，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 林纾与近现代之交的闽都戏剧

邹自振

—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徽、秉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又自号六桥补柳翁、长安卖画翁、践卓翁、蠡叟等。闽县（今福州）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终生未入仕途。曾执教于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北京



林纾像

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林纾工诗文，善书画，著述甚富。所译各国小说达200多种，为我国最早介绍域外文学之第一人。林纾著有传奇《天妃庙》《合浦珠》《蜀鹃啼》，闽剧《上金台》，今皆存。

最早记载林纾剧作的是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其卷二“书录上”对三本传奇有提要。寒光《林琴南》除了论述此三本传奇外，还附记了林纾有计划而没有写好的传奇两种。计划中的这两种传奇虽未能完成，但同样可见林纾根据自己经历与见闻撰作传奇的创作特点。

林纾《畏庐漫录》卷二“秋悟生”条云，秋悟生作有《霜劫》《落花风》两传奇。两剧今未见传本，亦不见其他著录。郑丽生认为，此两剧亦为林纾所作，“秋悟生”乃其伪托，其《明清两代福建戏曲作者考略》一文中云：

按他《七十自寿诗》十五首，其三有“书楼宁负美人恩”之句，自注：“余悼亡



《膜外风光》林纾译著

后，有某校书者，艳名震一时，初不相识，必欲余从，屡以书来，并馈食品，余方悲戚，且不与相见，同辈恒以为忍。”与此条所叙正复相同，是“秋悟生”就是他的化名，所云《霜劫》《落花风》二种传奇，当亦他所拟写的剧本。

林纾的译著中，有欧洲作家剧本两种：一为《膜外风光》一卷，系法国本雅克·克里孟索（Georges Benyamin Clemenceau）原著；一为《泰西古剧》三卷，系英国达威生（H. C. Davidson）原辑，皆仿中国古代传奇关目，唯不填词。

## 二

《天妃庙》原署“畏庐老人填词”，载《小说海》第三卷第二、三号，民国六年（1917）2月5日、3月5日刊，同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28年11月再版。

《天妃庙》全剧共十出，写光绪年间以松江人侯廉蜚为首的某些留日学生，不事攻读，寻花问柳，回国后，自感身无一技，便以“提倡革命”为名，捣毁了商家集资修建的天妃庙神像而办“新学”，引起崇明一带商人们的愤怒，遂将七处学堂毁坏，致使事态一发而不可收。上海道台（总督）白人雷胜俞即令兵轮前去镇压商会，营务督办福建福宁人谢让（字子鳌）从中斡旋，单骑前往商会，迅速平息纠纷，避免了一场血腥惨案。谢让却因忤上海道台雷胜俞意而获罪，被革职遣戍。

《天妃庙》系根据当时实事写成，传说剧中雷、谢两人有所影射，主人公谢让系作者同里，作品的真实性极强。此剧的角色安排也值得注意：其一，剧中留日学生姓名均以谐音法出之，如丑扮侯廉蜚，即厚脸匪，贴扮他的同学：木廉，即没廉，绰号就地滚；卜修，即不羞，绰号三寸皮；陶器，即淘气，绰号没遮拦；胡绕，即胡闹，绰号闹蹠天。其中表现出作者对这群想

发“造反财”的假洋鬼子及其所作所为的否定态度，而对谢让的赞誉之情则亦显而易见。其二，此剧第九出《忆外》出现了旦扮谢让之妻施氏出场，唱曲三支，有说白，有科介。此出中且有小旦扮婢女上场。以往许多学者包括杨世骥、郑振铎等人均以为林纾三种传奇中全无旦角，由此剧可知，这种说法显误当改。

《合浦珠》亦署“畏庐老人填词”，载《妇女杂志》第三卷第四至七号，民国六年（1917）4月5日、5月5日、6月5日、7月5日刊。同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28年11月再版。张庚、黄菊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一》收有此剧。

《合浦珠》全剧共十二出，写福州寒士陈伯沅安贫乐道、为人忠厚，得到本埠南台富商王廷瑛器重，王廷瑛聘陈伯沅为自家布庄司账（账房）。因独子王寿嫖赌吸毒，挥金如土，无法成器，王廷瑛临终前将家产托付给陈伯沅。王廷瑛去世后，陈伯沅毫无侵吞他人巨额家财之心，而是苦口婆心，开化引导，终使沦为乞丐的王寿浪子回头，痛改前非。最后陈伯沅将王廷瑛临终交付给他的王家财产尽数归还王寿。

《合浦珠》关目与元人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相似，据说此剧有所讽喻。王廷瑛慧眼识人才，陈伯沅忠诚不欺人。作品通过对陈伯沅这一忠厚笃诚之士的描写，表现了对传统道德情操的认可和肯定，特别是对诚信、忠义、笃厚等品德的向往。这种道德观念和表现方式在晚

清民国时期沧桑巨变、传统道德理想和传统文化遭受深刻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对时代风气和传统道德情操的关注和怀想，也反映了林纾在时代巨变之际思想意识的重要特征。

《蜀鹃啼》仍署“畏庐老人填词”，载《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四、五期，民国六年（1917）4月25日、5月25日刊。同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收有此剧。全剧共二十出，取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中发生的一件实事，即义和团事件中吴德潇（字筱村，剧中人称吴德绣）全家遇难事。剧中有末脚“连书字慰间”上场，就是“林纾字畏庐”的谐音。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剧本皆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再版本。

《蜀鹃啼》写浙江西安县（今衢江区）知县吴德绣得省中严札，命其诛杀郡中教士教民。吴德绣将文书压下，抗檄不行，致使义和团愤怒，将其全家杀死。同官坐视不救，唯求自保，地痞从中挟嫌，借机报复。这一故事暴露了清政府对待义和团起义和教士教民的亦恨亦惧、又打又拉的对策和心理，揭露了晚清官场派系林立、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对官员庸碌、地痞横行的时代风气也多有披露。此剧与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一道，反映了清末民初传奇杂剧创作中比较明显的纪实特征。

对于林纾剧作的艺术性，评论界向来给予

很高评价，认为其积极进行艺术革新，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但也批评其剧作的“无旦角”之弊。此说的流传系沿袭郑振铎、杨世骥等人旧说。1924年，郑振铎写了《林琴南先生》一文，其中指出：

他的传奇也很可使我们注意。所谓“传奇”向来都是叙恋爱的，叙“悲欢离合”之刻板式的故事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林琴南的传奇则完全不是叙述这些事的；他的《蜀鹃啼传奇》叙杭州拳乱时吴德绣殉难的事，他的《天妃庙传奇》叙谢让遣戍的事，他的《合浦珠传奇》叙陈伯沅推产还原主的事。旧的传奇，必不能无“旦”，第一出必叙“生”，第二出必叙“旦”，他的三种传奇则绝未一见旦角；旧的传奇必有四十出或五十出，他的传奇则至多不过二十出，少则只有十出；他可算是一个能大胆的打破传统的规律的人。

杨世骥指出：“就体式言，旧的传奇必不能无‘旦’，而林纾的这三种传奇都没有一个旦角，且音乖律违的地方极多，我们可知它也是改途易辙的作品了。”寒光《林琴南》中亦持相同观点。时至今日，亦有多人持此观点，如韩洪举所著《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

其实，认真阅读此三剧会发现，剧中是有旦角的。而郑振铎、杨世骥、寒光等三位论者均以为林纾三种传奇并无旦角出现，则与事实情况不符，是相当明显的共同失误。上已言及，《天妃

庙》第九出《忆外》就几乎全是以旦为主的旦角戏。又如《合浦珠》第四出《别母》，由老旦扮陈伯沅之妻谢氏，与其子王寿进行对话。孙彩虹《林纾三部传奇研究与校订》一文对此亦有论述。

当然，林纾三部剧作的艺术性确实值得肯定，如剧作的节奏感强，高潮迭起，人物鲜活，有现实感，唱词精致，富有个性化设计等。韩洪举认为，林纾“注重借鉴外国小说和戏剧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艺术技巧。如果我们把林纾之前的传奇称为‘情节剧’的话，那么林纾的传奇则可以称为‘心理剧’，这在我国戏剧史上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寒光更在所撰《林琴南》一文中指出这三种传奇是“林氏一种完美的文艺物”，认为林纾“简直是中国传奇的压阵大将，干干净净的把住阵脚而收军回营”。寒光还曾进一步分析林纾传奇作品的独创价值，指出：

中国从前的传奇，大多数是以生、旦做主角，第一出必叙生，第二出必叙旦。此外又有什么排场，必有起伏转折，什么填词长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等等呆板不灵的格式；而且所谓生旦的传奇，无非是描写恋爱的故事。替才子佳人团圆式的滥调小说别开一条偏路。当林氏那时代，这个风还未销歇，但他偏能独树一帜，极力打破以前的旧俗套，创造出一种轻松、美妙的传奇。他所做的传奇三部，内中完全没有旦角，丝毫也没有肉麻式恋爱的痕迹；所叙的不是国事





林纾书法

就是社会事，而且事情翔实，文笔简白，像他《闽中新乐府》一样的，都是十分通俗的好文字。

上述对林纾传奇创作的评价，可谓非常充分，有的地方甚至有些言过其实。寒光强调说林纾“简直是中国传奇的压阵大将，干干净净的把住阵脚而收军回营”，似有夸张林纾在戏曲历史上的地位之嫌。至于卢前指出林纾的传奇“不合于曲律”，这其实是清末民初传奇杂剧作家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创作倾向。

### 三

闽剧《上金台》亦为林纾所撰，创作年代均早于《天妃庙》《合浦珠》《蜀鹃啼》三部传奇，全文分载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福州《闽剧月刊》第二、三两期，距离写作时间已相隔40

年，离作者逝世业已十多年。张俊才《林纾著译系年》附录一中亦有著录。该剧敷衍唐人薛调《无双传》（即《古押衙义救无双女》）的故事，曲调悉用福州地方声腔“逗腔”。徐奋进《闽剧〈紫玉钗〉发展小史——闽剧〈紫玉钗〉研究之一》中有云：

《上金台》作者林琴南。林高慧在《上金台剧本简介》中谓，林琴南尝语人曰：“余欲编一传奇，驾乎《紫玉钗》之上。”遂采取“古押衙营救无双女”故事，编成此剧，命名《上金台》。两易蟾圆，始得脱稿。全剧修辞精美，引典堂皇，琢句工整，用笔宛转，即科白口吻，亦惟妙惟肖，可歌可泣。俾知蒲三善之《紫玉钗》；邱琴舫之《播间祭》，不能专美于前也。郑丽生在《明清两代福建戏曲作者考略》谓：“此剧有一特点，就是唱词悉用逗腔曲调，如急板、宽板、双板、急板叠、自掏岭等，与《紫玉钗》相同。”是剧水平自然不低，可是始终没有演出，大概为了他对音律不大内行的缘故。

可是该剧不见于林纾的自述，亦未见其他著录。今此剧列入闽剧传统剧目。

《上金台》是一出折子戏，系根据唐人传奇改编。故事讲的是唐代大臣刘震的外甥王仙客，原本欲娶刘震的女儿无双为妻。无奈泾原造反，王仙客避走襄阳。待三年战乱平定后回到京师，却得知舅父刘震因受伪命已被处死，表妹无双因此而入掖庭的消息。王仙客后任富平县尹、长乐

知驿。某日得知有中使押领内家 30 人宿驿站，无双也在其中。王仙客派亲信假作驿吏在帘外煮茶。无双认出此人，深夜请他取走书信交给王仙客。信中告知富平县古押衙可救自己。王仙客寻访古押衙，泣拜以告实情。古押衙答应救人，但半年未果。一日，古押衙求得一神药，服此药者立死，三日可后转活。乃派人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后以百缗赎回尸首，与王仙客救疗得愈。王仙客终与无双回到襄阳，白头偕老。

《上金台》一剧可谓充满传奇色彩，情节简练，文字典雅，文学价值极高。剧中塑造了坚贞的无双女和义侠古押衙两个传说人物的鲜明形象。唐传奇所叙的是古押衙三救无双女，林纾则改为古押衙深夜越墙入宫掖中，一次就把无双女救出。这个改动，既适合折子戏的情节，同时突出了古押衙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据赵家欣、杨湘衍《林纾编写〈上金台〉的前前后后》一文，林纾此剧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年二月花朝日，福州诗人陈衍、陈香雪、吴曾祺、何振岱、洪星帆等人，在乌石山双骏园设宴欢迎自京返乡的林纾，并演戏助兴。演出的是儒林戏名作《紫玉钗》。林纾对《紫玉钗》极为赞赏，下决心要写一个剧本与《紫玉钗》相媲美。同年端午节，福州西湖开化寺主持品峰法师诚邀林纾、陈衍等名士湖滨品茗，观看龙舟竞渡。林纾取出《上金台》剧本，并说已请洪星帆协助编曲，成为一出折子戏。众人传览，

交相称许，乃推荐闽班“驾云天”排演。

后来的三个多月，林纾隔日即到戏班，讲解戏文，督促排练。时值重阳佳节，乌石山涛园主人沈瑜庆请“驾云天”作《上金台》首演。林纾与陈衍、陈宝琛、林绍年等福州名流悉数到场。

“驾云天”是福州最著名的儒林戏班，饰男女主角的马伊依、胜玉环又是红极一时的艺人。爱好家乡戏曲的观众纷至沓来，人山人海。这是林纾创作的唯一一出闽剧《上金台》的唯一一次演出。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儒林班时期的闽剧演出和清季以来闽剧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是林纾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上金台》是与闽剧儒林班时期以唱腔艺术与文学见长的名剧《紫玉钗》《蟠间祭》风格相同，而其文学价值无疑超过此两剧的闽剧早期作品之一。闽剧在其长达 400 年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早有闽都著名文人参与创作队伍之中，如曹学佺、林章、何璧、陈价夫、陈轼、郭伯荫等明清名士，而近现代之交的林纾为求“驾乎《紫玉钗》之上”，全剧“修辞精美、引典堂皇、琢句工整、用笔婉转”，而精心创作《上金台》，是足以称道的闽都剧坛幸事。

综观林纾的剧作，可谓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但其大部分作品重在抒情，疏于叙事，因而虽情感浓烈，但情节平淡，少奇峰突起，缺乏戏剧冲突，成为极少演出而仅供欣赏的案头文学。但这不是林纾的过失，而是戏曲这一文学样式在近现代之交的时代命运。

# 曹学佺为家乡禅寺作诗

潘 群

曹学佺是福州明末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一生著述甚富，是著名的诗人，因为耿直不阿、勤政为民，得罪了逆阉，两度弃官。他对福州家乡关爱甚切，修桥修寺庙，在福州留下了不少好诗文。

## 题诗作疏雪峰寺

明天启元年（1621），曹学佺 48 岁，家住在洪塘石仓。当时他受到侯官雪峰寺住持的殷切邀请，上大湖雪峰寺一游，为雪峰寺作《重修雪峰寺募缘疏》。疏文署名“曹学佺侯官人四川按察使”。

曹学佺在疏文的开头，据事直书了自己游雪峰寺迟迟未行的心情：“余性故喜游，海内名山，多所经历。独有雪峰去余里（西门洪塘）中数舍耳（每舍三十里）。顾乃而谴之。相国叶公

襄戏谓余是可傲之。其以其所不知者。余里居十年（指曹学佺在四川任按察使，因除奸去贪事机不密，反遭迫害削职回里已十年）。数动游兴，为期辙不果，即梦寐中往往有披榛拔云，半途而废之境，不解何故，或者余宿因在真觉大师会下投，忝不合羞沮而退耶；抑机缘有待，不欲使其无事而浪游耶。”



雪峰寺

他赞许雪峰寺是名山名刹，经过重修必获新观，必得成就。文中亦流露出自己又复职粤西布司，消除被谪闲居故里、难伸才能的苦闷。疏文又说：“顷以量补粤西（量补是复职的自谦），分当出门，一出门即当抵山下。而寺僧五六辈自洪江尾（洪塘）而来者，其敦情又甚勤也。予于往否之意，本所未决。适值霖雨载途，不能上岸，则此游更错过，不知又何时矣。寺僧之亟余游也，谓余一游之后，斯故者可新，颓者可复。而颇以为梵刹重也。顾雪峰，山曰名山，刹曰名刹，实非以余游故重，而予之脉脉自审于胸中，其为故也，孰遇之废也，孰振之重，有负于性灵矣，负性灵则负山灵，不言而可知矣。兹岂无根器猛利一施铃钟当下大悟者耶。又以岂无财施法施，两得解脱，为首度波罗密者乎。聊书此而复山僧，以待无宿根大力之承当于斯者。余归而续登山之缘，未晚也。”

雪峰寺原名崇圣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雪峰原名象骨山，王审知问真觉大师曰：“峰有何异？”师曰：“六月犹有积雪。”王曰：“何不名雪峰？”因之雪峰之名始矣。

曹学佺游雪峰时有 24 景，他择要作 12 首诗。徐燏修《雪峰志》，录入其 12 首诗及疏文。

曹学佺的诗篇择录其三。

其一《游雪峰寺》：“衰云今日盛前朝，祖地风光未寂寥。月蘸方池无盛夏，雪迷深巖（高峰）在层霄。异香堂上留残絮，枯木庵中挂一瓢。石卵尽时闻有讦。重来说法是何朝。”此诗是

对雪峰主要景点的描述，即蘸月池、雪峰、异香堂、枯木庵、难提塔，以及当时与来朝的感受。

其二《应泉潮》：“一泓深注从峰巖，二六时（十二时辰）中应侯偏。世俗相传为海眼，寒潮微涌月明前。”应泉潮在山绝顶，距寺十多里。水才数寸，进退深浅与潮候无差，四旁皆顽石，中有数沙眼，潮上则涓涓而出，退则后竭。相传为海眼。

其三《留香堂》：“若为遗臭更遗香，不二门中净秽忘。莫谓匡床空败絮，谁人抛得臭皮囊。”留香堂，尝有僧败絮百结，臭秽不可近，僧众逐之，独邻僧相留，送去数里谓曰：荷君意勤适，留香相浣。比还所坐处，异香袭人，经时不歇。

曹学佺游雪峰寺的诗文，描绘三百多年前的雪峰胜景，至今还可令人一睹为快，念念不忘。

## 倡修定光塔并作《定光塔铭》

福州于山定光塔是福州三山两塔的标志之一。福州定光塔在于山万岁寺（定光塔寺）内，塔计 7 级，高 41 米，后梁开平元年（907）闽王王审知建，唐黄滔为作报恩定光塔碑。建塔时有宝珠光芒四射，故取名“定光塔”。

福州定光塔存世 1000 多年，数遭劫难。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廿九日被雷击起火，当时是福州的最高建筑，整座塔烧得像一条巨烛，直刺苍穹，城内外数里皆可见。定光塔焚



定光塔

毁14年后，由侯官状元龚用卿倡议，张经赞助，并向商坤募捐，重修定光塔。1548年九月动工，到第二年十月完成。塔内架为螺旋形木梯，外表用砖，将原来的木塔改建成砖砌的定光塔。

状元龚用卿是曹学佺的岳父。张经是明朝的抗倭名将，曾任七省总制、兵部尚书，侯官洪塘人，是曹学佺家乡的先贤。是他们共同为奠定福州标志的三山两塔作了建树。

明崇祯十七年（1644），曹学佺等人再度倡修定光塔，并作《定光塔铭》。但以往的福州府志，包括《西湖志》《闽县乡土志》等志史，对此均未作记。王铁藩、郑丽生所撰的《福州定光塔寺志略》详载此轶事：福州文化部门于1958年重修定光塔时，发现塔的尖顶部有一“塔顶镇压”的八角形台座，台座上有一铁葫芦，台座八

角各一耳，系以铁链，与塔尖铁葫芦相系。台座板上铸有铭文，铭曰：“补山之阳，重仰定光，安奉舍利，为国祯祥。天子万寿，丰年穰秧，佛日增辉，此众无疆，时，崇祯癸未岁之吉。郡人曹学佺、郑邦泰、林弘衍、陈询、住持比丘明定，化主僧成明同立。”台座已锈，铸工粗劣，字亦渐泯。

曹学佺是明朝末年万历至崇祯年间福州兴公派诗人，《福州定光塔志略》卷3第16页载有曹学佺《赋得定光塔》一诗，此诗是曹学佺晚年的作品，未收入《曹大理诗文集》中。《赋得定光塔》云：

于山东南胜，寺观亦纵横。际此新秋候，来询古塔名。千花朝影合，片雨晚凉生。社酒原无禁，长歌介寿倾。

七月朔日，徐兴公直社九仙观，赋得定光塔，兴公寿诞也。

曹学佺赋此定光塔，既题定光塔风光，又记诗社会集，还为兴公徐燏祝寿也。

《闽都记》中与曹学佺同侪中记定光塔的诗，如王应山《登定光塔》、徐燏《登万岁塔》、谢肇淛《春日登万岁浮屠》、邓原岳《登万岁寺》等。其中徐燏诗句为：“宝塔凌霄迥，登极俯九垓。山河天际绕，楼阁日边开。”宝谢肇淛诗句为：“高台突兀俯层峦，百丈悬梦客到难。”王应山诗句为：“九山耸龙角，百丈浮金光，晴春发幽兴，我友迭相将。定光塔依旧，诗句长相歌。于山东南胜，寺观亦纵横。”

# 有爱，就有一切

管柏华

20多年前的东湖名叫十七孔闸，美丽而荒凉。而如今的东湖却好似一幅古典油画，福建省首家英式寄宿制学校——融侨赛德伯学校就坐落在湖畔。海鸥翩翩飞翔，来自西伯利亚的天鹅从高空飞来，在此栖息，芦苇被精心梳理，太阳光线仿佛被海岸边高高的木麻黄滤色镜头过滤，闪耀着黄绿色光芒。

英伦风格的建筑群浴在晨晖之中，现代英式钟楼，鲜明的赭红色瓷砖贴面，两座标准的足球场，三座橄榄球场，数十处篮球场以及四座网球场，大片赭红色塑胶道路与光洁的花岗石板路连接，纤尘不染，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一处体育学院。赛德伯的建筑独树一帜，既简洁大方，又高雅时尚，与滨海新城的崭新建筑物交相辉映。

融侨赛德伯学校设有8门必修体育课和17门选修课，每周体育课时达10个小时，几乎占了文化课的1/3。这所国际学校的学生喜欢“武玩”，即爬山、打球、游泳、骑车、中国武术、爬

树。体育与玩耍中的本质其实是人格教育、爱的教育，而且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参与。

为了落实爱丁堡公爵杯（以培育探险精神及野外生存能力为重要内容）的课程设计，2020年暮春，学校组织了初、高中同学去福清大姆山草场登山，将近200名学生分乘3辆大巴浩浩荡荡驶向南岭镇。山脚下有个水库，稀疏的树林子生长着低矮的灌木，路边的满山红开得正盛。主峰有633米高，连绵几座山包都是宽大的草场，风很大，阳光很暖和，远望可以看到长乐那边的锯齿形海岸线。太阳升起时，水雾弥漫开来，学生们都兴奋地哇哇大叫。中午烧饭的时候，他们会找来风干的牛粪烧，牛粪火有淡涩的青草味，本地人闻不惯，那些学生反倒说很“香”。由于附近封山育林，野猪很多，所以晚上大家睡下来后，老师布置高年级男生当散兵哨。黑黢黢的夜里，也没有发生野猪闯入帐篷这样的事。

我与这所学校的朱颖晖老师聊起福州的教



育，我说大抵是在唐朝李椅任福建观察使的时候在城南兴贤坊建立了福州府学。从美国人卢公明日记记载看，传教士办的新学最早应是美部会传教士杨顺办在教堂里的学校，时间在 1847 年，也就 14 个学生。稍停片刻，朱颖晖道：“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左宗棠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不是提倡‘西学为用’吗？与我们仅一江之隔呢！”

学校里的中华文化中心是一座苏州园林式汉装庭院，院子里陈列好几口八角形釉瓷缸，里面

养着睡莲和粉荷。凡是具有中华符号的文化都在这里演绎。中秋前夕学生和外教一起演出了多幕话剧《鸿鸾禧》，故事出自明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外教和学生兴致勃勃地排练了几个月。明式汉服本来就很好看，音乐、舞美、台词也都很美，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我们去小学部参观时，正巧他们正在做一个成人游戏，设计神秘疫苗。孩子们化身为科学家、工程师或发明家，穿着白大褂，配制药物的

材料千奇百怪，阳光、电池、中药材统统可以入药。

融侨赛德伯是福州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授牌的学校，从幼儿到高中共有27个班级，班级人数不等，最多也不会超过24人。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群、美，群的意思是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学生成绩单没有具体分数，只是分出ABCD四个等级，但教师必须向教学主管部门上报评价标准。学生成绩基本在B以上，C只是个别学生的个别科目。融侨赛德伯教师员工有近200人，中外教占比约6:4，外教共有50多人，分别来自英国、新西兰、南非、美国、新加坡，其中有2名黑人外教。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彼得很喜欢体育锻炼，傍晚时分，总可以看到他骑着单车沿东湖栈道在晚霞里穿梭。初中部有个男生，从普通学校转来，开始感觉压力大。彼得就特地为他开小灶，告诉他，人生是长跑，何必要抢跑？由于彼得的循循善诱，后来这位男生爱上了写作与书法，他抄录的书法作品，彼得将它挂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上面写道：“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飭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清张潮《幽梦影》。”

学校的科学艺术礼堂辉煌大气，有800个座位，每年的新年晚会，融侨赛德伯学校都会在这里举行师生联欢。许多老师在台上客串节目，有几个中外教师演出小品《比萨》。作品诙谐幽默，洋溢着浓浓的中外友好氛围。

每一个融侨赛德伯人都承受着学校浓浓的爱，而他们将这种大爱投向社会，涵一书社的建立就是其中一例。2018年10月，融侨赛德伯学子陈涵一将自己的书法作品拍卖得款3万元，捐献给顺昌县仁寿镇桂溪村，建了一间“涵一书社”。陈涵一全家从选购书柜、椅子到购买书籍、编码、上架，全程投入。她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助人者，人恒助之。”并称之为“心灵行走”。

融侨赛德伯学校的幼儿园坐落在校园东北角，其建筑风格与学校主体建筑统一，园内室内布置、建筑材料以及在采光、色彩、听觉、触觉等感官认知上的呈现，都根据儿童的教育和成长特点设计，充分体现爱的主题。

融侨赛德伯学校的教育获得很大成功。在“世界学者杯”中学部初级组中，有陈瑞恩、陈思妤、陈贤浚三个团队入围全国赛，林思辰获文学学科最高分奖，陈明乐获达·芬奇奖。高年级组的仇思晗团队和吴子韬团队入围全国赛，仇思晗获“冠军学者”称号，刘瑜堃、张家豪分获艺术、社会学学科最高分，仇思晗获历史学科最高分，胡礼辰获达·芬奇奖。在欧洲经济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融侨赛德伯学校获学校三等奖，张硕、王炜竣、陈喻铁获个人奖二等奖。赵文佳获2020VEX世锦赛中国总决赛二等奖。在这座爱的伊甸园里，这些高矮参差不齐的欢快小精灵正和园内的银杏树一起茁壮成长，融侨赛德伯学校爱的教育终于结出了果实。